Globethics Repository



信仰, 希望与全球经济-种为善的力量 = Faith, hope & the global economy : a power for good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Book
Authors	Higginson, Richard
DOI	10.58863/20.500.12424/167885
Publisher	Globethics.net
Right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2018 Globethics.net ; 2012 Richard Higginson
Download date	2026-11-09 07:31:0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885

China Christian 7

理查德 • 希金森 (Richard Higginson)

信仰、希望与全球经济

一种为善的力量

Faith, Hope & the Global Economy: A Power for Good

Kingdom business college 圣商学院

Globethics.net

信仰、希望与全球经济

一种为善的力量

Faith, Hope & the Global Economy:
A Power for Good

信仰、希望与全球经济

一种为善的力量

Faith, Hope & the Global Economy:
A Power for Good

作者：理查德·希金森（Richard Higginson）

译者：刘殿利

Globethics.net China Christian No. 7
全球伦理[系列丛书]第 7 册

一种缺乏伦理与社会意识决策的商业环境是不会长久的，这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理查德·希金森的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在经济中根据《圣经》而对信仰产生的新颖的、富有挑战性的反思。这是一个及时的、亟需的贡献，将会帮助工商人士和机构——不论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建立共识，从伦理与道德的角度重新检查他们对金融制度和金融行为的态度。

理查德提供了一些促进健康讨论与辩论的有用的资料。解决方案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态度和我们就个人财富与经济伦理为自己划的边线。默罕默德·甘地说过："这个世界能满足每人之需，却不能满足每人之贪。"

理查德举了很多富有伦理的企业及企业行为的榜样，这些榜样让所有各方都能受益，包括机构本身、机构的领导者、股东、生产商、供应链条上的成员，以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企业道德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本人。

——拉姆·吉杜莫（Ram Gidoomal）CBE 主席，Traidcraft plc

我有幸与理查德·希金森共事，邀请他来加拿大做访问讲师、在他主持的剑桥会议上讲话、为《经济中的信仰季刊》写文章，在我的大学课堂上使用他的文章。我欣赏理查德对信仰与经济的交汇处有着犀利的理解能力，他的教学技能纯熟，写作简明清晰。从瑞德里·霍尔学院公共绿地上的交流到世界各地颇具影响力的论坛，理查德告诉人们基督教如何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的一种为善的力量，他观点独特，堪当此任。

——理查德·J. 顾森（Richard J. Goossen）博士，企业家领袖组织主席

在英国人的心中，希望这种美德受到严重的忽略，真是值得用这一整本书来讨论讨论。我喜欢这本书的戏剧结构。希金森的一种力量是，他广泛地引用《圣经》和实例。有些人从心里知道上帝在工作中帮助自己，却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与同事们谈论"希望就在他们自己身上"。对这些人，本书一定能够提供帮助。

——夏娃·普尔（Eve Poole）博士，阿什里奇商学院（Ashridge Business School）

这本书我期待已久！理查德·希金森以数十年的研究和经历，提出了把信仰与市场明确地整合在一起的方案。本书通篇贯穿《圣经》素材，使人感到自己在兴致勃勃地对《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进行研究，学习关于工作、利息、贿赂以及一个人在商业企业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问题《圣经》都是怎么说的。但同时，本书又植根于全球市场的现实中，希金森以生动的案例对此进行了探讨。尽管他给标准公司模式留出了多样化创新的空间，他还是提出了“利润为主”的企业最需要的东西：希望。我不仅向商业人士推荐这本书，而且向每一位愿意为自己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神的国度服事的教会成员鼓劲的牧师推荐这本书。

——R.保罗·司蒂文斯（R. Paul Stevens），温哥华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市场神学名誉教授

理查德·希金森提出了如何把《圣经》中的重大主题应用于商业世界，研究透彻，思想深刻。本书把基督教与商业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激化了关于价值与原则的争辩，鼓励我们使这种联系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保罗·沃勒（Paul Valler），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Ltd）前财务与运营主任

全球伦理网中国基督徒系列 Globethics.net China Christian Series

丛书编辑： 克里斯托弗 司徒博，博士，教授，全球伦理网创始人兼主席，瑞士巴塞尔大学伦理学教授。
副编辑：崔万田，博士，教授，沈阳辽宁大学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全球伦理网中国基督徒系列 7
理查德 •希金森（Dr. Richard Higginson）著，刘殿利（Dr. Dianli Liu）译，《信仰、希望与全球经济：一种为善的力量》
Geneva: Globethics.net, 2018
DOI: 10.58863/20.500.12424/167885
ISBN 978-2-88931-228-3 (在线版本)
ISBN 978-2-88931-229-0 (印刷版本)
© 2018 Globethics.net
© Richard Higginso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of Faith, Hope & The Global Economy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Varsity Press, Nottingham, England
编辑管理：伊尼亚斯 哈茨 (Ignace Haaz)
Globethics.net
150 route de Ferney
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Email: *publications@globethics.net*

All web links in this text have been verified as of January 2018.

本书可免费下载，印刷版本可从 www.globethics.net/publications 订购，同时提供英文版。

版权是共同创作版权 4.0 Globethics.net 授予下载和打印电子版本权利，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免费分发和传播：1）署名：用户必须注明原署名，归类书目数据，清楚标明该作品的许可条款; 2）非商业化：用户不得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目的或出售；3）保留原著：用户不得修改，转换或者加工本作品。本规定不影响或限制作者的精神权利。全球伦理网有权免除这些条件，尤其是针对欧洲之外其他大洲和不同语言版本的印刷和出售。

目录

丛书序 9

致谢 13

1 经济中的信仰：一种为善的力量 15

2 经济中的神学：是阻碍，还是帮助？ 29

3 始于希望：创造与企业家精神 55

4 从希望到绝望：剥削与贪婪 79

5 对一个民族的希望：没有债务，没有腐败 111

6 在一个儿子身上的希望：帮助被边缘化的人 151

7 希望的死去与复活：正直、牺牲与证实 183

8 活在希望之中的人：进取的僧侣与体贴的雇主 231

9 未来的希望：国度的迹象 255

10 信仰、希望与爱：另一种经济愿景 275

参考资料 289

注释 299

丛书序

呼唤勇气的时代

工作是件大事。

工作是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去进行的首要活动——在与上帝的交通中、在与别人的合作中，我们工作着。确实，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把上帝创造的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以使他的所有造物繁荣兴旺——以他的荣耀。

是的，工作是件大事。

并且，对很多人来说，工作也带来了很多欢乐，诸如分享了目标，加深了关系，磨练了才能，塑造了性格，克服了障碍，制造了产品，服务了人群，还赚了钱——尽管即使在最好的机构中，工作生活也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挫折，失败和分歧。

是的，工作是件大事。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强化

了这个事实。很多人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更多人收入减少，越来越多的人被失去工作的恐惧紧紧抓住。无论如何，金融危机之前很长时间，工作就已经变得更困难、工作时间更长、更令人不满意、令人筋疲力尽。工作已经把它贪婪的触角几乎伸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我们与家庭、朋友在一起、从事兴趣爱好及社团活动时的那种精气神儿、那种轻松愉快都吞噬殆尽。例如，英国人比欧盟其他国家的人每人每周多工作四个小时。我们生活在“奴隶新世界”（Slave New World）。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信实地、有效地追随耶稣？

是一刻不停地汲汲以求满足雄心？当然不。但是，我们给工作场所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吗？不仅是宣布一个真理，而且是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9】不仅是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而且是一种生命，一种神圣的生命，使之浸润于我们的工作品质、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品质、以及我们对所在机构文化所做的贡献的品质？在我们当前的情境下，我们不仅需要《圣经》式的启示和神圣的赋能，而且需要勇气，来对工作和生活作出坚毅的决定，特别是在工作中作出坚毅的决定。进而言之，在这个全民族都在心灵深处对经济活动以及驱动经济活动的价值观进行探求的时刻，我们不仅要学习怎样在职场文化中做忠

实的仆人，而且要学习怎样在其中做主动、积极的塑造者。

这就是《工作中的信仰》丛书的设想：肩负起工作者面临的棘手问题，提供新鲜的材料，或是给熟悉的话题带来新的洞见，或是作者独特的背景或经历开辟了富有启发性的视野。我们还努力把这些书写得既营养丰富，又美味可口，不仅适宜于一顿愉快的正餐，也适合作零食，在火车上、在间歇时，或者，毫无疑问，在疲惫的一天结束的时候，随便抓起来快速阅读。

当你阅读的时候，主与你同在。并且，当你寻求在工作场合信实而勇敢地追随他的时候，主与你同在。

马克·格林（Mark Greene），丛书编辑
伦敦当代基督教研究所，2009

丛书包括：

《获得生命》保罗·瓦勒（*Get a Life* Paul Valler）

《干出来》艾恩·柯非（*Working It Out* Ian Coffey）

《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加哥·瓦尼（*Working without Wilting* Jago Wynne）

《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模式》马克·格林（受托）（*Working Models for Our Time* Mark Greene）

《Ten at Work》约翰·帕米特（*Ten at Work* John Parmiter）【10】

致谢

本书是我担任瑞德里学院（Ridley Hall）信仰与经济项目主任、二十多年来与工商界基督徒共同工作的成果。曾有数百人参加过我们的会议、研讨会、为我们的季刊写文章、通过邮件交流观点、以及邀请我参观访问其企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对所有人给予的激励、支持和福音中的同工，我深怀感激！

近年来，我有幸在全世界广泛游历，履行应允的演讲、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我也愿意感谢在加拿大、智利、瑞典、肯尼亚、印度和中国的很多朋友，他们对我热情周到，使我能够亲眼看到受上帝启示的充满活力与创新的工商企业。传播他们的故事是一种殊荣。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特别要感谢：

- 我在瑞德里学院的同事。2011 年春夏，在我休假写作的一个学期，他们代替我做学院的工作。
- 我的妻子费丽西蒂（Felicity），她一直慷慨地给予我以爱、支持和鼓励。

• 我的朋友詹姆斯 • 阿尔库克（James Allcock）、夏娃 • 普尔（ Eve Poole）和大卫 • 穆瑞（David Murray），他们对本书初稿提供了许多有帮助的评论，还有许多其他人对某些较短的段落提了意见。

• IVP 的编辑萨姆 • 帕金森（Sam Parkinson）， 他以耐心、细致、艰苦的工作使本书的终稿得以完成。【11】

我祈祷上帝能够使用这本书来帮助基督徒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为善的力量。【12】

1

经济中的信仰：一种为善的力量

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它会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巨大的为善的力量。它激励企业，减轻贫困，促进正直，鼓励持续，造就门徒。

这种说法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鲁莽、荒谬的一击。这过高估计了基督教的影响范围。如今，我们听到太多基督教信仰衰落的说法，这似乎是一个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一种信仰的强度是用去教堂人数的统计数据衡量的，上述观点看来有充分的支持。在北欧（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每周去教堂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 4-8%。[1] 世俗化在大踏步前进。

在没有实践基督教信仰的大部分人的意识里，基督教信仰与全球经济也处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二者似乎毫无关系。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与精神领域相关的：个人的救赎，对罪的宽恕以及永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确实如此。经济是关于金钱和物质产品的世界。当我做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神学家，主要兴趣在经济领域时，人们看上去感到很惊诧。

即使对西欧实践中的基督徒来说，在全球经济中成为一种为善的力量可能也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很多人在生意场工作，所有人都作为消费者或投资者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间接的角色。但是，基督教信仰对他们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影响却是边缘性的。【13】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世界在预定的道路上运转。经济方面的规律决定了事情是什么样子——比如，供给与需求的规律决定了工作和物价，基督徒也做不了什么去改变它们。

但是，本书开宗明义表述的并不只是理论上的观点。这不是一名神学家坐在安乐椅上自欺欺人的幻想。基督教是经济中的一种为善的力量，这是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情况——当我与英国的生意人交往，当我在全世界旅行，当我深入钻研历史，我不断看到这个情况。本书将举出很多具体的基督徒的例子，他们的经济活动给所在的社区以及国家带来了生命与希望。

基督教信仰可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巨大的为善的力量。当我们采取一种历史的和地理的视角来思考这个主张时，就更有意义。如果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早期去世

界其他地方旅行，或者我们冒险回到三个世纪前的西欧，情况就截然不同。

全球基督教

把全世界各种不同宗教信徒的人数进行一个统计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大多数人同意，基督教仍然是最大的全球性宗教。仅就对研究问卷的回答来看，全球 70 亿人中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就有超过 20 亿人。即使把很多非实践基督徒（他们不去教堂，他们的信仰是模糊的，他们的行为认不出是基督教的）也算进去，表白有这种信仰归属的巨大数字也值得认真对待。基督教确实是一种世界性信仰。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包括基督徒被迫害或归信基督教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都活跃着基督教团契。【14】西欧的世俗化特点与另外几个大陆的趋势有所不同——每周参加一次教堂活动的人数比例，美洲有 36%，巴西有 48%，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78%。[2] 很多国家至今还在热烈拥护着经由欧洲的殖民活动而接受了的基督教，但欧洲文明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它。

所以，从全球来看，基督教仍然是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自动地猜测，基督徒人数上升的地方，基督徒就在经济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有些

国家，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在信仰和经济之间建立起富有成效的联系。这就是我在开场白中用词谨慎的原因。我说，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它能够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巨大的为善的力量。很多人忽略了“正确地理解”这几个字。一种信仰与经济之间的积极关联并不会如影随形的。

一方面，今天正式认信基督教的人数占全球人口数的比例与 100 多年前大体一致（稍低于三分之一），另一方面，这个比例在具体的国家里变化却很大，在西欧降低了，而在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某些亚洲国家却提高了。二十世纪的后半叶，韩国的教会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人口的30%。这与迅速的经济增长相吻合：1960年到1990年之间，韩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为9%。有些评论人士把二者进行了关联。[3]

进取、节俭、勤奋和信任，所有这些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态度，都受到基督教兴起的鼓励。同样的过程正在当代中国重复着，尽管政府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摇摆不定。在如上海、温州这样快速发展的城市，产业的扩张与教会的增长正在相互促进。【15】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人类型，称为基督徒老板，他们在信仰上称得上是先驱，而信仰在他们的工作方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4]正

是在基督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新事物的时候，它在经济领域中的为善的力量往往最为显著。

欧洲的基督教

新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里，信仰与经济之间的积极关联在欧洲许多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十七世纪是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在一个大部分手工业者和富有的商人都受到生机勃勃的基督教信仰——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鼓舞的社会，贸易、工业、艺术以及科学，所有领域都繁荣起来。这种信仰使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去发挥自己的才能。这给了荷兰人信心与勇气解决自己国家长期的水患问题。詹•里格沃特（Jan Leeghwater）是一位土地开发的先行者，也是一位排水专家。他写道："在荷兰，把湖水排干，是最为必要、最有利益、最为神圣的工作之一。"[5] 积极进取、合作和理性精神成为这个新生国家的标志，其征兆体现在1602年，在荷兰的东印度公司（VOC），数个小型香料贸易公司同时诞生。这开启了一个商业的新纪元。VOC是第一个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开始在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上销售其股份。

在英国，贵格派是一个基督徒群体。相对于其人数

规模之小，它对所有领域的影响之大尤为突出。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在贵格派的商业影响力的顶峰时期，其人数尚不足 20,000 人。但是，他们在银行、保险、糖果、饮料、工程、铁路、钢铁、肥皂、制药、鞋类和纺织品等方面成就显赫。【16】很多十八和十九世纪商业中杰出的贵格派成员的名字到今天仍然伴随着我们，有的作为品牌，实施新的管理，诸如劳埃德（Lloyds）、巴克莱（Barclays）、吉百利（Cadbury）、朗特里（Rowntree）、其乐（Clarks）。

历史学家詹姆斯•沃尔文（James Walvin）相信，贵格派在经济中的出色表现出于很多原因[6]他强调以下几点：

- 贵格派强烈恪守**诚实**。甚至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都承认他们是诚实的。在 18 世纪，这个名声使人们愿意把钱放在贵格银行。诚实还给他们在其他商业领域带来好处。他们说的话是可以被相信的，他们的商品是表里如一的，他们的价格是固定且合理的。
- 贵格派遵循**相互问责制**（*mutual accountability*）。他们经常互相检查，必须向当地的教会（meeting）汇报其商业行为。重要的贵格会成员定期见面，交流生意经，提防那些可疑的投资者或不老实的商

人。这个网络延伸跨越了大西洋。

•贵格派重视**教育**。这起源于新教“为你自己读《圣经》”的习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发展了自己的子弟学徒制度。儿子们在接手家族企业之前，通常被派到另一个贵格行业协会学习一门手艺。

新教的工作伦理

所有这些基督教对经济发挥积极贡献的榜样都是新教徒。这是否意味着我在反复强调新教工作伦理的重要性？答案是，对——但有重要的限制。【17】

“新教工作伦理”这个词在 1905 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开始流行。韦伯观察到，在现代欧洲——特别是在德国——资本所有者和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新教徒的人数远远超过天主教徒人数。他认为，新教催生了一种心理状况，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清醒、勤奋、节俭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从中产生。这有助于其事业的扩展，因为财富被精明地投资于未来的增长，而不是浪费于个人的虚荣。韦伯把这描述为俗世的禁欲主义，认为它在加尔文主义那里特别突出。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韦伯的解释是，加尔文的预定论

教义，即上帝的终极命令把人类分为得救的和被诅咒的两种，使人产生了孤独的不安全感。尽管新教教导说，救赎来自信仰而不是事工，但是信仰可能是伪装的，所以，人们又被抛回到以好的工作作为上帝拣选的标志这样一种生活中。韦伯称，好好工作是“不能买来救赎，但能免除对下地狱的恐惧”的方式，并说“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神助自助之人。”[7]过一种神圣的生活包括一整套带有经济活动特点的善的行为。对很多新教基督徒来说，商业是这种生活发生的背景。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世俗禁欲主义与积累财富很好地相适应了。资源得到了明智的使用；资本增长了。

韦伯的论点一直受到激烈的争论。我同意历史学家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说法，他写到：“有理由认为韦伯看透了某些事情”，[8]尽管后者的判断在细节上值得质疑。【18】韦伯关于预定论的心理学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测性的，缺乏经验支持；加尔文主义者通常以其信心而不是缺乏安全感而著称。这种抗议宗基督教的重要影响是，它没有引起人们对永生命运的担忧，相反，它视整个生命处于上帝的主权之下。商业是可以并且应该为上帝的荣誉而从事的。这促使基督徒满怀热情地去取得商业成功。

韦伯还夸大了新教的自我否定倾向。17 世纪，荷兰人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奢侈品上，例如精美的家居和漂亮的绘画。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对自己的富有感到不舒服，甚至不安，但是这些消费习惯也对刺激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9] 贵格派相信衣着朴素，生活简单，而且他们一般也确实奉行着这样的原则。但这没有妨碍他们为过着更奢华的生活的人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10] 巧克力是与贵格派尤其有关的一种奢侈品，店主人售卖各种昂贵的衣服、水果和精致的服饰。

当然，欧洲的新教国家往往比天主教国家发展更快。1700 年，前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后者，到 1940 年，新教国家的人比天主教国家的人平均富裕 40%。[11] 美国罗马天主教思想家米切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一名资本主义的热情倡导者，认识到天主教中长期存在一种反资本主义偏见：天主教国家“长期阻滞着鼓励发展、创新、节约、投资、企业家精神，一句话，阻滞着经济发展的动力”。[12]【19】天主教对金钱的态度“建立在前现代的现实上”，天主教思想“不懂得明智投资的创造力和生产力”。[13] 现在，他和几位天主教兄弟（fellow-Catholics）正在寻求扭转这个传统。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诺瓦克利用了始于《新

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1891）的过去 100 多年来的教皇通谕，提出，这些文件激发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所产生的认识比在韦伯著作里所发现的更丰富、更高尚。

相反，我们再也不能猜想，新教教会鼓励对经济世界的积极融入。它们的态度受到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国家历史以及不同教会所讲解的神学类型。在本书中，我会特别注意神学的重要性、人们信仰上帝的潜在含义、人性与世界现实。我们被教授的和所相信的东西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比我们很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五个核心准则

我开宗明义称，如果基督教满足五个准则：激励企业，减轻贫困，促进正直，鼓励持续，造就门徒，那么它就是世界经济中一种为善的力量。其中每一条都会在后面章节中出现，不过，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可能是有帮助的。

激励企业

企业是经营活动的主体。全球经济从未止步不前。

【20】虽然企业家有时被贴上危险的、不择手段的标签，像哈梅林（Hamelin）的花衣魔笛手那样引诱人们陷入不愉快的命运，但是，正是通过承担风险、制造出新的产品、服务和流程、改善现有的事物以求更好，才能取得进步。教会应当鼓励企业家，这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它需要远见、热情、承担风险、坚韧和善于决策等诸多品质。在展示出这些品质的过程中，我们效仿上帝的特征。

减轻贫困

经营活动能带领人们走出贫困。它能使人们摆脱非人性的、非道德的、有辱于人的尊严的生活状况。尽管工商业经常被描绘成一种自私的行为，我的成功以他人的付出为代价（他们或是出局的竞争对手，或是被剥削的雇员），但情形并非必然如此。教会应当鼓励一种兼顾社会和财务目标的经营观念。让经营活动给需求者带来利益，帮助人们摆脱贫穷，转变社会，由此，我们忠实于耶稣的使命。

促进正直

与适用于生活其他领域一样，道德标准也适用于经营活动。经营活动具有激烈的竞争性，做正确的事情可能成本很高，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充满了诚实之人的地

方。我们被对经营活动的一种描绘误导了，以为在这个领域不适用正常的行为规则，个人和公司的存亡服从丛林法则。教会应当鼓励人们没有欺骗、没有腐败地从事经营活动。正直地生活，彰显出诚实、始终如一、清澈透明，由此，我们表明自己是一个“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罗马书》12:1）。

鼓励持续

为了生存和发展，经营活动必须具有持续性。【21】但是，近年来，由于环境危机已经对地球造成了威胁，可持续性则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因过度开发世界资源、导致全球变暖，经营活动受到了大量谴责。此时，应该开始行动，回应环境可持续性的挑战了。教会应当鼓励负责任的管家。强调世界是上帝的，上帝把他的创造物委托人类照看，由此，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这个管家的身份是负有责任的。

造就门徒

经营活动是基督教见证的一个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所在。经营者通常很了解自己的同事，有很多机会与其分享上帝之爱这个好消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这里的重点不

应该仅仅在于使人归信（当然，这是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在于培养门徒：通过在市场上作耶稣的忠实门徒，教导人人都来荣耀上帝。

不幸的是，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信仰对全球经济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阻碍。在当代世界，这种威胁表现为三种形式：成功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反资本主义神学（anti-capitalist theology）和圣-俗分离（sacred-secular divide）。虽然它们大不相同，但每种形式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被扭曲的观点，严重误导了基督徒，使他们无力服务于上帝的世界。下一章揭示其情形。【22】

2

经济中的神学：是阻碍，还是帮助？

所罗门是东非的一名有抱负的年轻商人。他努力创办了一间公司并运营起来，开的商店开始小有盈利。他参加一个五旬节派教会，充满激情地崇拜，在唱诗班表现非常优秀。牧师在布道中热切地说，“神会奖赏那些慷慨地给与的人”。会众相信了他这些话，尽管大部分人生活十分贫穷，还是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捐出十一奉献。所罗门注意到，牧师变得有钱了，享受着一种比他或大部分会众都富裕得多的生活方式。

劳拉是英国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她的印刷厂雇用了十二个人，这使她有能力慷慨地向当地社区项目提供支持。但是，她所加入的教会的牧师似乎对经济活动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他谴责资本主义的贪婪，经常攻击企业领导人，赞扬仆人式领导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方式。但是，劳拉自己在企业中就努力实行仆人式领导：她不怕麻烦

地帮助雇员和客户，但从来不放弃决策和积极主动的责任。劳拉对教会变得非常失望，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求精神支持。

阿兰为澳大利亚一个大型会计公司工作。他努力把信仰落实于职场，但或多或少有些放弃了。他参加的教会宣讲了大量的《圣经》道理，但似乎没有一条与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忙乎的资产负债表及返税事务有关。【23】当他问教区牧师基督教关于会计的看法时，牧师竟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同时，阿兰的同事们正不顾一切地推进工作，为此而满足客户的任何要求。如果这意味着给他们避税提出建议，并且从中做一点儿假账，又怎么样呢？阿兰发现，与业内行为保持一致比在金融活动中采取一种道德立场更为容易。

尽管这三个例子各不相同，它们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所罗门，劳拉和阿兰都苦于扭曲的神学——他们的教会领袖所教的神学。

扭曲的神学：（1）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又以成功福音或“健康与财富”福音为人所知，是全球范围的一个重要的阻碍性因素。这种神学在英国尚未发挥重要影响，但是其倡导者声称全球有

数千万的追随者，因而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而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开始流行并迅速传播。美国几位知名度很高的牧师推动了这种成功神学。这些人包括欧罗•罗伯茨（Oral Roberts）、肯尼斯•科普兰特（Kenneth Copeland）、肯尼斯•哈根（Kenneth Hagin）、本尼•辛（Benny Hinn）和乔伊斯•梅耶尔（Joyce Meyer）。他们很多人是电视传道者，影响遍及全世界，特别是非洲和部分亚洲。内罗毕和拉各斯的书店充斥了“健康与财富”主题的书籍、CD 和 DVD。

成功神学教导说，虔信的基督徒可以期待上帝用财产上的富裕来祝福他们。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财富。信仰者“拥有获得健康与财富祝福的权利”，并且，“他们可以通过积极地表白信仰和真心地缴纳十一奉献及其他奉献来‘播种’”。[1]【24】这种教导以对《圣经》的阐释为根据，成功福音传道者尤其喜欢下面这些章节：

> • 在应许之地边缘，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申命记》8:18）
>
> • 先知玛拉基对缴纳十一奉献的敦促：“万军之耶和华

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3:10）

• 耶稣对门徒的保证：“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马太福音》19:29）

• 约翰对他的朋友该犹的祝福：“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2）

对上述最后一节的突出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一节出自很少有人研究的一部经文。罗伯茨 29 岁时，一天他随意打开《圣经》，眼神被吸引到《约翰三书》第 2 章。他认定，这是神要让他富有。他以此壮胆，第二天买了一辆别克轿车。

成功神学布道者从财富角度来解释祝福和幸福是非常草率的；神会以很多不同的方式祝福我们。不过，上述段落确实构成了《圣经》关于富有与贫穷的教导的重要组成部分。【25】物质财富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礼物，他意在让人类享用。以神的意，有些人比别人更富有。但是，《圣经》中关于财富的叙述是变化的、复杂的，并且充满提示和警告。在《旧约》中，富人被期

待是慷慨的，正直的富人通常就是这样。当富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并欺负穷人时，就会遭到强烈的批评。并且，尽管物质财富可能是上帝的祝福，按克里格·布劳姆伯格（Craig Blomberg）的说法，它们“同时也是一个使人心背离神的主要方式。”[2]在《新约》中，耶稣指出了这个危险，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马太福音》6:24）。耶稣与青年财主的对话（《马可福音》10:17-31）、关于无知财主的比喻（《路加福音》12:13-21）以及财主和拉撒路（《路加福音》16:19-31）的故事表明，他认为，钱宝和财物能对人施加有力的控制，阻碍人们跟从他，甚至危及人们获得救赎的希望。

布劳姆伯格对《圣经》资料关于财富的观点进行了颇为平衡的研究，题为《既不贫穷，也不富足》。这句话取自《诗篇 30:8-9》，解释了为什么富足和贫穷都是危险的，但是二者原因不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一段异常清晰地阐释了物质上的中道，即极端的富裕和贫穷都是不应该的。这种信念在其他《圣经》作者中都得

到了清楚的回应。成功神学布道者却没有看到其中的平衡，而把目光只盯在符合他们自己观点的段落上。【26】

此外，成功神学布道者还很容易被指责为天真幼稚以及玩世不恭。他们天真幼稚，表现为不假思索地把财富的积累认作是一个来自神的祝福。很多北美的基督徒之所以富裕是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住在哪里。而电视布道者之所以富裕，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做法——要求别人慷慨付出，支持他们的布道。通常，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他们拥有数套房产，私人飞机，甚至私人飞机场。当这种所谓的福音被展示给发展中国家，后果是严重的。在非洲，人民经常处于极端的贫困状况中。他们鼓足再多的信仰（就其本身）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能从成功神学中获益的一个群体是那些如此布道的教会领袖，他们自我教授、自我任命——如所罗门的牧师。像电视布道者一样，他们受益于人们在高压的情形下所全数缴纳的十一奉献。

以全球经济中发挥善之力量的五条准则判断，成功神学是失败的。它可能伴随着一种进取的态度，但是它不能积极地鼓励这种态度，因为其重点在于直接从上帝那里来的财富，而不是以人的主动性去创造的财富。挪威学者麦格尼·萨菲林（Magne Supphellen）曾进行过一项

研究，考察宗教态度对于企业家自我效能的影响，具体说，他考察内罗毕贫民区的做小生意的企业主开发生意并取得成功的能力。[3]他和他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有三种不同的宗教观：有的人相信自己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有的人认为，如果信仰足够强烈，上帝会让自己成功；还有人持宿命论，个人能动性很弱，相信自己的未来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里。第一组人在处理小额贷款业务上最有效率。【27】尽管样本很有限，这些统计数据还是提示，成功神学在第二个准则上也显得不足：它没能减轻贫困，因为它指望快速答案“上帝会处理”，而不是鼓励人们使用上帝给的大脑、用有针对性的策略来解决贫困问题。

当我们考虑另外几个原则的时候，成功神学所为阻碍更甚。很多领头的实践者使用的方法非常可疑，以致他们个人的正直品质已经遭到质疑。在他们的说教中，也没有明显的对保证可持续性的关注。相反，他们一边怀着一种“末日”神学的心态，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充满着败坏，一边随时准备接受一种富足的生活状态。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怎么能把个人消费拉回来呢？

扭曲的神学：（2）反资本主义神学

资本主义控制着全球经济，这个潮流在 1989 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得到了加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资本主义比它的意识形态敌人更长命。资本主义是以关注资本增长为中心的制度——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其核心特征是致力于经济增长，个人对资本的占有，个人自由与责任，以及市场的自治。

很多基督徒赞赏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与《圣经》原则相一致，但也有人对它一句好话也不说。存在一种激烈的反资本主义神学批判。在英国，两名支持者是蒂莫西•格林治（Timothy Gorringe）和维尔福•瓦尔德（Wilf Wilde）。[4]

蒂莫西•格林治是埃克塞特大学的神学教授。他 1994 年的《资本与王国》一书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公开的抨击。他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是《申命记》30:19：“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正如以色列人处于应许之地的边缘，格林治认为，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生命之路，一条死亡之路：“死

亡之路就是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建立在犬儒主义之上，呼啸着冲向毁灭。它以第三世界和未来世代为代价，满足于享受权利与富裕。”[5]

格林治认为，传统经济的基本假设和规则导致大毁灭。他哀叹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自由市场以及暗中操纵市场的强大力量取得了胜利。他把北方视为剥削者和掠夺者，而南方是不幸的牺牲者。格林治呼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种新秩序将消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差别，使地方经济成为中心，废除高息贷款。在《合理份额》（*Fair Share*）一书中，他呼吁复兴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代替市场施行民主控制。[6]

维尔福•瓦尔德是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曾做过股票经纪人。他的《跨过火河》一书混合了神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他自认为，这本书“是一篇周密的辩论式论述，充满了未被完全证实的最终断言”。[7]本书写于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瓦尔德说，这可以看作是“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主导，英国及其他公司（corporations）[原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8]【29】对他来说，“帝国”完全是权力扩张、剥削与控制的负面含义，他通过援引若干个不同世纪里多个不同国家的例子阐明了这个观点。

瓦尔德对帝国的批判受到《马可福音》的启发。他认为，耶稣在“对犹太的当权派与罗马殖民帝国相勾结的旧秩序进行持久的神学与意识形态的攻击”。[9]今天，我们需要一种类似的天启性的洞察力来帮助我们辨别并揭露帝国意识形态。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是结构性不平等，即资本控制者力量不平等，他提出了一个公司投票结构改革设想：不论所持股票多少，每个股票持有者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权。瓦尔德称 ，“我的方案会一下子彻底改变全部公有公司的所有权”。[10]

在本书中，我自己要对这些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一些回应。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展示了人类的罪性。国际经济的运行暴露了大量的自私、残酷、玩世不恭或者操纵摆布：以利益为外表的对权利的公开攫取。那么，为什么我还认为格林治和瓦尔德（及其他类似的人）的观点在整体上是无益的呢？

第一，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整体评价是不公正或不平衡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且赞扬好的，同时揭露并批评坏的。这些批评怎能不看西方社会生活中一些好的方面呢？好事情太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了。

瓦尔德在有一处这样做了。他写道：“尽管我反对全

球资本主义，它仍然是我们世界发展迄今达到的最高形式。【30】更多人今天活的更长了，吃的更好了，受到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医疗。”[11] 确实如此。过去两个世纪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1800 年前后，全球初生儿平均预期寿命为 28.5 岁。两个世纪后，2001 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达到 66.6 岁。[12] 通过改进公共健康与卫生条件，19 世纪欧洲基本消灭了伤寒和霍乱。1848-9 年和 1854 年，伦敦霍乱流行，整个城市被吞噬，1859 年，“大恶臭”阻碍了议会的召开。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一位市政工程师回应了这场灾难，堪称英国历史上的无名英雄。他为伦敦市中心设计了一个有效的下水道系统。[13] 每次我访问某个没有这类系统的第三世界城市，我都感激那种奖掖科学发明的经济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像巴泽尔杰特这样的人。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国家仍然缺乏普遍供应的净水和卫生系统。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健康和预期寿命也还在缓慢改善和增长。欧洲的扩张尽管在道义上有很多可疑的地方，它还是给所到之处带去了更好的医药。

瓦尔德接着写道：“然而，我们社会中的穷人比以往更加受到排斥，全世界的穷人都是如此。”[14] 确实，就最富、最穷的国家和大多数国家中最富、最穷的人这两

个层面而言，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在最近几年里都加大了。收入最高的人的收入直线上升，这一点我后面要谈。但是，这个事实不应该让我们以为“富人更富了，穷人更穷了”。大部分穷人也在变富：只是稍微富了一点儿，但这也很重要。有些国家，如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果采取广为接受的关于贫穷的定义，即一天仅挣 1.25 美元，1984 年，84%的中国人是穷人。24 年后，这个比率下降到 16%。【31】大约 5 亿人口摆脱了贫穷。这种情况发生于该国明确地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时候。[15] 过去十年，巴西的贫穷程度也明显减轻了。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得出结论说，这归因于把市场导向的改革与进步的社会政策相结合。[16]

第二，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谴责缺乏细致分析。我拼命想找到格林治和瓦尔德对任何多国公司的积极评价，却没有找到。但是，所有这些公司都一样坏吗？有些公司在所处的发展中国家里帮助其提高了健康、安全和环境质量。把它们都一刷子抹黑肯定是错误的。为了正确地评价全球经济，我们需要具体的调查，而不是笼统的鄙视。

在我运作“经济中的信仰”这个项目的二十二年时间里，我遇到了很多基督徒，他们一点都不像有人讽刺的

那种冷酷、贪婪商人的样子。他们非常理想主义，表现出高度的正直，深切地关心着受其经济活动影响的人们。我认识很多公司行政长官，他们对与之做生意的所有不同群体都有很强的责任感，不仅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股票持有者，而且对他们的顾客、雇员、供货商以及当地或更大范围的社区都是如此。

一种反资本主义理论帮助不了他们。像劳拉这样的人受到这种理论的伤害，不知所措。他们想要侍奉上帝，爱他们的邻人，通常处于试探性的、挑战性的环境中；但是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工作的整个系统都出了问题。的确，反资本主义的批评都有着可敬的理念：他们真诚地希望看到一个减少贫穷、促进公正、鼓励持续性发展的世界。【32】不过，如果他们不能认识到经济界人士已经做了的好事，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是无益的。他们在打击前线部队的士气。

这些公开的批评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主流意识——企业家精神给予足够的赞赏。这不能简单地想当然；企业家精神需要培养。绝大多数的生意人在小公司工作，每个小公司都始于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对于改变个人、家庭或劳动力群体的命运，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面貌，企业家的眼光和主动精神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过去五十年里最为显著的反资本主义神学运动——植根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它始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抗议运动。解放神学以《出埃及记》为指导，广泛采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以上帝“穷人优先选择”的名义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特别是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他们反对西方国家一面冠冕堂皇地捍卫自由市场与民主，一面却在支持着压制性的、非民主的政府、甚至军事独裁。

解放神学的神学家推动建立“基础团契”（‘base communities’），在其中，穷人可以摆脱西方的预设，而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圣经》。有些人甚至倡议使用暴力，旨在带来政治革命，开创另一种经济秩序。随着学者们推出了数量可观的书籍，解放神学在 1965 至 1985 年间达到高潮。这些学者包括：古斯塔夫•古提莱兹（Gustavo Gutiérrez）（秘鲁），里昂纳多•波夫（Leonardo Boff）（比利时），乔恩•萨布里诺（Jon Sobrino）（萨尔瓦多），约瑟夫•波夫里奥•米兰达（José Porfirio Miranda）（墨西哥），朱安•路易斯•西冈多（Juan Luis Segundo）（乌拉圭），其中还有一名抗议宗信徒——约瑟夫•米圭兹•波尼诺（José Miguez Bonino）（阿根廷）。[17]【33】

一代人之后，他们有什么持续的影响呢？比预期的要小——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教皇制度产生了麻烦。拉丁美洲在很多方面变得更好了：大多数国家发展繁荣了，军人执政变成了民主政府。改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生的。今天，智利的经济因其稳定、相对较少的腐败以及整体的健康而独树一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的基础在于皮诺切特专制统治的最后几年，引入了私有化，减轻了通货膨胀。

南美洲的进步也是通过小规模企业活动的增长产生的，其间新教徒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社会学家戴维•马丁（David Martin）在巴西和智利做的研究表明，皈依基督新教通常带来文化上的革命。[18] 加入新教教会的人们——主要是五旬节派——获得了一种身份提升感。他们开始不把自己仅看做“穷人”，而是看做拥有上帝赐予的尊严。这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们的行为开始向自我约束、节俭、有进取心的方向改变，这些正是韦伯提出的关键特征。

我要简短地多说几句。德国神学家尤尔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曾在 1970 年代随解放神学家旅行，直到 1977 年在墨西哥城的一次会议上，他被指责为是一名西方“资产阶级”（‘Bourgeois’）神学家。那时，

莫特曼做了非常有意思的观察：【34】

> 在有的地方，福音派的五旬节运动比天主教的解放神学更为成功。基础团契让穷人作为决定性的主体去经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不仅仅是把新生命介绍给他们，而且是唤醒他们去塑造新生命。拉丁美洲的五旬节运动可能成为解放神学的真正批评者和后继者。[19]

扭曲的神学：（3）圣-俗分离

世界范围内，教会遇到的第三种苦恼是**圣-俗分离**。伦敦当代基督教研究所的主任马克•格林（Mark Greene）使这个词广为传播——以致简称为 SSD。[20] 这种做法把现实分为两个领域，神圣的和世俗的，并把二者截然分开。这样，基督教被认为是与教会、家庭及当地社区、个人及私人事务有关，但是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冷酷的、竞争性的经济与政治世界毫不相关。把基督教的语言和标准引入这些领域，你就是在自找麻烦。

这种圣-俗分离神学有多种来源，并有历史和文化因素。美国倾向于把教会和国家平行分立。甚至在拥有建制性教会的西方国家，如英国，多元化是当今主导性的事实。多元化社会由来自在种族、宗教及政治上拥有不同观点、表现及背景的人们组成。对经济和政治领袖来

说，很难寻求一种共同的愿景和大家都认可的伦理规则。多国公司顾名思义就是多元文化的，尽管有些公司表现颇佳，普遍来说，在这个事情上确实面临挑战。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智慧是寻找共同之处（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愿景），而不去关注泾渭分明的宗教事项。这或是因为宗教事项容易导致分歧，或是因为宗教的标准太高不可攀。【35】

很多工商人士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仰，不愿意在经营中采纳基督教的方法，这也反映出他们缺乏来自当地教会的鼓励和支持。格林提供了足够的统计证据和轶事传闻对之进行阐明；我自己的经历（国内和国际的）也证实了这点。基督教缺乏关于终生门徒的教导——即，深入地运用《圣经》，理解做基督的忠实追随者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强调在工作场所做基督教见证：你可能非常了解自己邻桌的同事，但教会却鼓励你把隔壁的邻居带来参加传福音的活动。当地教会的同工（local fellowship）很少愿意公开谈论工作中的事情，特别是压力或诱惑的情况。没有来自自己教会人员的支持，像阿兰那样在职场中的基督徒很容易生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屈从于同伴的压力，适应公司的要求，做出微小然而重要的妥协，而这最终会导致他

们毫无意识地建立起圣-俗分离的观念。

这种圣-俗分离有时能获得一种神学上的正当性：在人生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上帝容忍了人性中的罪性。他用对力量的恐惧来限制力量——如我们看到，保罗指出，统治的权威是上帝赋予的，而不是用武力来捍卫的（《罗马书》13:1-7）。耶稣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马可福音》13:17）。表面上，这使得把生活划分为两个领域是合理的。[21] 实际情况是，凯撒统治的领域，是一个严酷、竞争性的世界，只有适者生存，其最高的逻辑是实用主义和自私自利。【36】很多人在工作中的经历符合这种描述。这与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婚姻、家庭，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领域，可以更直接地要求遵守上帝“去爱”（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宣告出来）的诫命，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自我牺牲的需要。

我想，这种观点是基于对耶稣的误解。他的敌人设下圈套，向他提出关于交税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他设法让提问者做两件事：重新思考他们到底亏欠凯撒什么，认识到他们首先要忠诚的是上帝。耶稣认为，上帝的律法完整地延伸覆盖至整个生活。确实，我们不能总是轻而易举地察觉上帝的意愿，很多工商人士在龌龊的环境

里工作。这表明，往往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圣经》呼召我们作圣洁的人，就对我们的自甘平庸——我们把不完美视为正常并接受了这种不完美——提出了挑战。

然而，一般来说，神学的缺乏——而不是某种具体神学的运用——加强了这种圣-俗分离。全世界很少有神学院教授一种积极的工作神学，也没有教员愿意或有能力积极地谈论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在那些随后去领导地方教会的人身上反映出来。他们的布道很少与地产代理人、公交车司机以及餐厅老板的真实世界相关——尽管《圣经》中描绘各个行业中形形色色的人的故事比比皆是。

在基督徒奉行截然的圣俗分离的地方，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悲的是，宣传基督教的著名人物不断地被曝光涉嫌商业和财务丑闻。【37】2002 年，连续六年被《财富》列为美国最有创新力的美国安伦（Enron）能源公司，被揭露其巨大财富是有组织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会计诈骗的产物。该公司的 CEO，肯尼斯•雷（Kenneth Lay）自称是一名南部浸礼会教友，在休斯敦地区不知疲倦地做了大量慈善事业。他说，公司的伦理原则（无论如何，这令人印象颇深）建立在基督教价值观之上。[22] 由于他在承认了十一项共谋和欺诈的指控之后不久突然

死去，他永远也不能够解释他是如何使商业行为与卓著的、堪为楷模的个人生活相符合的。同样令人大为困惑的是，伯尼•艾伯斯（Bernie Ebbers）这位因共谋和欺诈正在服 25 年监禁的世通公司（WorldCom）的 CEO，在密西西比的布鲁克哈文教会担任主日学的教学。我们只能推测，他们采取了极端的形式划分自己的生活，其行事准则为，在生意中，“凡事皆可”。

神圣的呼召

改革家马丁•路德关于呼召的教义提供了一个更加积极的神学回答。在他个人对《罗马书》的阅读中，他发现了保罗唯因信而得恩典以称义的神学。这个发现和他随后与罗马的决裂导致他猛烈抨击独身生活。他相信，独身生活使他和别人背离了正确的道路。他坚信，所有基督徒的身份是平等的，并强调，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中，人们都有可能努力工作并服事上帝。一位给婴儿哺乳的母亲，一名挥动着扫帚的女仆，一个开具罚单的治安员，如果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回应上帝的命令和荣耀，那么就是在做具有真正价值的事情。呼召（calling）成为一个理解路德宗以及更大范围的新教传统的宗教生活的基本范畴。最首要的呼召，正如《新约》中无数篇幅所

清晰表达的，是回应上帝救赎的许诺。【38】第二个呼召，路德根据他对《哥林多前书》7:17-20 的解读，是接受上帝通过职业、社会以及家庭中的位置所给予的义务，并全心全意地履行这些义务。

有人把这种神圣呼召的观念看作是扭转圣-俗分离的主要希望。我们已经看到，在肯尼亚的小企业经营者的三种不同的神学动机中，强烈的呼召感是最有力量的。我自己就认识一些伦敦的领先的银行家，他们以基督教的职业观来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相信，通过在金融市场服事，他们在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帮助发展中的经济实现增长，为世界贸易和全球投资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

不过，我想知道，有些商人，包括银行家，是否动辄满足于把“呼召”作为他们所有事情的理由。是的，上帝呼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但是，他没有也呼召我们对当前的经济活动进行敏锐的批评吗？呼召是把基督教信仰与全球经济深入地结合在一起的开始；否则，说到呼召，就通常似乎是讨论的结束。从《圣经》教义的丰富资源中，有更多宝藏有待挖掘。

世界的希望

本书围绕希望的主题来构建，理由有三：

2008 年是“08 希望”之年；英国很多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创举。以“希望”为标题，各个机构组织了大量的活动、节目以及项目。这使我想到：怎样以一种传递希望的方式表达我们的信仰呢？【39】我的回答是收集文字资料和图片，办一个展览，把基督教的信仰进行总结。我把基督教信仰作为一个历史线条展现出来，一个关于救赎的历史的史诗，在我看来是一部七幕戏剧。那年，所有来到剑桥米尔路圣菲利普教堂（St Philip’s Church on Mill Road, Cambridge）的人（包括所有信仰者、半信半疑者和不信者）都能看到这个展览。

本书后面几章的标题与这部戏剧的七幕相呼应。我发现，这为把基督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框架。从创世记和堕落直到我们未来的希望，这部救赎戏剧的每一幕都与经济世界有着暗含的联系。每一个重要的、典型的、有争论的经济话题都可以在《圣经》故事的某一个地方找到其位置。在这些篇幅里，你会看到对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高管薪酬（Executive pay）、公平对待雇员、以及为赢得国际合同而行贿等问题的讨论。一种圣经平衡神学（a theology of biblical balance）使得我们早先提

到的五个核心标准突显出来：激励企业，减轻贫困，促进正直，鼓励持续，造就门徒。

也是 2008 这一年，我重读了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尤尔根•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的《希望神学》（*A Theology of Hope*）。促使我做这件事的原因，是莫特曼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 2009 年做“瑞德里学院塑造论坛”（Ridley Hall Moule）的演讲人。他如约到访瑞德里，发表了这个特别的演讲。与这位杰出的、愉快的人会面真是令人非常高兴。

回到 1960 年代，《希望神学》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在复兴希望，使之成为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范畴上，莫特曼发挥了重要作用。【40】他写下了这段值得记忆的文字：“从始至终，而不仅仅是在尾声，基督教都是末世论，是希望。它向前看着，向前走着，因此，也在改变和塑造着当下。”[23] 不过，尽管莫特曼描述了一种感人的希望神学，而就其应用于工作场所和经济生活，此书还是语焉未详。他后来的文章反映出，他对工作这个问题很感兴趣。[24] 但是，他确实没有把希望和工作这两个部分以某种系统的方式连到一起。这使我感到好奇，莫非这项工作留给了别人？会是我吗？

进一步说，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希望是特别至关重

要的。自从 2007-9 全球危机，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我们都经历了这次经济衰退。如果没有希望，没有对更好的未来的一个预期，我们就没有可能拿出积极的态度，去实现那个未来。相信真正的改进有可能的，相信上帝既在意我们的贡献也激发我们最大的努力，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另一部关于希望的神学著作是汤姆•怀特（Tom Wright）的《惊诧于希望》（Surprised by Hope）。像我一样，怀特热诚地相信，对复活的信念和我们对新天新地的盼望应该对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产生转型的效果。他写道：

> 你当下用自己的身体干什么，这是件大事，因为上帝为它保留了一个伟大的未来……你当下做什么——通过绘画，布道，唱歌，缝纫，祷告，教书，建医院，挖井，爱邻如己——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延续进入上帝的未来。[25]

几页之后，他阐述了类似的观点：【41】

> 每一个爱、感恩和善意的行为；每一件受到上帝之爱和上帝创造之美中的愉悦所启发的美术、音乐作品；每一分钟用来教一个严重残疾的孩子阅读或走路的时间；每一个对别人以及非人的生命给予关心、照顾、

> 安慰、支持的动作；当然，每一句祷告，每一个圣灵带领的教导，每一个传播福音、建设教会、持守并表现圣洁而非堕落的、在这个世界荣耀耶稣之名的行为——所有这些，都会通过上帝的复活的大能而各得其径，汇入上帝在未来某一天将进行的新的创造中去。[26]

这是怀特描绘的一幅迷人的、富有灵感的画面。但在我看来，这两段描述都苦于缺乏来自商业背景的例子。在上帝新的创造中，难道真的没有具备企业家或财富创造者特征的事物的一席之地吗？在上帝意图的显现中，经营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没有被注意到。

本书是弥补这些缺陷的一个尝试，来把许多其他人对基督教希望的描述中所缺乏的内容补充完整。这里描述的基督教信仰真正地适应工商业经营人士居住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企业家深合上帝的心意？以西结对推罗的预言与今天的西欧有什么关系？耶稣，这位“妓女的朋友”，是怎样启示了印度和肯尼亚的转变生命的事业？什么时候在某一点道德原则上让步是正确的？合作社（cooperatives）是否是一种更“基督教”式的合作架构（corporate structure）？

继续读吧，去发现更多希望。【42】

3

始于希望：创造与企业家精神

“希望”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圣经》创世故事中。但是，显然，上帝在创造这个行星地球时，投入了大量的希望。《创世记》1 和 2 的叙述中充满着目的与方向的意味。上帝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创造世界，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一个逻辑性的前提。上帝不断评价他所做的事情，并且“看着是好的”（《创世记》1:3,10,12,18,25）。它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意图；上帝对其造物的每一个方面都赋予了目的。例如，太阳和月亮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分别为白天和黑夜提供光亮（1:14-16）；植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1:29-30）。

特权与任务

在《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上帝对世界的主动的意图主要集中在人类，这是他创造的顶峰。这通过上帝和人类的相似性而显示出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记》1:27）。尽管这种神圣的形像的内涵从未明确过，但给了人类以地位和权威。我们占据一个在造物主和其他造物之间的中介的位置。第 26 节讲到：“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第 28 节重申了这点。

《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包括了两段叙述，第一段始于 1:1，第二段始于 2:4。【43】人的创造在 2:7 首次提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第二段叙述中，没有把太多的重点放在人有照管其他造物的责任、因而在创造关系中拥有特权地位。“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世记》2:15）。“修理”（till）这个词的词根在希伯来语中是“服务”（serve）的意思。詹姆士·约翰主教（Bishop James Jones）说：“从泥土中造的亚当被要求服务于他所由生的泥土。”[1] 人类通过合乎规律的开垦，维持秩序并保证收获——从事园艺，如此而已。伴随着开垦，人类有了划分等级类别的职责。我喜欢上帝把动物和飞禽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2:19）这个画面。上帝满可以先给这些生命取好了名字并告诉亚当它们是什么。但是，他却允许这个人亲自给

这些东西命名。

一个瑞德里学院的学生，萨拉，从前是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的植物学家。她给不同的雏菊分类，更喜欢为这些雏菊命名耦合（大约有 25,000 个不同的类型！）所以，她也参与了为上帝的造物划分类别的工作。我告诉她，她是亚当真正的后人，更是（作为一个女人）夏娃的后人：上帝让夏娃作亚当的助手（2:20），给植物分类的工作是从给动物命名那里延续下来的。

很长一段历史中，大部分人耕作土地。在一个实体经济（substance economy）中，人们以土地为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如此。但是，在工业化经济中，一小部分耕作土地的人与其他没有时间、没有意向、也没有土地来养活自己的人进行交易。【44】因此，完成上帝对亚当的指令现在有了一个商业的维度：在曾经有着太初园苑的地方，我们不能逃避经营的现实。农民向市场和超级市场出售产品。精心命名的康尔沃的伊甸园项目（Eden Project in Cornwall）既是一个向参观者讲解自然世界的教育慈善机构，也是一个以金钱为核心的社会企业。

工作与休息

让我们回到《创世记》第 1 章。我们看到，这句话规律性地出现在文本中——“神看着是好的。”这在《创世记》1:31 中达到顶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不仅仅是好的，而是**很**好的。上帝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得到巨大的满足，欣喜于他创造的成果。上帝构建宇宙的设计体现了深刻的智慧。《箴言》第 8 章把智慧描述为上帝的工师，表达了这种意思：

> （当）他立高天，我在那里，
> • • •（当）他立定大地的根基，
>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
> 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 （《箴言》8:27-31）

这种既踊跃又喜悦之情是满怀期待的。上帝在开始的时候是喜悦人的。史诗剧的舞台搭建起来了。

在六“天”的集中工作后，上帝休息了。【45】第一个创世叙述是这样结束的：“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

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世记》2:2-3）。上帝给他自己的创造活动设定了一个限制。他的工作没有结束；他不像是一个缺席的主席，在巴哈马度一个不明限期的假期。他活动的主要重心很快就转向了提升他的造物的有限性。[2]

上帝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休息，而是因为他希望把这种做法传递给我们。上帝的创造活动被描述为工作，而我们也已经看到他给了人足够的工作来做——有目的、生产性的活动。由于人类是以与上帝的相似性被造的，我们以工作“相似于”上帝。但是，有工作的时间，同样也有休息的时间，上帝在这两个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律法》中两次强调要求我们效仿守安息日。第四条诫命“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是根据这个事实“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20:8,11）。《申命记》5:12-16 强调，以色列人也要允许他们的奴隶休息——要注意，在埃及，他们自己也是奴隶。

拿出一天来休息是重要的，这有很多理由。这使我们

有可能与其他信徒一起崇拜上帝，和家人一起度过，重新恢复能量，去聆听上帝在对我们说的话。尽管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守安息日并不容易，现在星期日（安息日的基督教形式）已经成为与其他任何一天一样的日子，商店和体育活动引诱着人们，我们忽略这个上帝指定的主题还是自取其咎。[3]【46】

作为这个每周一次的间歇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用于回顾自己的工作，并从中获得满足。虽然工作中有挫折、困境以及失败，但是，看着自己劳动的果实就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如果上帝的榜样是应该效仿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心自在地享受这种快乐。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工作得非常辛苦，以致不能暂停下来欣赏一下自己的成果，就又上气不接下气地投入下一个工作了。

约翰·劳瓦特（John Lovatt）是一个瓷器公司的经营主任，他写下了这些颇具洞见的话：

> 开发工程师的一个重要时刻是，在数月的构建后，站到后面，深呼吸，按下绿色按键。如果系统工作了（或者，最终工作了），肯定要让它运行几分钟，其实严格需要的仅仅是那么几秒钟。安息日愉悦的时光不是奢侈——而是创造过程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在生产中，有很多无意识运用安息日原则的例子，这些情形应该被识别出来

> 并受到鼓励。农民倚靠在门前品味着庄稼的长势，商家举办活动庆祝一个大订单，运动员冲空挥拳以减轻紧张；所有这些都完成着这个过程，带来平静与满足，这正是上帝安息日的礼物。[4]

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段回顾工作成绩的时间应该安排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的晚上，而不是星期日；上帝认可自己的创造“很好”是在第六日结束的时候。但是，比起这件事确乎发生了，其发生的时间就是次要的了。【47】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没有时间享受如此的奢侈，但是，它对我们的幸福确实至关重要。安息日的愉悦对忙碌的工商人士来说是个无价的原则。

企业家上帝

《圣经》使用了很多有力的比喻来形容上帝，唤起我们的想象力，与我们的日常经验进行关联。例如，除了父亲和爱人的形像，还用很多的职业形像来描述他。澳大利亚神学家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在《工人上帝：走进上帝的心灵、思维和想象力之旅》一书中，做了极其吸引人的探索。他成对列举了十六种不同的形像：作曲者和演奏者；金属匠和窑匠；制衣人和穿衣人；园丁和果园主；农夫和酿酒者；牧羊人和牧民；制作帐

篷的人和宿营者；建筑者和建筑师。[5]

在这些形像中，有两种特别就上帝作为造物主的活动而言。作为一个窑匠，他“塑型”并且“形成”。创造了诸天的上帝“创造坚定大地”（《以赛亚书》45:18）。上帝用土造出动物和鸟类（《创世记》2:19）。最后，他造了人类，让人承认：

> 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 （《以赛亚书》64:8）

在《耶利米书》第 18 和第 19 章中，窑匠的形象还被用来指上帝重塑泥土、打碎罐子的特权。他有权利和能力来造新的东西。

上帝还被视为园丁，在《创世记》第 2 章中，他种植了第一个花园。【48】对伊甸园的描述道出了上帝之预备丰盛和审美的奇妙——树是“悦目的”。但是，这个园子也是需要打理的：上帝不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盘子里给我们。

当我们以职业类型谈及上帝时，需要局限于特定的《圣经》中的形像吗？我和班克斯一样认为不是的。《圣经》中的形像依然十分有力，但是，在合适的地方，我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作出其他类比，而表达出相似的观点和意义。[6]通过训练有素地使用这种想象力，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传达出上帝某些方面的特征。

在工商世界中，具备上帝的部分特征的角色是企业家。从词源上说，这个词当然是法语，乔治·W·布什（Jeorge W. Bush）可能忘了这一点，据说，他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说："法国人的问题在于，法语里没有企业家这个词。"[7]法国的经济学家金-巴普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的名著《政治经济学》（*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在十九世纪早期就传播了这个词，该书享有与《国富论》同等的声誉。他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一个运作企业的人，特别是作为资金与劳动力中介的承约人，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级的生产力提升到较高级的生产力。爱德华·扬金斯（Edward Younkins）指出：

> 萨伊强调，企业家在经济中担任的是至关重要的、创造性的角色，是预测者、项目评估者和风险承担者。他认为，一个有成效的企业家必须具备正确判断与坚持不懈的道德品质，还要谙熟世事。[8]

二十世纪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司库姆皮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是企业家精神最

精深的研究者和最突出的倡导者。【49】他强调企业家的角色是创新者：他们常常使用新技术，发明新的产品及生产方法；他们创造新的组织形式，甚至魔术般地变出新的市场。

正如《创世记》1-2 章描述的，上帝表现出萨伊和司库姆皮特所肯定的许多特征。上帝创造出崭新的东西；他是一个真正的发明家。在创造一个多具潜能的美妙的世界时，他运用了他的智慧。他有无比丰富的知识并能看到未来。但是，他知道，他承担了一个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关系到人类，他赋予人类照顾地球的责任。上帝肯定需要正确判断及坚持不懈这些品质来使这个事业保持正路。[9]

显然，每个比喻都有其局限。企业家的品质告诉我们的关于上帝的讯息仅此而已。我们需要《圣经》中显明的形像来完善自己的理解。上帝的预知（fore-knowledge）远远超乎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类企业家。但是，很多特征是相符的。在一个企业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着更为重要作用的时代，这可能是上帝的一个非常适时的形像，供基督徒用于其见证之中。

企业家的盛衰

有趣的是，司库姆皮特相信，资本主义的成功将导致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m)，形成仇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社会上会形成一种打击而不是鼓励企业家的气候。1950-80 年间，在英国发生了这种情况。企业家名声很差。他们是非常危险的有眼力的人，受自我为中心的驱动，迫不及待地攫取财富，随时准备不顾道德走捷径：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竞争。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在自传中讲了是怎么回事：【50】

> 1970 年代，我们创办维京录音公司（Virgin Records）的时候，英国再也没有人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了。或者，如果有人使用这个词，他们也把它当作令人讨厌的东西。开办了若干个公司的商人被视为“投机者”（chancer）——电视喜剧的原型是《只有傻子和马》（Only Fools and Horses）中的戴尔·伯伊（Del Boy），此人在法律边缘外花言巧语、为所欲为。在早期，我自己就总是被当作一个“戴尔·伯伊”受到排斥……[10]

人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布兰森本人在改善企业家声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是经营唱片公司，还是经营航空公司、铁路公司，他都表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的、

非传统的形像，但一直恪守着让顾客物有所值的原则。阿尼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也是这样。他是国际身体护理商店（Body Shop International）的创办者，该机构生产不用动物做试验的天然成份的化妆品，远在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共识之前，就提出了这种思想。

企业家的形像已经改善了；很多企业家以其勤奋不懈、诚实正直和激励别人的能力而为人所知。他们再也不被学术界鄙视了。1970 年以后，剑桥大学发生了一场态度革命，大学科系的研究实验室里产生了很多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新观点，两个最富裕的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和圣约翰学院（St John's）用其位于城市边缘的土地——在剑桥科学院和圣约翰创新中心，为新诞生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提供了一个基地。[11]

加拿大的渥太华是另一个企业家活动的“蜂巢”，商人兼学者瑞克·顾森（Rick Goossen）在此创立了企业领袖组织（Entrepreneurial Leaders Organization, ELO），他的理想是装备、联络并激励基督徒企业家领袖。【51】ELO 正在进行一项与基督徒企业家访谈的研究，其成果是一个年度出版物，名为《基督徒领袖：对信仰与工作的检视》（Entrepreneurial Leaders: Reflections on Faith and Work）。[12] 这些书记录了与来自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企

业家的访谈，意在为有进取心的基督徒企业家提供一个指导。顾森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有经验的实践者来启发年轻的一代。

毋庸置疑，分布在 5 本访谈书中的 100 个人，呈现出相当高的多样性。然而，这些访谈有共同的主题。在第四卷的前言中，古顿 • 史密斯（Gordon Smith）进行了评论，指出这些人如何是心怀盼望的人，而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他们是“通过自己创造、创新和坚持，树立了何谓靠盼望而活的企业家的榜样”。[13] 他接着写道：

> 企业家是一个清晰地看到现实的人——他对环境有很好的解读；但是，企业家还是一个能看到如何改变这种现实的人，他还能看到利用发明和创造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关联性以及途径。心怀盼望的人不是幼稚；他们只是不安于现状。[14]

这使得他们能在混乱或衰退的时代发达起来。如果一个市场关闭了，企业家会思考什么新的市场会出现；如果一个产品过时了，企业家会考虑下一个替代的产品。司库姆皮特称这种能力为不仅积极地迎接变化，而且通过创造性的解构来挑战现实，来促发出这种变化。[15]

我为第三卷写了前言。我被一种热情所打动，这种热情鼓励了很多访谈对象。这里是两个例子：【52】

• 保罗 • 沃霍夫（Paul Verhoeff），一个地板安装公司 ISO 的董事长：“你需要用热情来领导。如果一个公司的领导人对自己做的业务、自己能提供的服务以及公司怎样成长都没有热情，那是没有办法让其他职员获得这种热情的。热情始于顶峰并顺势而下。”[16]

• 瑞格 • 皮特森（Reg Petersen），一个退休家庭公司 Versa-Care 的主席：“企业家精神是我的热情，上帝在我身上创造了这个热情是有目的的。我被呼召去实现这个目的 • • • • • • 我们寻找对其他人的幸福怀有热情的人—这是关键处。每个人都需要有一颗关心照顾别人的心和服务的热情。”[17]

这本书介绍的另一位企业家是泰瑞 • 史密斯（Terry Smith），他是位于华盛顿州百灵汉姆的史密斯花园的董事长，做花卉的批发零售生意。我见到他本人时，他的热情和在书上写的一样流露无余：“我知道，上帝在我母亲的子宫里为我安装了作企业家的天线。这可以追溯到 DNA：他为我装备了热情、创新、冒险、忠诚和振奋。”[18]

2009 年三月召开的瑞德里 • 霍尔企业家精神大会（A Redley Hall con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显然给很多心

态良好的、有企业家思维的基督徒带来很大启发。尽管这件事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到来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害怕。银行可能贷款少了，但企业家们有办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投资资金，对小型项目，家庭和朋友通常最先出钱。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持续的生活需要，甚至——确实特别是——在经济衰落的时候。【53】这次大会提供的机会使志趣相投的人彼此得到鼓励，同时，又从给他们创造源泉的上帝那里获取了灵感。

治理这地

在第一个创世故事中暗含两段被证明相当矛盾的语句。前面我们提到了第一段：人类被允许“统治”其他造物（《创世记》1:26,28）。他们还被允许“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环境危机，使得这些统治和征服的思想受到强烈的批判性检视。

1967 年，美国历史学家里恩 • 怀特（Lynn White）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题为《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他指出，由于在现代科学与技术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基督教对于现状“背负了深重的内疚”。基督教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分法，认为人类为自己的利益开发自然是上帝的意愿。[19]

苏格兰生态学家艾安·麦克哈格（Ian McHarg）出言更为大胆，他写道，由于强调对自然的统治与征服，创世记的故事助长了人类最具掠夺性和破坏性的本能。“确实，如果要给做如下事情的人寻找许可证——增加辐射，开发停放有原子弹的河道与港口，无限制地使用农药，或者赞成这种恐吓催灭性的心态——没有比这个文本更有力的命令了”（《创世记》1:26,28）。[20]

基督徒需要十分小心，怎样回应这种指责。【54】有些人想要否认怀特的指责，指出，生态问题在犹太-基督教传统没什么影响的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或者，创世记第 1 章不应该和第 2 章分开解读，第 2 章非常强调对地球的一种服务的、照顾的态度。两种回应都是正确的，但都不充分。我们需要对文本进行审慎的鉴定，看看哪里具有攻击性，哪里是在过去 250 年来造成全球变暖的工业革命中人类掠夺的证明。

就《创世记》1:26-28 来说，如实地解释文本、承认在希伯来语中，“征服”（subdue）和“统治”（have dominion）的语气很强烈，这非常重要。动词“统治”（have dominion）在《旧约》中的其他地方，被译为“踩踏”（tread）或“践踏”（trample on），而动词“征服”（subdue）用于使战争中的敌人臣服：含义很明显，如果要让地球满

足人类的需求，要使用强大的力量。认为这不必要，是感情用事的无稽之谈。必须控制害虫，必须驯服野兽，必须找到水。

上帝创造了一个充满相当丰富资源供人类男女使用的世界。大部分这样的资源在对人类有益之前，需要某种提取、转化以及加工的过程。矿藏深埋在地表之下；把它们开采、运送出来要冒巨大的危险，付出大量的努力。在以色列人的故事里，应许之地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一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申命记》8:9）的“好”地。《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篇章，含有对采矿这个艰苦世界的生动描述：

> 银子有矿，炼金有方。
> 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熔化。【55】
> 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
> 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
> 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
> （《约伯记》28:1-4）

强力电能

尽管开采金属由来已久，但是，可以说，千百万年来，地球上丰富的资源实际上是欠开采的。上帝给人的

责任包括了这种可能性，即人类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能量之源深埋地表之下，静眠不动，未被触及。随着工业革命，所有这些都变了。煤矿开采为蒸汽机提供了燃料，而蒸汽机带动了制造业机器、铁路和蒸汽轮船。欧洲（在波兰）和美国（在宾夕法尼亚）的第一口油井分别于 1853 年和 1859 年开钻。天然气的开采很快随之而来。

同时，科学家对化学和电学的了解也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1823 年，英国的制造商詹姆士 •姆斯普拉特（James Muspratt）开始采用法国化学家尼古拉斯 • 莱伯兰科（Nicolas Leblanc）1787 年研制的工艺为玻璃和肥皂业大规模生产苏打。十九世纪，电从一种科学趣味的东西转变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在这个过程中，沃尔塔（Volta）、阿姆皮瑞（Ampere）、法拉第（Faraday）及爱迪生（Edison）等人都有重要的发现。1870 年代，电首次用于街道和公共建筑物照明。1882 年，第一个中央供电站开始在伦敦运行。【56】从那时开始，电的使用——方便地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燃料——似乎就不知止境了。试着把你家周围使用电能的东西列举一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换来了环境的巨大代价。从 1750 年左右工业革命开始时，大气中

的碳含量已经增长了 30%：多了 600 万亿吨，未来每年还要增长大约 60 亿吨。尽管有一小部分科学家不同意，但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地球变暖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是少有疑问的。从 1990 年起，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其 2007 年报告称：“通过观察全球大气和海洋平均温度的提高、冰雪的大范围融化以及全球平均海平面的升高，大气系统的变暖是明确的，现在已经非常显著。”[21]

面对这些警示性的数据，这些对生活在低海拔国家、受到淹没威胁的人民来说有深刻含义的数据，这个世界困于两种极端的、无益的反应。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未能就任何有意义的方案达成有约束力的承诺后，参与国家相互指责，充分显示了这些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采取不确定原则，怀疑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证据。布什政府不愿意批准《东京议定书》这一温和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其理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布什总统坚持认为，“我们不知道气候的自然波动对地球变暖有多大影响。我们不知道气候在未来会怎样、或将有多大的变化。【57】我们不知道变化将发生得有多快，甚至也不知道我们的一些措施会

对此有何影响。”[22] 这种态度在美国没有这么流行，但也是很广泛的；也不仅限于这个国家。问题在于，不确定性似乎正在被用来作惯性的借口。化石燃料电能的大用户（还有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更强烈地愿意维持现状。

第二种反应是主张把化石燃料完全转变为可再生能源。这种反应通常伴随着否定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伴随着视工业革命为无法减轻的灾难的观点。事实是，开发使用石油、天然气和电能对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程度不可估量。电能极大降低了黑暗带来的危险；它给医院的手术带来便利，使全球通讯成为可能。

对地球施加统治并非主要是破坏性的。这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理所当然，那就很愚蠢并不知感激。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西方领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期间基督教的主要作用是带来了成绩，而不是羞耻。悲剧是，利益分配不均；全球 14 亿人仍苦于家里电能不足。不管怎样，工业技术的最初开发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长期环境后果。人们容易做事后诸葛亮。

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对全球变暖的所作所为，继续我行我素就是不负责任了。在这两极化的争论中，马克 • 麦克阿里斯特（Mark McAllister），北海一个

石油的上游生产商法尔费尔德能源公司（Fairfield Energy）的前基督徒 CEO，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58】他的意见有三个主要纲领，其清晰的神学原理引人注意：

> 碳氢化合物化石燃料，特别是原油，代表着一种高度便携形式的、奇妙的能量聚集。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已经导致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财富创造时代。对基督徒来说，这种财富标示着神意，对此我们应该心怀感激并且付诸行动以管好上帝的宝贵资源。用其他能源代替化石燃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以平衡的、透明的方式处理这些情况，我们既要认识到化石燃料的利益，也要认识到取代它们的困难。[23]

第二，化石燃料是有限资源，总有一天会用尽，更不用说，这是以上帝的名义对发展中世界应负的责任。因此：

> 政府必须积极鼓励新能源的开发。购买这些替代型能源所需的资金，已经在化石燃料时代赚到了。但是，把充分的资源用于开发新能源所需的技术进步，使之达到一定规模，以满足全世界的能量需求，这还要有关方面的意愿和努力。[24]

第三，同时，必须热情地追求能量节约。基督徒应该树立榜样，采取一种“适度需求”的生活方式。【59】应

该有效率地开发现有的化石燃料资源，因为“只有继续使用油、气、煤，才能提供发展可再生能源所需的时间和资金”。[25]

麦克阿里斯特提出了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的分阶段发展。显然，对于这个过渡的速度以及适当的“多种可再生能源”混合——如水力发电、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量还有大量的讨论空间。其中，原子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比化石燃料更稳定，没有碳排放，但是有其自身的废料处理问题和潜在的事故危险。但是，在当前国际气候问题上，即使对逐渐实现能源过渡这个明智的方案，都似乎难以达成共识。特别是，当前亟需对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进行评估：中国是22.3%，美国是 19.9%。[26] 这两个国家也是对环境的影响最大的化石燃料——煤炭的使用国，中国由煤炭供应的电力占 68%，美国占 45%。

如果人类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对世界资源是“欠开发”的，那么 200 多年来，现在我们显然是在“过度开发”。这表明，做一个上帝资源的明智的管家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需要从上帝本身那里获得智慧。前面引用的《约伯记》28 章中关于采矿的一段，明确地指引了这个方向。在进一步详细描述了采矿者的开采（28:9-11）后，约伯

问：“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敬畏主就是智慧”（《约伯记》28:12,28）。

可再生能源

创造中的上帝造出了一个美妙的世界，以他的工作、休息和创造力树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榜样。【60】他给予人类一个重大的责任，要照顾好他的造物，要把神赐的资源尽可能好地加以使用。企业家于此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几个世纪对地球资源的过渡开采，把一个特殊的重担放在社会企业家肩上，他们要最充分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的机会。

安德鲁 •坦斯维尔（Andrew Tanswell）是一名基督徒，工程师兼管理顾问。在创办塔夫斯塔夫（ToughStuff）前，他是弥迦挑战英国（Micah Challenge UK）的执行主任。塔夫斯塔夫是一个社会企业，雇佣了 100 多名职员，为 14 亿居住在无电地区的人们提供太阳能解决方案。[27] 他们的太阳能板、LED 灯和电池组根据在非洲的市场研究和实地调查来进行设计，以符合该地区独特的需求，经受住严酷的状况。这些产品利用太阳的能量，结合了高效能、易采纳、长寿命等特点：我曾看着安德鲁把一个灯泡扔到地板上，灯泡又弹起来，毫发无损。在非洲的

贫民屋里，可充电的灯泡正在逐渐代替老式的、昂贵的煤油灯，这种煤油灯易打翻、释放煤烟并且有害环境。通过使用无线电和移动电话，塔夫斯塔夫的产品提高了连通性，随着太阳能乡村企业家通过“盒子里的生意”（‘Business in a Box’）项目售卖、租用产品，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水平。塔夫斯塔夫正在为更好的教育作出贡献：东非、西非和南非国家的孩子们现在能在晚上学习了，很多地方都是第一次不再遭受因费力地在敞开的火苗灯下学习或干活对视力和健康的伤害。

安德鲁•坦斯维尔非常高兴来从事这样一个事业，帮助把人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保护了环境。在关于才能的寓言里，他找到了强大的动力：【61】

> 不管我们的工作是在哪个专业领域，问题是：“我是在竭尽全力地运用他赋予我的技能/专长/资源/才能吗？”有意思的是，上帝用同样的话，表扬了那两个用他所给的财富带回了收益的人。“好的、忠实的仆人”，他说。当我见到我的创造者，我希望他也会这样对我说。[28]

4

从希望到绝望：剥削与贪婪

很多人难以理解基督教关于堕落的教义。他们发现很难把一个古老的故事当回事，故事中描述了一条会说话蛇和一个在寂静的花园中行走的上帝。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裸体是可耻的：罪主要就是关乎性吗？（不幸的是，基督徒总让人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可能认为，上帝对这两个初始男女所犯的过失的惩罚一点都不合适。

但是，尽管《创世记》第 3 章中的故事提出了问题，它也敲响了警钟。在心灵深处，我们知道自己在有些地方犯了严重的错误。确实，神学家瑞恩侯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把原罪描述为基督教信仰唯一的可实证的教义。[1]《创世记》第 3 章具有探究与见证的力量，因为它触及了我们人类最根本的真实境况。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亚当和夏娃想吃善恶知识之树的果子有什么罪呢？《创世记》3:5 提供了线索。蛇引诱的话里面的关键词是“如神”。亚当和夏娃，这

此后所有人类的原型，悖逆了自己在上帝创世中的地位。他们寻求与其创造者的平等。

职场中提供了很多人类傲慢狂妄的例子。如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人们会因权利或地位败坏；他们开始独断专行，容不得反对意见。他们渴望在自己的帝国内充当神。有些主席或首席执行官在自己创造的恐惧中洋洋自得。【63】下属们胆怯畏缩，谨小慎微。“他一打喷嚏，我们就全都感冒”是我认识的一名经理对其首席执行官的描述。

《创世记》故事中另一个打动人心的地方，是肇事者推卸责任的方式。亚当责怪夏娃，甚至暗含着责怪上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3:13）。女人责怪她的引诱者：“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3:13）。要这么说很难：“我该受责。我做了这事。我对不起。”

这在职场中是一个常见的情况。推卸责任是人类一种自然的倾向，并且，如果承认错误也许会重创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使公司承担昂贵的法律责任，在这样的企业环境中，这种倾向会得到加强。我们千方百计转移责任，因为接受它会付出可怕的代价。推卸责任是我们堕落的另一个证明。

不论我们是否对《创世记》故事的细节咬文爵字，堕落的教义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偏离了目标。我们已经不符合上帝对我们的最高呼召了。人类以形形色色、难以尽数的方式，背离了上帝之于他们以及这个世界的意图。上帝对这个以他自己形像创造的美轮美奂的造物寄予了那么大的希望，而人类的历史对他来说，却肯定是一个深重的失望。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在经济领域，也透露着堕落的迹象。

挫败

工作常常令人有很强的挫败感；堕落对工作的影响是本质上的。《圣经》对此有生动的描绘。代替伊甸园那美好曼妙状况的，《创世记》3:17-19 说到了汗水和折磨、棘和蒺藜：【64】

>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 直到你归了土……

尽管有先进的技术，似乎还是不可能避免艰苦的折

磨和一些日复一日冗长、疲惫的劳作。因为我们是堕落的造物，背负着罪的惩罚，所以，当工作如是艰难、我们承担了不公平的困难和失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个故事，你可能从来没有在这个背景下考虑过这个故事。这件事发生在耶稣复活后，门徒们回到加利利。“西门彼得对他们（其他门徒）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约翰福音》21:3）。

这些渔民是专家啊！打鱼的时候，他们知道做什么。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晚上出去：晚上是最多产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出船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到湖上来。但是，他们一无所获。黎明到来时，他们的网和开始时一样空空如也。想象一下他们肯定感到：疲劳、挫败、愤怒、为难、饥饿。

我猜想，他们的感受和信诚（Prudential）保险公司的职员是类似的。信诚公司计划 2010 年收购美国保险业领先的友邦公司（AIG）的亚洲分支机构 AIA，这个项目在最后一刻停止了。据说，信诚为这个项目付出的费用达 3.77 亿英镑（£377m），大部分是律师和会计费用。[2]【65】数千个小时的工作白费了。人们想知道，当第二

天这些职员走进办公室，再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时，会有何感受。不过，他们的恼火和制药公司的职员的失望比起来，可能就是小菜一碟了。后者花七八年时间在实验室里研制一种新药，但是，当试验失败时，眼见着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我们在诸如此类的时刻感觉到的，是工作的徒劳。一种时间、金钱和能量都被浪费的感觉：‘都是捕风……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传道书》2:17,22）。在《传道书》中，对工作的挫败感是一个突出的主题。象彼得及其同伴一样，我们什么也没得到，也难以理解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但，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异化、管制和剥削

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以人性中最薄弱、最恶劣的方面为生的产业中最为显著。据一项可靠的估计，娼妓的全球产值是 4000 亿美元，烟草是 3333 亿美元，海洛因是 1260 亿美元，赌博是 1100 亿美元，色情是 1000 亿美元。[3] 与这些数字相比，全球因人口贩卖带来的 100 亿美元产值就似乎非常逊色了；但是，性奴的生命却是与其他令人反感的产业捆绑在一起的，因此，有理由认为，

人口贩卖是世界上最邪恶的贸易。

然而，和平主义者可能认为军工产业才堪受此名——2010 年，全球军火产业总值高达 16,300 亿美元。美国轻而易举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spender），竟然占到全球份额的 42%，比第二名的中国多出 6 倍。最近，英国 BAE 体系把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也列入军火销售商。[4]【66】即使那些在原则上不反对军火工业、相信军事威慑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相信战争有时候是正义的人，看到这些数字的规模，看到大量的非法军火贸易，看到向那些拥有可悲的人权记录的国家进行的军火销售，[5]也会感到恐惧。

不过，人类的堕落同样也明显地反映在很多提供无害、甚至积极有益的产品与服务的机构中。组织工作的方式会损害工作。这种损害可以总结为三个词，在过去 250 年的社会与经济历史中，这三个词经常地表现出来：异化、管制和剥削。

异化

异化是本来自然属于一体的事物的分离、是本来和谐相处的事物或人之间的敌意。卡尔·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概念——可以说，是一个最关键的概念。他

看到，他那个时代的产业工人完全被异化了。这是因为他们被资本家所控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是产品的所有者，关心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最多的剩余价值。对工人、或者无产者的结果是，不仅仅与管理阶层异化（产生了“我们和他们”意识），而且与其他同事（他们被置于彼此竞争的场合）的异化，与自己的工作（工作没有意义，因为工作不能说出是怎样被完成的）、甚至与他们自己（他们与自己作为人类的本质的隔离）的异化。[6]

我们可能不同意马克思开出的治疗方案和预后情况，但很难否定他诊断的正确性。一代人之前，欧洲和北美的工厂有很多工人表现出这种多层次异化的症状。【67】今天，在世界其他部分的工厂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

《圣经》中把这种异化追溯到人类最初的不顺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毁坏了，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如此。《创世记》第 3 章一连串的后果中涉及到了性别之间的关系。堕落毒害了男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他“管辖”她的方式上（创世记 3:16）。在工作场所，这常常导致了对女性的歧视：低报酬、少晋升和性侵犯。

《路得记》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暗含着令人不安

的性侵扰。当路德这个摩押地女子勇敢地决定在伯利恒做工收割大麦，故事中两次提到让她保护自己免受仆人欺负的办法（《路得记》2:9,22）。“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波阿斯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拿俄米说。这是个令人难过的要求。在性别异化的背景下，特别是男性表现出缺乏自制和尊重时，女性则通常要在数量上寻求安全。

管制

管制是以控制的名义设置的刻板的组织系统。当工作被管制的时候，人们做什么、怎么做都被严格的规则和规定所控制。这可以用装配流水线来类比，每个人的工作都被限制于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就是把工人异化于其工作的部分原因。但是，经典的描述是亚当·斯密做出的，他往往被认为与马克思对立。

在《国富论》里，斯密分析了制造别针这个他称之为“最小工业”的过程。【68】鉴于一个工人制造整个别针“很难，可能尽其努力，一天也就造一个别针，不可能造出二十个”，分为十八个独立工序的工人——有人拉丝，有人捏头，其他人把这些东西接上，如此等等—

—“能够把个人的生产力提高 240%到 4800%。”[7]劳动分工使工人发挥专业的功能（有人发挥手工技能，其他人发挥体力），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

尽管斯密热衷于装配流水线的整体利益，他也清醒认识到了它对工人的负面影响。单一的工作会造成麻木的感觉：“一个终其一生都用来做一些简单动作的人……一般会变得尽人类之所能的愚蠢和无知。”[8]重要的是，斯密描述的制造别针的这十八道不同的工序都是用“人手”操作。十九世纪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兰卡郡的棉纺业和约克郡的羊毛业的纺织工人，作为“手”为人所知。其含义是，他们的身体只有这个部位是有价值的。

剥削

斯密还指出，工人们常常被支付实物工资，在经济衰退或停滞时期，他们的收入尤其没有保证。这把我们带到第三个方面，剥削，以残酷、不公正的方式使用权利。经济领域的剥削可能意味着支付工人微薄的工资、使他们处于危险的工作条件，迫使他们过分地长时间工作或者无故地解雇他们。在有些国家，有反对这些行为的法律保护。在很多国家，法律保护非常微弱。工作中的剥削范围是很广的。【69】

发展中国家的童工问题正在激起越来越大的愤怒。例如，在印度的塔米尔·拿督（Tamil Nadu）省和安德拉·普拉克什（Andhra Prakesh）省，数千名低等级的年仅九岁的孩子被迫为奴（为偿付家庭的债务工作），生产一种当地的廉价烟卷。结果，他们的肺结核和其他肺病的患病率非常高。[9] 雇主虐待他们，经常强迫他们在光线和通风都很差的地方蹲在地上数个小时，吸入烟草的烟雾。

《圣经》中刻画了很多工人被剥削的情况。当外来的以色列人成为埃及法老的一个威胁时，他决定“加重担苦害他们”（《出埃及记》1:11）。埃及的督工使以色列人“因作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作砖、是作田间各样的工”（1:14）。后来，情形变得更糟：作为对摩西要求“容我的百姓去”的回答，埃及人不给以色列人草、却仍然迫使他们做砖（《出埃及记》5:4-9）。

在以色列的权力和财富达到顶峰的时候，所罗门王强迫役使劳力修建神庙和宫殿，这导致了在他儿子罗波安统治时期的造反（《列王记》上 5:13,12:3-4，9-11）。雅各的书信痛斥了不给收割庄稼的工人付工钱的财主（《雅各书》5:4）。在启示录第 18 章，生动地展示了罗马城受到审判的画面，[*]商人们悲哀的货物包括“奴隶，也就是，

[*] 和合本《圣经》中是巴比伦城。作者在与译者的沟通中指出，评论家一致

人的灵魂”（启示录 18:13,英语标准译本ESV）。这包含了对奴隶贸易这种行为的含蓄的批判：人不应被当作牲口买卖。

中国的工作条件：截然不同的公司

在富士康的中国公司，异化、管制和剥削关系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70】在一次对香港的访问中，我得以了解一连串不同寻常的自杀事件（9 起，还有两起未遂），这些事件发生于 2010 年三月到五月之间其在深圳的基地，毗邻中国的东南边境。富士康是一个生产计算机电子元件的大公司。尤其是，它为苹果公司生产 iPad, iPods 和 iPhone；其他主要客户包括惠普和戴尔。

直到最近，深圳基地有 432,000 名工人，大多数是从中国农村招来的年轻人。那些自杀的人是 17 到 25 岁的民工。尽管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多数是跳楼），但其压抑的工作环境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富士康的雇员生活在完全受公司的支配之下，超长时间工作，通常睡在 12 个人一间的小房间里。台湾的退伍军人充当流水线的监工；雇员不准说话，去卫生间要请

认为，这里的巴比伦城是罗马的指代词，故文中采用“罗马城”这个名称。（译者注)

求同意。迟到一分钟就要面临严重的惩罚；很多人整天站着工作。这是一种极其严酷的工作环境。作为对大量自杀事件的回应，富士康采取了多种措施，围绕建筑物挂上网子来接住或吓唬想跳楼者，工资提高了 30%，提供了 1000 名新的心理咨询师。[10] 但是，这个工作制度的根本性质看上去并没有改变。这个事件不仅对富士康，而且对美国公司以及我们所有受益于这些被异化、被管制、被剥削的雇员快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人都提出了严肃的问题。【71】

可能有人反对说，比起远东很多类似的公司，比起欧洲在经济发展类似阶段的工厂的条件，富士康或许并不更差。这种解释没有道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诸如饼干制造商乔治·帕尔默（George Palmer）和巧克力制造商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这样的启蒙雇主，与那些冷酷的雇主同时存在。在香港，我很高兴见到镇泰有限公司（Jetta Company Ltd.）的董事长黄铁城（T.S.Wong）先生。镇泰是全球著名的玩具制造商之一，在中国广东有超过四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生产和仓储面积，雇员将近四万人，每年的营业额达四百万美元。泰镇的口号是诚实、优秀与协力（integrety, excellence and synergy）。雇员正常工作每周不超过 40 个小时，享有图

书馆、夜校和体育锻炼及娱乐的公共开放场地。职业健康和安全受到高度重视。黄铁城说：“我总是尽力地善待我的员工，就算其他雇主会认为这很愚蠢。”

黄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信仰强烈驱动着他的生意行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他自己的公司。他是香港玩具商基督徒团契（Toy Christian Fellowship, TCF）的主席。与很多只关注福音的职业人团契不同，TCF 寻求一种更大的影响力，主张对工人高度的安全标准和公平对待。当黄铁城 1997 年当选香港玩具商会的主席、2004 年担任国际玩具工业商会的董事长时，他抓住机会把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出来，改善了这个行业整体的水平。[11] 这是一个有力的基督徒见证形式。【72】

全球金融危机

该是时候彻底检查我们西方人的罪了。最近几年，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反响，我们一直为自己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内疚。这在导致 2007-09 全球金融危机的事件中非常明显。我并不试图对危机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只是提出，危机有六个重要的原因：[12]

1.近十年来，不同地区的全球经济不平衡持续增大。某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所消费和借入的远远超过本

国的财富——依赖别人，主要是向亚洲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相反的储蓄和贷出习惯。在布什政府为政期间，美国的国债总量从 5.7 万亿增加到 10.7 万亿，到 2012 年二月，增加到 15.35 万亿。中国的银行拥有美国 26.4%的财政债券，日本的银行拥有 19.8%。[13]

过度花费也发生在个人层面。信用卡现在成了西方社会的象征。它先是以 Access 面世，接着出现了 Mastercard，所谓“即刻享用，无需等待”（taking the waiting out of wanting）：使你在有钱之前就能拥有你花钱能买到的东西。在英国，信用卡的使用在 1995 年到 2005 年之间飙升。2011 年，信用卡债务达到 610 亿英镑（£61b），差不多相当于全国医疗服务的一半。百分之七的人口在圣诞节过去六个月之后，还在偿付他们那时发生的借债。[14]

2. 然而，信用卡只是债务的形式之一。【73】从 1990 年代晚期到 2007 年，西方人越来越容易获得低息贷款，特别是家庭购买。但是，这些低利息刺激了投资者寻找高回报，加速了私募股本和对冲基金的发展，这给那些处于从中牟利的位置上的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英国，这些公司的领导人挣的钱比那些公共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可观的工资还要多得多。伦敦最富裕的两名对冲

基金经理，GLG 合伙人公司的创办人，诺姆·戈提斯曼（Noam Gottesman）和皮埃尔·拉格朗格（Pierre Lagrange）2007 年各自给自己支付了估计 4 亿英镑（£400m）。[15]但是，这些新的公司使用非常复杂的财务手段，其含义连那些操作的人往往也不能完全明白。财富的诱惑使他们看不到其中内在的风险。

3. 下一个原因，通过证券化过程，产生了债务的打包、销售和广泛流通。这意在分散风险，但是在借贷根本上不可靠的部门（例如美国的次贷抵押市场（sub-prime mortgage market）），当信任受到侵蚀时，证券化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2000 年代早期，布什政府鼓励抵押贷款公司，如政府资助的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e，提高向低收入的美国人和首次购买者的贷款水平，尽管这意味着放松对购买者在利息最低的两年后能够持续偿还的要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被认为是一个起始的“恩典”（grace）阶段。【74】这项 NINJA（“No income, no job, no assets”）没收入、没工作、没财产）贷款意味着，没有条件购买财产的穷人被鼓励借钱去购买。同时，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他们的债务交易中获得了大量利润。当利率提高，最初的购买者拖欠付款，这些贷款的所谓安全性就成了镜花水月。

香港前总督（Governor）克里斯·帕顿（Chris Patten）对当代世界进行了深刻研究，在《然后如何》一书中，他讽刺性地叙述道：

> 我记得一名银行职员很不耐烦地试图向我解释在圣路易斯的一位没工作的单身家长的抵押如何在伦敦、纽约或巴黎就变成了可靠的财务工具。在聪明的金融操作者手里，贫穷神奇地变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工具**。穷人有了房子，富人有了债券。这个银行职员使出浑身解数来让我理解这整个完美的简单过程，但我还是不得其解。我有多笨啊，不能理解这个为莱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 Bank, RIP）工作的年轻人对我讲的这一切。[16]

4. 在银行方面，通过过分强调个人债券结构的短期效益来鼓励有风险的财务策略。银行雇员被给予强烈的个人激励来关注大的回报，忽视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机构、而且对于更大范围的经济带来的风险。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UK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批评金融机构的管理不健全，指出“不恰当的酬金政策、行为和过程”对市场危机“是一个促成因素”（尽管，它相信，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75】

5. 这样，在英国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把危机称为“信用收缩”（Credit crunch）：从对非常不需要的项目

进行借贷的银行模式，迅速转为根本不进行借贷的模式。我不喜欢这句话：这似乎是说我们，公众，对信用有一种无限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危机到来时被不公平地剥夺了。一种审慎的措施也许是能解决问题的。然而，政策的巨大颠倒确实造成了本质上的挫折，特别是对那些抱有实实在在商业计划、奋力争取银行贷款的新公司。

价值观与美德：适度与谨慎

这是第 6 个原因。至此，我的分析涉及了来自世俗方面的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另一个因素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大公司——包括金融服务的巨头——常常宣称自己忠实于道德价值观，但是，这种承诺的深度和严格程度却是可疑的。一个全球领先的投资银行有一个伦理规章，强调诚实和团结（integrity），但同时规定，“公司偶尔可以取消规章的某些条款。”[17] 这种取消适用的情况不得而知。公司价值观的表达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召集令，但是司空见惯的是，比起财务底线，它们显得是第二位的。“价值观”是一个无力的词；它可能只表示公司认为有可能（大部分时间）带来财务成功的值得称赞的品质，并不表示对一种工作原则的不计代价的、坚定的持守。

这里，基督徒可能做出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有一个谈**美德**而非价值观的传统。【76】美德比价值观抽象程度低，因为美德植根于个人的心里。一种美德是一个好习惯，“一种值得以某种方式赞赏、敬佩或渴望的性格或心智特征”。[18]《彼得后书》1:5 使用的希腊文的“美德”，*arete*，意味着“德行上的优秀”。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思索、阐述美德由来已久。柏拉图界定了四种**核心**美德：公正（justice）、谨慎（prudence）、适度（moderation）和勇气（courage）。公元四世纪，安布罗斯（Ambrose）和奥古斯汀（Augustine）以基督教的观点考察这四种美德，并增加了三种，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中强调的——爱，信心和盼望——以**神学**三德为人所知：总共七条。基督徒没必要称这是个包罗万象的单子。人们还可以加进去别的特征（谦卑是首要的备选者，与古代世界赞赏的特征“骄傲”相对），但是大部分这些特征都与这七种经典的美德相关，或者可以视为这七种美德的某些方面。

如果我们思考导致金融危机的行为，显然是缺失了两种核心的美德：适度和谨慎。它们是贪婪和鲁莽这两种恶习的反面。适度是一个容易误解的词。人们通常认为它与平庸或一种阴郁的生活方式相关，以禁酒为特征，

认为它是热情的反面，而我曾经赞扬企业家有热情这种品质。它是对过度的避免，而不是过度的对立面。大卫·荣顿（David Rundon），约克郡工程公司 FTL 的创办所有人，在 2004 年一次以“经济中的美德”为主题的“经济中的信仰”大会中观察道：

> 在蒲福风级表上，七级风（a moderate gale）就是很大的风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危险的航行，除了经验丰富的水手：适度与过度也许就差一步——可能非常接近——但是有经验的操作者知道什么时候要自我控制并限制自己。[19]【77】

谨慎也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美德，被错误地等同于小心（caution）。如英国天然气公司（British Gas）前高级行政官詹姆斯·阿尔库克（James Allcock）在同一次大会上所说，过分的小心会毁了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很少能承受得起无所作为：任何行动都比不行动好，往往确实如此。总有一个时刻，要抓住机会并承担风险，特别是在启动一个事业的时候。但是，明智的经营者承担仔细计算过的风险，以保证如果一个策略或政策失败，公司还能生存下去。谨慎会使一个经营者在过度冒险和畏葸不前之间稳舵而行。[20]

什么是谨慎？詹姆斯·阿尔库克喜欢 C.S.路易斯

（C.S.Lewis）的界定：实际的常识，承担起麻烦，想明白你在做什么、后果可能会怎样。所以，在与分析人员和股东的会议上说出事实，这是谨慎。他们不喜欢当利润产出少于期望时受到恶心的打击。

北岩（Northern Rock）曾是一个谨慎的、受人尊敬的来自英格兰东北的建筑业集团公司，2000 年代早期，适度和谨慎在它的行动中缺失了。在 1997 年转型为银行后，它选择去做在抵押市场的各个部分都极具竞争力的业务，然而却不对客户的最低抵押数额作强制性规定。相反，在雄心勃勃的亚当·阿普勒伽兹（Adam Applegarth）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北岩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从其他银行借入数十亿美元。它以抵押资产的全价作为贷款额度，并允许借款人自报收入——这就引诱借款人为能够借到更大的数额而夸大自己的收入。这是美国的次级市场 NINJA 现象的翻版。当美国和英国的地产繁荣发生衰退，北岩便摇摇欲坠。其他银行停止给它借款。【78】阿普勒伽兹只有一种发展规划，没有应急方案。2007 年九月，出现了“银行挤兑”，人们排队取存款。最后只能政府挽救局面：首先保证所有剩余存款的安全，然后把银行国有化。阿普勒伽兹不得不辞职。

金融分析家彼得·沃伯顿（Peter Warurton）提出，北

岩的情况强调了《箴言》第 22 章的真理：

- “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于金银”（22:1）
- “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22:3）
- “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22:7）[21]

在经营中，傲慢必致轻率，轻率必致灾难。

推罗的谕示：一次堕落前的荣耀

对基督教美德的忽略是欧洲抛弃了曾构筑起其伟大的道德与灵性基石的表现。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所有经典中，以西结对海港推罗的谕示最为贴切。

推罗是古代中东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的两个出色的港口，一个在大陆，另一个在海边的岛上，二者通过一条堤道连接起来，加倍提高了这个城市的贸易能力。它以玻璃制品和染色布料著称，从一种当地的贝类动物提取紫色和深红色的染料。然而，推罗是一个小国，容易受到中东主要的强大城邦的侵扰。在公元前七世纪，它遭到亚述人的劫掠，但是，在缴纳一大笔供奉后保留了部分自治。【79】从大约公元前 630 年起，亚述衰落，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推罗的海上贸易繁荣起来；但是接下来的大帝国，巴比伦出现在地平线上。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以西结用三章的篇幅

作为对推罗的预言。每一章针对不同的问题，但又有相互连接之处。这些文字可能写于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刚刚沦陷于巴比伦。

在第 26 章中，上帝宣告了对推罗的判决，因为它为耶路撒冷的毁坏感到高兴，说“啊哈！那作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以西结书》26:2）“门”指的是国际贸易路线的交汇之处，是收过路费的地方。推罗正在为一个商业竞争对手的损失幸灾乐祸。虽然耶稣撒冷的毁坏是在上帝的意图中，是对以色列人罪的惩罚，但是，别人也不应该以此取乐。推罗的惩罚是它将变成一块光秃的岩石（26:4,14），这是清楚地用了它的名字，意思是“岩石”——只适于渔民把渔网摊在上面晒干，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在第 27 章，先知以相反的方式讲了推罗倾覆的故事。这是一曲*哀歌*（27:2），不是谴责，甚至包括了哀歌中的哀哭这种罕见的文学技法（27:32）。以西结受到启示，以诗歌一般的想象，把推罗描绘成一艘豪华的大船，装备无与伦比，船员技能高超，桅杆和浆是用最上乘的木材做的，帆和凉棚是用细麻布做的。他提到了这些材料和人员来自的十六个不同地区。示尼珥的松树作的板[†]，

[†] 原文为“Keel of fir planks from Hermon.”和合本为“planks of fir trees from

黎巴嫩的香柏树作的桅杆，巴珊的橡树作的桨……如此等等。划桨的、掌舵的、填塞船缝的人、雇佣兵都提到了。每个人都发挥了作用："他们彰显你的尊荣"（27:10）；"他们成全你的美丽"（27:11）。【80】

接下来，以西结罗列了与推罗进行贸易的国家和贸易的货物（27:12-25）。提到了 26 个地名，条理清晰地从西边的他施数到北边的大马士革，再到东边的奇异的阿拉伯诸地名。提到了 40 种商品，令人眼花缭乱，包括细麻布、象牙、白羊毛、亮铁、菖蒲、宝石和华丽的毯子。所有这些与我们所知推罗从其他渠道的贸易开发相一致。

以西结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细节，是为了造成一种力量无比强大的感觉。我们面对着一个高度自信的城市，它的自信来自于富裕、商业技能和对当时最先进技术的使用。推罗可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

但是，讽刺的是，推罗这艘好好的大船，承载了过多的货物。在大水之处和强烈的东风下，它沉到了海底（《以西结书》27:25-27）。推罗的倾覆发生在"海中"（heart of the seas）——这个词重复了三遍（27:25,26,27）——

Senir."中文为"用示尼珥的松树作你的一切板"。此处译文依和合本。（译者注）

恰恰是它感到最安全和至高无上的地方。它的倾覆激起了哀痛：水手和舵手“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27:29-30）。如在 26 章中，他们的痛哭又强烈、又长久。

海员们认可推罗成就的方式很引人注意。“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27:33）。推罗为别人也为它自己创造了财富。在《以西结书》第 27 章中没有对推罗直接的批评。对先知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中立的报告。但是，在第 3 节，含有一个上帝的观点的线索，尽管这里看上去更是出于难过而不是愤怒所说的话：“推罗啊，你曾经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以西结书》27:3）推罗自视甚高。这是它倾覆的种子吗？【81】

第 28 章回答：是的。这里，先知返回审判的语气。恰恰是因为推罗的心非常骄傲，说：“我是神（a god）”，所以真正的神（God）带敌人来对抗它。不过，甚至在这里，我们也感到一种遗憾的意味。推罗确实拥有显赫成就的记录：“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28:4-5）。推罗应该是很幸运地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而它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表现出创造性和聪明才智。然而，推罗

两次受到严肃的提醒:“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28:2,9)。

在《以西结书》28：11-19，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再次讲了这个倾覆的故事。推罗的国王被描绘为完美的原初之人的原型，被安置在伊甸园或“神的圣山”（28:13-14）。他佩戴着十种华丽的宝石——这暗指推罗的繁荣。那时推罗王或王子是以托伯二世（Itobaal II），但这里的批评不太像是对他个人的攻击，而更像是对推罗本身精神的评论。这个谕示直接取自《创世记》1-3，以西结既强调了上帝创造人的完美——“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28:12）；“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28:15）——也强调了人类堕落的轻率的本性——“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28:16）；“我已将你摔倒在地”（28:17）。这里的意思很明确。恰恰是推罗的伟大之处加速了它灭亡的悲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问题是推罗自以为是的骄傲。但是，以西结现在批评了推罗的贸易活动。“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28:16）；“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28:18）。【82】这里，我们想知道更多情况。推罗用什么方式充满了强暴之事、贸易不公？是在人口贸易中的方式令人反感吗，如 27:13 提到的“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22]

是不是它地位的强大导致了它欺凌和威吓贸易伙伴？那是骄傲通常带来的后果。

这些都只是历史兴趣吗？不。以西结对推罗的谕示可以帮助西方国家恰如其分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如第 2 章所示，我们生活在两极化的观点中，对于全球资本主义，西方有的人洋洋自得，有的人猛烈批判。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写到，有人把欧洲在过去 500 年里的优势视为“好对坏的胜利。他们说，欧洲人更聪明、更有组织性、更勤奋。别的地方的人无知、自大、懒惰、落后、迷信”。其他人认为，这是坏对好的胜利。“他们说，欧洲人侵略、无情、贪婪、肆无忌惮、伪善；他们的受害者是快乐、天真、柔弱、静待的，因此彻底受害了。”[23]

我相信，两种观点都有真实的成份。西方因其创造的财富值得称道。尤其是，它部分地通过值得赞赏的**文化**习惯创造财富——比如，守纪律的工作伦理，在公共服务中的诚实，以及创新和进取的能力。在这些标准上，各民族文化得分不同。但困难在此：公元前六世纪的推罗可能也这样说。他们也表现出勤奋和独创力。但是，推罗和西方的很多成就是好的，这不能是我们对什么是坏的和不公正的视而不见。西方为自己创造的财富中，

也有通过不公平地对待——通过以强欺弱、奴役和剥削“其余的人”[24] 而获得的。【84】我们同样落于上帝的审判之下。我们暴露于他搜寻的凝视之下。

可悲的是，很多曾因集体信仰促进了其经济增长国家的人们，根本不再认识这位上帝，我在乌普萨拉的一次信仰与经济会议上分享了来自《以西结书》的想法，来自瑞典和挪威的二十五位商业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能看到这些章节与其自身境况的联系，就像我能看到与英国的联系一样。瑞典和挪威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国家。他们没有贪污腐败的灾难，人们都勤奋工作，有很强的平等意识来减少财富悬殊。[25]1990 年代早期，在经历了自身的金融危机后，他们从错误中得到教训，相对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明智地避开了欧洲区域。不过，这些有着强大的路德宗传统的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信仰；瑞典人和挪威人很少去教堂。世俗化正在加速发展。危险在于，他们，像我们一样，变得自满，并且对自己的努力很自豪。我不是说斯德哥尔摩、奥斯陆或者伦敦会在审判中陷落海底。但是我确实相信，我们危险地放弃了先辈的信仰，意外的不幸就很容易发生在变得“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们身上（《以赛亚书 5:21》）。

对地震的回应：智利的合作

基督教把堕落与之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自然灾难现象：地震的间歇性爆发，火山，飓风，以及洪水，对人类和动物造成了极大的痛苦。【84】神学家承认这是神秘现象，对其因果联系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大多数人感到，世界显示出清楚的“败坏的辖制”（《罗马书》8:21）的迹象。这里，我将强调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

智利遭受的地震数量之多绝无仅有。这个狭长的国家与阿塔卡玛海沟的断层线平行延伸，这个海沟长 5,900 公里，距南美洲海岸 180 公里。智利有规律地发生轻微的地震，但是每 20 或 25 年，就会遭受一场巨大的地震。1939 年，在智利，有大约 3 万人死亡；1960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强烈的地震（里氏 9.5 级）袭击了南部城市瓦尔迪维亚；1985 年，轮到了首都圣地亚哥；最近的一次，2010 年 2 月 27 日，地震袭击了港口城市康塞普西翁，其毁灭性的影响远跨智利的中央谷地。

最近，我访问了智利，去会见公平交易生产商，目睹了 2010 年地震的后果，并与人们讨论生活在这样一个地震易发国家是怎样的。与当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智利的基督教徒特点很强：人口中的大约 60%是实践的

天主教徒（practising Catholics），15%是新教徒。在教堂里，我明确地看到这种虔诚信仰的证明：人们跪着，以真实的热情祷告。

在我遇到的很多友好、乐于助人的智利人当中，智诺·亨利奎兹（Chino Henríquez）特别投入。他是一个大型蜂蜜生产者合作组织阿皮库帕（Apicoop）的经营主任。当我们开车驶过瓦尔迪维亚的街道，我问他智利这样频繁、严重的地震是否使智利人怀疑上帝。他说不，他认为没有：他们更会去向上帝祷告，求得帮助。【85】此外，智利人有一种既达观又精明的态度，接受自己生活在一个地震定期发生的地区这个事实，采取合理的预警措施，在地震和海啸发生之间的时间差里疏散到高处，用越来越坚固的材料建造房屋。结果是，近些年智利地震造成的人员生命损失是比较少的。

然而，在任何灾难中，有些人是不幸的。在库里克（Curico）中心镇，智利迅速发展的葡萄酒基地中心，我参观了劳塔罗葡萄酒基地（Lautaro Wines），一个由 22 个成员组成的葡萄酒生产合作组织。在 2010 年的地震中，4 个农民失去了房屋，另外 7 个家庭遭到严重破坏；有些房屋现在已经重建或修缮了。一位男士，乔西（José），失去了 8 名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在他唯

一幸存的女儿开的咖啡店里和他谈话。他本人是在地震 3 个小时后被从他家房子的废墟里拉出来的。此外，对储酒窖造成的毁坏甚至比房屋废墟的惨状更为惊人。这些是巨大的钢制罐子，看上去坚不可摧，但是震颤将许多罐子打烂、拧挤、砸压至没有任何用途，酒浆全部流失。灌溉系统也遭到严重损坏。地震发生在最坏的时间，正值收获季节；劳塔罗葡萄酒基地损失了 20 万美元的现货。

面对这种痛苦（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葡萄酒生产者们表现的团结实在是令人难忘。归属于一个合作社的价值凸显出来。成员们集中在受灾最严重者周围，特别是乔西。葬礼费用、医疗救治以及房屋重建的资助已经到位。【86】劳塔罗基地的两位欧洲公平贸易合作伙伴，英国的垂德克拉夫特（Traidcraft）机构和比利时的奥克斯法姆（Oxfam）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葡萄酒生产者承受了一场严峻而惨痛的经历，但我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却异常昂扬。2011 年，他们取得了好的收成，把生意扳回正轨。[26] 我在劳塔罗和阿皮库帕的经历使我看到，智利的生产者合作社比我访问过的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工作更有成效。我不由得想，他们表现出的人类团结的能力——一起工作，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单打独斗——可能是产生于一种共同的经历：熬过、忍耐皮诺

切特的统治和频发的地震。

遭受一种极端的痛苦会激发人类最坏的行为（如在某些灾难后的抢劫和掠夺）并因此导致绝望。但是，共同的苦难也会唤起人们最好的一面，并且升起希望。本章前面讨论的那些更直接源于人类之罪的苦难也是如此：异化、管制和剥削，伴随着贪婪和愚蠢的恶习。残酷的不公能激发英勇的抵抗；可怕的错误会被清醒的解决替代。

希望与苦难不一定是矛盾。保罗谈论地球被败坏辖制的一段经文是有深刻的希望的。“盼望”这个词出现了六次。受造物的辖制处于上帝的整个计划中，不会无限期地延续。我们在第 9 章再回到这个主题，不过，在这里，在专门写堕落的后果的这一章后，让我们从这位使徒的话里汲取希望：

>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87】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8:19-21,24-25）

5

对一个民族的希望：没有债务，没有腐败

堕落，这个严酷的的现实摆在上帝面前，要他来选择。他会继续他在人类身上投入了如此多希望的计划吗？《创世记》第 4 章到 11 章中表明，上帝有时候处于失望并放弃计划的边缘。

>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
> （《创世记》6:5-6）

上帝接近于要把人类铲除了。即使挪亚存活下来后，上帝随后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创世记》9:11），但人类的自高自大进一步发作，激起了上帝的愤怒。这次是一件集体的行为，由那些想 “传扬我们的名”的人鼓动，造了巴别塔；这引发了神的审判，把人分散在全地上（《创世记》11:4,8）。如《旧约》学

者克里斯多夫·怀特（Christopher Wright）评论说："罪的后果现在已经达到了'全球'的范围。上帝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呢？"[1]

答案是，上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亚伯拉罕，以及将要从他这里繁衍下去的民族。上帝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一个特别的人群知道，他是一位慈爱、强大、圣洁的神。【89】他向希伯来（Hebrew）族长显现，把他的曾孙从埃及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给他们一块土地居住，通过制定详细的律法，让他们知道他对他们生活的规划。上帝与犹太人的关系是独特的。他们是特殊选定的人，如先知所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西亚书》11:1）；"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阿摩司书》3:1-2）。确实，有时候，以色列的上帝看上去像位部落神，使他们战胜其他民族。感觉好像是上帝已经不管不顾其他人类了——对他们导致的道德玷污，以色列人该多么小心谨慎。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上帝还是深情地关心着他的所有造物。

因此，就在这部戏剧的新的第三幕开始，上帝许诺亚伯拉罕，不仅"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而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12:2-3）。

甚至在上帝对邪恶的城市索多玛和蛾摩拉宣布审判的时候，也重复上面的话；其含义是，通过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将是“万国的福”（《创世记》18:18-19）。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以色列人被强烈要求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不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给别的国留下印象（《申命记》4:6）。甚至当犹太人因其堕落遭到流放，上帝的意图仍然是他们是“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42:6,49:6）。《诗篇》67 章是一个祷告，神会“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90】其目的在于，“万民”都称赞上帝（《诗篇》67:1-3）。这样，在对一个特别民族的关注中，上帝在寻找一些正面的示范效果。怀特注意到，上帝的意图是“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在其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正直、和平、公义和爱这些反映出上帝本身特征的品质，这些品质是上帝对人类最初的意图”。[2]

照上帝设计的那样工作

这个行为模型包括上帝对经济领域的意愿。我们已经指出了《旧约》中反映人们耕耘土地、商品及技能贸易的几个段落。有些描述有一种“理想型”的特征；我

们把个人和团体的工作看做是上帝让他们工作。这是两个例子。

《箴言》31:10-31

《箴言》的最后这一部分，是对“贤妻”或“德妇”的赞歌。其主旨集中在她的经济能力上。通过她敏锐的经营，她服务于家庭和外围的家眷。她为此受到称赞：

- 技术能力和手工灵巧：“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31:19）
- 与更广大的人群做贸易：“她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31:24）
- 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和管理的能力：“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31:15）
- 投资和农业的智慧：“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31:16）【91】
- 体力与智力强健，给了她对未来的信心：“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象就喜笑”（31:25）
- 为家人提供衣服、布置房间：“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31:21；

朱红衣服指染色羊毛，但一个相似的希伯来词，为特别暖和“穿双层衣服”，可能更精确）。[3]

• 在社区(community)中慷慨大方：“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31:20）

无疑，这位妇女的丈夫称赞她：“‘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31:29-30）。

这位妇女把经营才能和家庭责任完美地结合起来，给人了留下深刻的印象。有趣的是，她似乎对美国的非裔美国人和发展中国家的黑人基督徒妇女特别有启发。在像“商业中的姐妹”（Sisters in Business）[4]和“女性企业家学习机构”（Enterprising Business Woman Institute for Enterpreneurial Learning）[5]这样的网站，对《箴言》31章的引用很频繁。这反映出在全球经济的小企业部分妇女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在大公司中她们表现不足。微型-财务机构贷款的绝大部分——全球范围内75%——是妇女进行的，大部分人在家里运作着微型-企业。[6]这是因为，妇女远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浪费贷款；在借款人团体中，她们在彼此提供道德支持上做得更好；她们偿还借款的比例也更高。【92】

尽管《箴言》31 中的这位才能出众的妇女看上去比

大部分债务人都更富有，更受到优待（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31:23），但她的家庭经营却与她们有相似之处。难怪她激发了她们摆脱贫困的努力。

《列王记下》12:9-19

这里描述了在约阿施统治期间对耶路撒冷神殿的修理。施工开始得晚了，王斥责祭司没有用此前几年里捐献的钱做任何事。但是他们一受督促开始施工，修理就顺利进行了。令人注意的情况包括：

- 系统地处理钱财：当钱够多并且需要的时候，放到钱柜中的捐献通过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交给督工；督工（主要合同方）买主要原料并付钱给次级合同方（12:9-12）。
- 动用很多才能，包括木匠、工人、瓦匠和石匠——所有人都拥有专业的技能（12:11-12）。
- 正确的优先次序：这是修复，不是装饰。钱被付给工人，不是用在花哨的附属物上——“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12:13-14）
- 无瑕的诚实名声：监工受到极大的信赖，不被要

求对他们经手的钱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12:15）。

《列王记下》的叙述者没有在这个情节上大做文章，这却更令人印象深刻。【93】他几乎是无意地描绘了一幅良好运转的建筑项目的画面，一个值得信赖的建筑业的快照。在当代世界，建筑业是一个挑战丛生的部门。这是一个分工非常细的行业，要把许多不同类型工人的工作整合起来。在英国，对立的供求关系模式逐渐向一种更具合作性的方式转变，其标志是合伙人制，但进展不大。信任得来艰难而失去容易。[7] 只要有一个不诚实的监工，把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或者对石匠-瓦匠不公地分派奖赏和资源，就足以破坏耶路撒冷殿的修理。

解释《旧约律法》

对《旧约》中关于经济的任何考察都不能回避律法书中丰富的材料。在 613 条具体的诫命中，大约六分之一与经济领域相关。这些涵盖：商业行为；对待雇工，仆人和奴隶；伤害与损失；财产与财产权利；安息日与禧年；农业与畜牧业；时间与季节。[8] 这些内容有些是被很认真谨慎地对待的，其他的似乎以一种随意的方式，与涉及生活不同领域的律法并列在一起。

《利未记》19 章表明了这点。它提出了我们在当今世界如何运用《旧约》律法的挑战性问题。一方面，有些诫命我们感到很熟悉。十条诫命的大部分都包括了——例如，不准铸造神像，不准偷窃，不准做伪证（《利未记》19:4,11-12）。它们之间连续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并在《新约》中得到强化。【94】《利未记》19:18 说“爱人如己”，耶稣把这一条从默默无闻中拣择出来，与“爱主你的神”（《马克福音》12:29-31）并列为两大诫命之一。另一方面，这一章也包括了与女奴睡觉（19:20）或修剪胡须（19:27）这样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原因不易理解。《利未记》19 章中有些叙述方式跨越并立于不同文化之上，而另一些方式似乎仅限于特定的文化。

系统地浏览这一章，区分出二者——说某些律法依然现在有效而其他律法不再适用——是有可能的。[9] 但是，即使一项律法看上去很奇怪，也有价值利用它来进行探索，来认识那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基本原则。这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凭着仔细的解释和历史背景知识，则有可能取得进展。于是，藉着一些想象和努力，把这个原则重新运用于我们的文化就非常有价值了。这就是克里斯多夫·怀特采取的方法。他把自己的立场与全球基督教中常见的两种极端的对立面区别开来。第一种是，

通过严格的、字面上遵循《旧约》律法，寻求在当今复制以色列社会。

> 这种字面意义上的模仿不仅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的近东农业经济与部落文化中）；它在神学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或现代国家与上帝的关系完完全全像《旧约》中的以色列那样）。[10]

第二种极端是，拒绝律法，认为它是落后的，因为它已被基督成全，被恩典代替，或者从属于旧的启示。怀特评论道：【95】

> 所有这些对《旧约》伦理主题的否定，对我来说，既不可能符合耶稣和先知对遵守律法的认可（《马太福音》5:17-20），也不可能符合保罗所肯定的——《圣经》（指《旧约》）不仅是神启示的，而且是有益于伦理引领并写下来指导我们的（《提摩太后书》3:16-17；《哥林多后书》10:1-13）。[11]

怀特所称的中间道路，是把以色列的生活与律法作为**范式**（*Paradigms*）。这是“一个模型或形式，使你能够用一些单独的概念或一套控制性的原则来解释或评论很多不同的和变化的情况。”[12] 我们既要注意最初律法的独特性，也要注意我们能从中推演出的原则。一种类

似的路径，使用“类比”而不是“范式”，见于伦理学家威廉姆•斯庞（William Spohn）的《前行一致》（*Go and do Likewise*）：“类比阐明了先前隐蔽的东西，把过去提到了当前。如马克•特瓦因（Mark Twain）说，历史不会自我重复，但它确实押韵。类比式想象的任务就是把握那个韵。”[13]

用这种方法，让我们思考一下《利未记》19:9-10 中的拾穗诫命：

>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这条诫命及其理由在《利未记》23:22 被重复。在古代以色列，大部分人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但是有些人因为懒惰、不幸或压迫失去了土地。上帝明确说，这些人不可被抛弃。【96】我们从这条诫命中“收拾”的原则是，社会应该提供适当的福利。土地拥有者不应该沉迷于把地里的每一粒收获都收为己有。在敬神的经济中，有善加储存的空间，也有不经意的慷慨：这种态度植根于了解上帝是慷慨的，土地最终属于上帝。

请注意，允许拾穗不是分发救济品。穷人必须为其所得而工作。他们从田地边缘捡拾剩下的谷物。当路得在

收割者后面拾穗的时候，她从早到晚站在田里，把捡到的麦穗打了，有一伊法大麦（《路得记》2:7,17）。这有助于穷人保持他们的尊严；他们不是寄生者。因此，这条律法的第二个原则性的含义是保持尊严。这是“工作以谋福利”（work-for-welfare）原则的一个古老的例子：工作与福利并行不悖。在英国，这是一个时事问题，尽管其适用性在某种范围内还有争论，但这个原则既是有效的，也是符合《圣经》的。

对利息的禁止

在《律法书》涉及经济问题的各种文本中，有一个话题非常矛盾：对利润的处理。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立场，从禁止到允许。不过，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确信这个改变是正确的。面对与债务相关的金融问题，受到全球危机的强化，有些批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律法书》中的三个关键段落禁止收取利息。

《出埃及记》22:25-27 出现的部分有深刻的誓约感觉：上帝在他深切关心的事情上，表达了对他的子民的关切。【97】这里包含了保护被剥夺者和易受伤害群体的律法，包括寡妇、孤儿、非以色列人（“外邦人”）

以及穷人，为“基本经济生存条件”而挣扎的人。[14] 对穷人的关心导致这样一个假设，即，给他们的借贷不应该收取利息。借贷和富有同情心地处理典当的重要物品，意在帮助人们应付极度的贫困；放贷者不应该视其为赚钱的途径。

对穷人的关心与尊敬深植于救赎历史的场景中。用评论家 T. E. 弗雷西姆（E. T. Fretheim）的话说：“当上帝的子民虐待穷人，他们就冒犯了自己的历史……这是对他们自己过去的背叛、对那些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救赎行动的背叛。”[15]

《利未记》25:35-38 设想了一个情况，一个乡下的弟兄遇到了窘况，依赖别人而活。上帝的要求是要帮助他，同情他，像对待寄居的外邦人那样地善待这样的人。团结（solidarity）以不收利息表现出来。这项禁令受到《圣经》信仰，对上帝的敬畏，这个基本前提的支持。这里人们再一次被提醒，上帝的仁慈是他们自己表现出仁慈的根据。

《申命记》23:19-20 打开了新的局面。这里明确禁止在以色列人共同体（community）内部收取利息，但允许就向外邦人的借贷收取利息。这里，禁令不仅限于对贫穷的以色列人，对禁令的遵守与上帝的祝福连在一起。

通过允许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外邦人，把处于禁令中心的紧密联结的共同体（close-knit community ties）凸显了出来。怀特指出，这不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而是住在另一个国中的、与他们没有土地-亲缘关系的外人，[16]【98】在那样的背景下，对贷款收取利息是把风险最小化的合理的办法，并且意味着，以色列可以在视取得利息是正常的古中东地区的贸易圈中取得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地位。

《旧约》中其他地方提到利息的地方都很简短，但通常都是不赞成。《诗篇》15 章中能寄居在上帝帐幕中的做事公义的人，除了别的种种优点，还有放债不取利（15:5）。《以西结书》18 章 8 节、13 节和 17 节中的做事公义的人也是受到类似限制的。在后流放城市时期（post-exilic urban context），当尼西米得知犹太人对乡下人弟兄索要利息，并迫使他们为奴，他愤怒了（5:1-12）。不要低估这些文字中感情的力量。

教会传统与高利贷

正是以《旧约》中的这些禁令为根据，早期教父们谴责收取利息。他们相信，利息违背了慈善的律法，并在要求分享财富这个更宽泛的教导语境里确立了这个禁

令。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Carthage）和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都谴责放贷者的欺骗，说他们对借债人表面上是朋友，实际上是敌人。格里高利还提出，放贷取利是一个自然不了解的罪，因为它从没有生命的东西中取得收益，但是，在自然中，只有活的东西才能结出果实。[17] 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金钱在本质上是贫瘠的”之理念。

随着教会进入中世纪，“高利贷”（usury）这个词（源于拉丁文 usura）被用于收取利息。尽管这个词现在通常指过高的利息，但它最初是指任何利息。大的教会会议一直对这种行为持否定的观点。【99】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325）命令放高利贷的神职人员被免职；迦太基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345）谴责平信徒的这种行为；第三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1179）拒绝为高利贷者实施圣礼或基督徒的葬礼；第二次里昂会议（Council of Lyons，1274）禁止向外国高利贷者出租房屋。

中世纪的基督徒保持着谴责高利贷的早期的观点。彼得·罗姆巴德（Peter Lombard）称，高利贷“包含在第七条诫命，抢劫之下，”[18] 在学院派神学家中，普遍把高利贷等同于抢劫。预料到相反论点称借债人同意这笔

交易，他们说，借债人这样做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19]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关于高利贷的教导影响很大。他追随亚里士多德的信念，认为金钱本质上是贫瘠的，所以，从钱中挣钱是“不自然”的。金钱是交换的方式，“借钱取利本身是不公义的，因为一方卖给另一方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就建立了一种与公义相反的不公平。”[20]阿奎那扩展了《旧约》的规定，甚至把外国人包括了进来。基督徒“应该像对待兄弟和邻人那样对待每一个人，特别是在福音时代”。[2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期间，犹太人是作为重要的贷款人出现的。因为《申命记》23 章允许他们借钱给外人（他们认为异教徒就是外人），同时，他们被禁止从事很多其他形式的商贸，他们就以放高利贷著称了。基督徒经常谴责他们收取利息，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在需要借钱时从犹太人那里借。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就反映了经济与反犹思想的联系。

关于借、贷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方面，阿奎那说了很多。【100】一个为借款付利息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不能说是非常情愿的，而是处于某种压力下的”。[22] 因此，一个“感激的债务就建立了”——借钱者处于“一种道德的

义务”[23]之下。有趣的是，阿奎那接着说，这意味着放贷者有权获得补偿，并且，如果他不收取利息，那个补偿就是对借钱者的仁慈了。[24]

这个视角的转变很重要。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能，即正如一个有息贷款会导致放贷者占借款者的便宜，一个无息贷款会导致借款者占贷款者的便宜。如果贷款者因这个贷款承受了损失，那他得到财务上的补偿是不正当的吗？从十三世纪早期，某些经院神学家就指出，有的时候，债权人可以因债务人未及时归还借款而遭受的损失提出赔偿要求。挪威学者奥德·朗霍尔姆（Odd Langholm）解释说：

> 要求补偿的基础，从由于延迟导致的这种损失，延伸到债权人在贷款期限内由于贷款导致的损失，而损失的概念从实际遭受（*damnum emergens*）的损失延伸到一种在相对意义上的失去的利益机会（*lucrum cessans*）。[25]

在允许这两种例外的地方，教会传统的教导出现了重要的裂隙。到十六世纪，这种例外在颇有影响的西班牙人路易斯·德·莫里那（Luis de Molina）和朱安·德·卢格（Juan de Lugo）的思想中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这是与早期传统的决定性的断裂。

转折点：改革

同时，世界在迅速变化——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101】发展中的经济和一个新的商人中产阶级的成长使得无息交易难以进行。两位伟大的改革者，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在高利贷问题上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路德坚定地站在经院传统立场上。在他著名的论文《论商业与高利贷》中，他从多个方面驳斥了这种行为。他说，这“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一条诫命”，[26] 并把高利贷的广泛使用视为极其危险的末世的一部分，他相信他就是生活在末世当中。路德以他典型的丰富的语言说，高利贷“给所有的土地、城市、领主和民众压上沉重的负担，把他们吸干，把他们引向毁灭”。[27] 他提出了一种替代方式——慷慨的、大度的给予或借给。另外，收取高利率的贷款者“通常不得好死，或结局可怕……因为上帝是穷人和窘迫之人的判官”。[28] 路德攻击高利贷的主要目标是他视为贪婪的商人阶层。

加尔文生活在商业城市日内瓦，对商人的行为偏见比较少。在一封给克劳德·德·萨钦（Claude de Sachin）的信中，他对高利贷问题提出了谨慎的建议。[29] 他提出，高利贷几乎总是与两个不可分开的伙伴同行：暴戾的残

酷和欺骗的艺术。

然而，他把对以色列人高利贷的限制看做是临时的，是他们适应当时当地情况的一个方面。十六世纪的日内瓦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而《旧约》以色列是一个情谊（fraternal）联合体。他总结说：“我们不应该按照文献（scripture）中的几个段落来判断高利贷，而应该遵照平等的原则”，[30] 因此，认为“与普通效用（common utility）妥协”是可以接受的。[31]【102】他认为，双方之间因合理的商业原因以适度的比率进行借贷是可以接受的。[32] 不过，加尔文清楚，没有人会向穷人取利息。贷款人一定不能只求自己获利；否则，他就忘记了社群中关系和纽带的连接。

重要的是，加尔文没有采用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关于金钱之贫瘠的观点。在十六世纪，这种观点越来越被放弃，而金钱也是一种商品的观点越来越被接受。因此，金钱有它的价格，而利息表明了所借的钱在一段时间里所带来的权益的价格。随着商业的发展，长期投资的需求也提高了，在可以预期任何收益之前，成本的付出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企业家需要贷款启动事业，而提供贷款的银行家可以正当地期望自己的服务得到一些回报。

当通货膨胀成为生活的一个事实，收取利息也就是难

以避免的了。如果贷款者的钱返回的时候价值变小了，而且，如果他们承担了损失这些钱的巨大风险，那么，他们收取利息看来是公平的。

这种金钱观的改变使得十六世纪成为教会关于高利贷问题传统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后的神学家接受适度的利率，并没有抛弃先前传统中的所有原则。加尔文和其他人正确地看到，《圣经》中禁令背后的主要原则，是对穷人的保护，是热忱地关心他们不应该在脆弱的情况下再受剥削。但是，他们不再感到为此有必要统统禁止一切利息。实际上，他们鼓励人们按律法的精神、而不是文字来生活。

这提出的挑战是，这让人们不知所措。【103】确定一个“合理的利率”是很主观：由政府确定一个数字更容易些。1571 年的一项英吉利议会法案（A 1571 English Act of Parliament）接受最高 10%的利率。随后的几十年里，高利贷行为失去了其大部分道德难处。诺曼·琼斯（Norman Jones）评论到，在中世纪的世界，高利贷被视为贪婪与压迫的缩影，而到十七世纪，“在一个把借钱取息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的世界，这个问题已经降到神学上所顾忌的地位”。[33] 改革后的世界（这也意味着改革后的教会，最后也括了罗马天主教会）接受利息。

或者，是吗？不尽然。

伊斯兰教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动摇。根据《古兰经》第 2,3,4 和 30 章，借贷取息是被禁止的。这不是说，所有的穆斯林都从事免息的经济活动。西方个体的穆斯林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环境。有人把得到的任何形式的利息都做了慈善；另有人自认为不受《古兰经》条款的约束，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34] 但是，从 2004 年起，英国的伊斯兰银行放开了新的可能性。穆斯林（及其他人）现在可以从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一揽子计划（sharia-compliant financial packages）中获取利益。其理论是，从一个账户中自然增加的任何“利润”都是一种风险投资的结果。[35]

一些基督徒相信，穆斯林世界在羞辱西方，加尔文同意收取利息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其中突出者是剑桥的禧年中心（Jubilee Center）[‡]的思想家，最著名的是米切尔·思科鲁特（Michael Schluter）和保罗·米尔斯（Paul Mills）。

禧年经济：债务与权益

保罗·米尔斯是一位经济学家，曾经为国际货币基

[‡] 一个旨在以《圣经》原则思考公共生活的机构。网址：http://www.jubilee-centre.org。下文中的 Cambridge Paper（译为剑桥文论）是汇集有关论文的专刊。百度译为“银禧中心”。（译者注）

金组织工作。【104】在 2011 年 3 月出版的《剑桥文论》中，他探讨了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金融体系的自我毁灭趋势：这是由全球危机带来的深刻、惨痛的教训，在这场全球危机中，从政府到银行，从公司到个人，无不淹没在债务中。他指出，这个体系只能通过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结构及其“控制了经济命脉”的银行生存，把其自身失败的代价转移给“不知情的或无能为力的第三方”。[36] 包括：

- 破产中未得偿付的债权人
- 纳税人，通过补贴公司负债，帮助了那些“大得不会有问题”的银行摆脱困境，或借钱给有债务违约威胁的其他国家
- 储蓄者，他们被迫接受很低的或负的返还利率，而使银行能提供低息贷款给借款人。

他指出，所有这些，是“在阻止债务的大厦倾覆”。[37] 这个体系把不公正和剥削制度化了。

米尔斯相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但是，“采取这种方式需要有勇气来质疑过去四个世纪以来金融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本身。这不意味着剧烈的革新，而是意味着回到教会在它历史的最初 75 年中对金融的理解”。[38] 他

相信，对《圣经》文本的恰当理解揭示了其在关系上的含义。对取息的禁止加强了以色列人共同体（Israelite community）内部的关系紧密性。因为耶稣把爱的命令普遍化了，并且确实在《路加福音》6:34-35 中倡导了借钱给人时不期待归还，米尔斯和思科鲁特相信，收取利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向借钱者收取利息表明，借出的人没有把这个人视为自己的关系群体（relational community）的一部分。"[39]【105】

米尔斯认识到，有人会说，耶稣颠覆了《旧约》中利息的禁令。相似的千银（Talents）（《马太福音》25:14-30）和镑银（Pounds）（《路加福音》19:11-27）的寓言经常被引用来支持耶稣间接地准许收取利息的观点——那个懒惰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谴责，因为他没有把钱在银行家那里投资而使得"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马太福音》25:27）。布莱恩·格里弗斯（Brian Griffiths），戈德曼·萨彻国际集团（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的副董事长，著名的基督徒银行家，是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之一。[40]但是，米尔斯对这些文本有"相反的解读"。[41] 他注意到这个事实，仆人把主人描绘成一个在不耕耘的天地收获的冷酷的人，而主人也表现出接受这种描绘（《马太福音》25:24-25）。主人回答，如果仆人这么想，

那他就早该把钱投到兑换银钱的人那里。这样的回答表示，从银行的存款中获得利息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例子。

我持一种与米尔斯和格里弗斯都不同的观点。第三个仆人不愿意用他的银子做买卖，和他认为主人是一个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的冷酷的人这种看法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最可能的解释是，仆人反对这个事实，即任何他通过贸易得来的利润或益处都不是他的，而是主人的。主人不做任何工作，却从仆人的勤劳和进取中获益。所以，仆人很沮丧，把钱埋到了地里。仆人对主人这样很可能是不对的，但这是他的语言和行为的逻辑。随后，主人回答说：如果你那样看我，那么你就应该至少把我的钱放给兑换银钱的人。【106】这样，仆人就免得做任何工作（不做任何播种的工作），但主人仍可以从增加的利息中获益。

很遗憾，不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以积极的感觉，还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以消极的感觉，这个寓言都被视为对收取利息行为的判断。他们以相反的方式误解了这个寓言。耶稣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利息的道德方面给予评判；把钱给到兑换银钱的人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细枝末节而已。

米尔斯相信，对以债务为基础的金融的批评，从《圣

经》中推导出的结论是，“只要任何合理的利益是正当地获得的，则通过合作或权益明确分担利益与损失的金融投资就会得到积极的肯定”。[42] 在权益金融中，股票持有者行使所有者责任，接受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带来的风险损失。对此并非冒昧的做法，米尔斯发现了《圣经》的支持。在上帝之下，我们应该对未来持一种谦卑的态度，因为只有他确切知道未来（《诗篇》27:1），吹嘘我们的商业计划和将要赚的钱是恶的（《雅各书》4:13-16）。米尔斯还发现，《圣经》中允许通过租赁协议，从财产中得到回报（《出埃及记》22:14-15；《利未记》25:14-16,29-31）。

私人权益投资肯定有更大的亲自参与的优点。不奇怪，这一点吸引了禧年作者们对关系的着重强调。[43] 在一个公共有限公司（PLC）里，权益的持有者比股票持有者亲身投入得多；他们认识管理企业的人，对企业运作情况的关心更有根据。PLC 中股票持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相对来说是间接的（通常不存在）。【107】在第七章，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公司结构问题。这里姑且说一句，即，如果金融危机的一个后果是，鼓励了人们权益金融的热心，从对以债务为基础的金融的依赖摆脱出来，那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不过，我们必须有所保留。正如债务金融一样，权益金融也有不利之处。确实，银行贷款一般要求企业从它可观的成本一开始启动就付利息。与此对照，权益金融允许企业家没有债务负担地启动事业。但是，按正常程序，权益伙伴会期待分享利润，而银行只要求还贷。“天使”投资者或风险资本家通常对投资期望一个很高的回报。他们拥有公司的大量权益，这是个双刃剑：一个企业可能受益于权益合伙人的建议、专长以及参与，但他们也可能是反复无常、犹豫不决和压力的来源。很多取决于所涉及的关系的质量、由衷的共识和价值观。

一个精明的商人会仔细权衡两种金融形式的利弊，来决定哪一种最适合自己特定的公司和个性。金融方式的可能性也是权衡的因素。我希望有一天，在关系公司里，有更多的关系投资。不过，很难想象，每个有此渴望的企业都能有足够的权益资本。

对米尔斯想让时间倒转 500 年的热望，我想再提出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在那半个千年里发生了什么。尽管西方的金融体系走向了危机、泡沫和丑闻，但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108】与任何人一样对这个体系近来的失败进行批评的奈尔·富尔古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一种历史性的

视角：

> 金融创新远非只是意在从欠债家庭吸干生活的血本、或与寡妇和孤儿赌博的吸血鬼所为之事，而是人们从基本的温饱进步到今天众所周知的令人炫目的高度物质财富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从古代的巴比伦到今天的香港，在文明的兴起中，信用与债务的演化就像任何技术创新一样重要。[44]

通过借入和贷出的过程，金钱走得更远了。它没有在银行的保险库里空闲无用、了无生气，而是被放出来工作。那些能买房子、开生意的人，舍此则无能为力。显然，危险是会有的——有人不自量力（借他们少有可能偿还的贷款），也有金融家，利用前者的弱点肆无忌惮地剥削他们。第 7 章，我们我们会看到进一步的证据。但是，收取利息毕竟是一个借贷双方都**能够**获益的公正的商业安排。

贿赂与礼物

《旧约》中谈了很多关于给予贿赂的情况——在当代世界，这是一个持续的行为。美国学者约翰 • T. 努南（John T. Noonan）关于这个题目有一本杰出的著作，把贿赂描述为“一种误导本该无偿行使的公共职能表现的

诱因。”[45]【109】他证明，有史以来，世界的核心意义保持一致，但具体的组成因素（例如，恰恰是“诱因”或“误导”的意思）在各个文化里是变化的。努南观察到，贿赂出现得既公开又隐蔽，有各种形式和规模，诸如性、商品、约定或者现金：“在性这种形式中，贿赂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一个奴隶，一个妻子，一个漂亮男孩。在商品中，包括了床单，杯子，狗，水果，家具，皮毛，高尔夫球，珠宝，日用品，孔雀，猪肉，鲟鱼，旅游，葡萄酒——所有讨人喜欢的东西。”[46]

当今，贿赂可能包括给一个亲戚在一个有名的机构或发达国家大学中搞定一个位置。贿赂的本质不在于诱因具体是什么（这因人而异），而是在于它是否有力量扭曲一个人的判断。

在对《旧约》的研究中，这一点清晰地浮现出来。《律法书》中毫不含糊地提到了这些内容：

- “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埃及记》23:8）
-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19:15）。
-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

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申命记》10:17）。

-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申命记》27:25）。

祭司撒母耳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守护自己的清白，反问道：“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撒母耳记上》12:3）。【110】相反，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撒母耳记上》8:3）。

对贿赂的谴责是先知们频繁重复的内容，特别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赛亚、阿摩司和弥迦。贿赂与首领、审判官、祭司甚至先知生命中疏忽、堕落的罪一同受到斥责：

-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以赛亚书》1:23）
-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以赛亚书》5:22-23）。
-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阿摩司书》5:12）。
-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

钱行占卜”（《弥迦书》3:11）。

- “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徇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联行恶”（《弥迦书》7:3）。

《圣经》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律法、预言和历史叙述——都与对贿赂的谴责连在一起，因为它是对审判的扭曲。个人收益的诱惑改变了本应以公正的立场做出的决定。贿赂是对高标准公共服务的亵渎。它是对信任的背叛。

《旧约》中的很多材料是司法性的。【111】先知们担心，收受贿赂会歪曲审判官的裁决，导致有罪的人（通常是富人）被宣布无罪，而无辜的人（往往是穷人）被定为有罪。审判官客观地考量证据的能力会受到损害：他应该不偏不倚。这与2500多年里的商业背景相关吗？我相信是的。

在政府官员或公务员评估竞争公司的投标的情况中，对冷静的公正有相似的要求。做这些决定应该根据与合同相关的标准，像质量，成本和工期——简言之，对公共利益是合算的。不应该根据多少钱进了私人银行、或其他任何利诱做决定。正如反腐败运动者乔治·穆迪-斯图尔特（George Moody-Stuart）写到：“当个人获益成为一个因素，它会迅速成为一个主要因素，而其他因素

黯然失色。”[47] 应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能最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公司——在一个充斥着贿赂的气候下，不容易赢得合同。

不过，《箴言》似乎对贿赂持更加模棱两可的态度。有六处提到这个问题，三个是否定的，三个是肯定的：

- “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箴言》15:27）。
- “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箴言》17:23）。
- “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箴言》22:16）。
- “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箴言》17:8）。
-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箴言》18:16）。【112】
- “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摀的贿赂，止息暴怒”（《箴言》21:14）。

正是主要依据这几节，南非人达利尔·巴里亚（Daryl Balia）认为《圣经》在贿赂这个问题上发出了“混合的讯息”。[48] 我们怎样搞清楚这明显的矛盾呢？先后列出三点意见：

第一，对贿赂持肯定性意思的语句，很可能应该理

解为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他们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描述生活的现实：在很多社会中，贿赂是行之有效的。很多箴言与其说站在明确的道德立场，不如说进行社会观察。它们提供着常识的智慧。

第二，由于进行了道德评判，突出了这一情况，即权利问题影响着对贿赂的看法。马来西亚循道宗主教华·雍（Hwa Yung）指出：

> 《圣经》中每一处对贿赂的谴责都直接指向那些行使贿赂而破坏公义的人，或者行使其职权压迫别人、特别是穷人的人。我们**没有**发现一处唯独对那些因其处于弱势地位而被迫行贿的人的谴责。[49]

伯纳德·阿德尼（Bernard Adeney）持一种相似的观点。我们在《箴言》中发现的模棱两可的说法：

> 看来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在为避免不公正而送礼的穷人和利用权利剥削穷人的富人之间存在着权利差异。对有权人和无权人的审判不是根据同样的抽象的绝对标准，而是根据其具体情境的关系和意图。[50]【113】

第三，《圣经》的译者正确地在否定意义的时候用“贿赂”（bribe）这个词，而在正面意思的时候用“礼

物”（gift）。在《箴言》18:16 和 21:24（尽管 17:8 没有）使用的 *mattan* 这个词，与在其他地方使用的 *shohad* 是不同的。*Shohad* 在感觉上更负面。大多数文化都区分礼物和贿赂。礼物表达友谊和善意，意在增进关系；通常是公开、直接赠送；往往是相互的——礼物是交换的；不是意在造成一种责任来提供特殊的对待。在有些文化中，比如日本，给予和接受礼物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忽视这点会损害关系的发展。

然而，需要小心。双方对礼物的理解方式可能是不同的。礼物在接受者心里越有吸引力，它越**有可能**造成一种责任感。我对这幅漂亮的画、不同寻常的假期或者一轮附带一顿超级美食的高尔夫球越喜欢，我冷静地评估随后的商业提议的能力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

大腐败与小腐败

关于腐败，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它是“为个人收益而对公共权力的错误使用”。[51] 这涵盖了在一个广泛范围的职位上的各种官员，高级与低级，包括国家政府中的部长、公务员、移民官、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公共公司的董事长、警察、法官，以及地方治安官。代表着其误用职权的支付不论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五花八门。

于是，很多人在区分贿赂和礼物的同时，在**特殊性**支付（*special* payments）和**惯例性**支付（*customary* payments）之间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后者也被称作便利性支付（facilitaton payments），或者，在美国，称作“润滑油”（grease）。【114】特殊性费用是那些为得到不道德、不公正或非法利益而付出的贿赂。这牵涉到处于法律和预言中反贿赂伦理核心的歪曲判断问题。例如，基于往瑞士银行账户的一笔支付，政府部长赞许一项大的军火合同，或者，一名东非的警察接受了一卷钞票，于是对砍伐树木烧炭、而后在路边非法卖出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惯例性支付是为了加速常规性事务或过程，使官员们——更快地——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他们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例如，为使合法的货物报关付给海关职员的一小笔钱，为请求地方政府官员接受注册一个新公司的申请而给他们的一小笔钱。穆迪-斯图尔特把像那样的区别描述为介于“大腐败”和“小腐败”之间的区别。[52]

我相信，这是个有效的区别。在前面对腐败的讨论中，[53] 集中在这个标尺的“顶端”，跨国公司为赢取有利可图的合同而行使的贿赂。近年来，很多国家延迟性地效

法美国 1977《反海外贿赂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把为赢得或阻碍商务活动向外国官员行使贿赂判为非法——尽管一直存在对其是否有决心实施这个法律的怀疑。一个复杂的因素关系到中介机构扮演的角色：公司往往通过中间人获取合同，这些人可能在或者不在公司完全认定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行贿。【115】

不过，我在发展中国家的旅行使我认识到，在国际商业的背景之外，一个国家内部的腐败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给予道德关切的问题。这种类型的腐败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最大，彻头彻尾地令人厌恶。

2009 年我访问肯尼亚的时候，受到很大的触动，腐败侵入法律执行机构的程度如此之大。我亲眼看到警察腐败的证据。在前往内罗毕机场的路上，我的出租车被拦住，进行一个毫无必要的警务检查。官员索要贿赂让我们通过；司机拒绝了。很可能只是因为他的乘客是名白人，警察放弃了。我被告知，警察惯例的索贿意味着，他们往往不能在涉及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执行规定。因此，matatus，这种肯尼亚主要公共交通方式的小公交车严重超载，机动车装载的货物超过限定的重量，毁坏了道路。

2010 年，在我待在班加罗尔的一星期中，腐败是谈

话的主题。我和来自很多不同商业部门的人谈话。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难以否认：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班加罗尔是印度最腐败的城市，它是印度腐败排名第四的卡纳塔克邦的首府。这里，腐败在地方政府一级感觉最明显，特别是在提交申请或更新执照上。拒绝行贿不一定意味着注册最终会失败，它意味着一个漫长的等待，可能是一年或更长时间。付出这种贿赂能在某种程度上扭转鉴定工作，允许一个人在文书链条中跳到别人前面。

对于怎样回应，印度基督徒持不同的观点。【116】我参加了一个白天的研讨会“上帝在星期一：面临工作中的挑战的基督徒”，印度退休的管理人员善塔库马里·素恩德（Shantakumari Sunder）博士敦促基督徒采取一种强烈的反腐败立场；尽管面临着“逆流”而上的种种困难，她毕竟在印度行政服务部（Indian Administration Service）里脱颖而出。有些代表同意；另一些人则感到，对流行文化的某种适应是维持任何类型的商业现状所必须的。[54]

华·雍在大腐败和小腐败之间做了区分，指出在一个腐败体制内，前者是**主动地**实施，后者是**消极地**接受。尽管他倡导尽量地避免后者，他还是认为，在某些文化

中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认真阅读《圣经》发现，一方面上帝的道德律令是绝对性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律令应用于真实的生活处境时，对人类的弱点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包容——从《箴言》中关于贿赂的混合的说法，到在历史某些阶段对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的接受。[55]

华•雍赞赏那些能够讲述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避免行贿的故事的基督徒。但是，他发现有两点需要提醒。第一，这些人往往是成熟的基督徒，期待年轻的信徒这样做是不合理的。第二，他们通常处于商业机构中比较高级的等级，有高级职位的朋友，不是诸如出租车司机和商品推销员这样地位卑微的工人。

我尊敬这位智慧的马来西亚主教的意见。我们这些在腐败相对轻一些的国家中的人，应该对腐败蔓延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遭受的掠夺抱有同情，并且小心地避免把比我们自己所能承受的还重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参见《马太福音》23:4）。【117】不过，重要的是，在最黑暗的情形中，基督徒追求做盐和光，减轻罪恶的最坏的后果，为他们能够改进的事情而工作。按勇气和智慧的命令，即使小腐败也绝不应该常规性地、愿意地支付；对敲诈他们的官员应该提出抗议。

在班加罗尔的研讨会上，也有一些光亮照穿了昏暗。一个是认识到，教会不要把地方政府因其腐败视为“去不得”的地方，而是要鼓励正直的信徒考虑上帝会不会呼召他们在那里服事，来帮助提高行为的标准。另一个是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公司注册和办理许可，现在都可以线上进行了；这避免了“额外”支付的需要，排除了人为的、腐败的因素。这两点都带来了某种希望。

腐败感知指数

反腐败组织“国际透明度”（TI）（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制作了一份年度“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这份指数根据消息灵通的观察者，主要是商业人士、政治分析家和外来援助工作者的感知，为全世界 195 个国家中的 177 个国家的官员就可感知的腐败进行排序。它来自 15 个不同的数据渠道。尽管 TI 指数显然不是一个确定的、没有异议的测量工具，它还是得到广泛的使用，并且，用巴里亚的话说，“让我们一窥全球腐败地图。”[56]

各个国家按照从 10（最少腐败）到 0（最多腐败）范围的得分排序。2010 年为首的是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9.3 分，芬兰、瑞典以 9.2 分紧随其后。垫底的四个位置

是索马里在 1.1 分，阿富汗和缅甸 1.4 分，伊拉克 1.5 分。顺便提一下，印度位于第 87 位，得分 3.3, 肯尼亚位于第 154，得分 2.1。【118】这个列表让人着实困惑的是，在后半部分集中的国家比前半部分密集得多。每个得分为 5 分或更少的国家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少于 130 个国家是这种情况。世界上 10 个最大的石油国家（以储量计）中，有 7 个名列这个指数的倒数第三位——对大石油公司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有人会怀疑，一旦一个国家有了腐败的名声（或确实清白无瑕），便很难去除这种感知。这个指标可能会巩固过时的印象。但是，这些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尼日利亚，曾经被认为是最腐败的国家，在上一个十年里，有了轻微的改进。它现在相当于位居第 134。[57] 智利已经上升到第 21，现在被认为是南美洲腐败最少的国家。我在那里访问的时候，两个不同的人告诉我：“不要试图贿赂一个智利警察。他不仅不会接受贿赂；他还会因你行贿逮捕你。”这令我大受鼓舞。

回顾远一些，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香港发生了一次起到净化作用的文化转型。1973 年，随着殖民地总督莫雷·麦克里霍斯爵士（Sir Murry Maclehose）设立了一个有效的反腐败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转折点到来了。它的成功归因于充足的、稳定的资金，反映出政府消除腐败的坚持不懈的决心。[58] 在过去四十年里，香港和新加坡发展成为领军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肯定与它们是亚洲“最干净”的城市相关的。“文化永远不变”这种宿命论的态度，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显然是进步的敌人。【119】从那些证明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国家身上，我们能够获得希望。

一幅混合的画面

债务和腐败问题表明了《旧约》与今日的全球经济存在着现实的联系。尽管背景变化了，希求一个刻板的性质是不妥的，《圣经》律法的重要原则仍然证明是有效的。

说到底，上帝把希望集中投注在以色列人身上，其后果是什么？《旧约》呈现出一幅混合的画面。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和一些事件，我们从中一瞥上帝设计的生命：这就是诗篇作者说到的平安状态，当：

>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诗篇》85:10-12）

然而，总的来说，这种荣耀的景象是可望不可即的幻象。任凭律法中关于怎样管理经济给出了具体的指导，任凭先知们经常提醒这个分裂的民族正怎样不符合上帝的要求，上帝拣选的子民还是让他大伤脑筋。对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来说，没有理由自以为是地挑剔人家；很难想象哪个别的民族能做得更好。希伯来人的缺陷是人类整体上的罪性的通病。【120】在耶利米的预言中，上帝对人类的不满到达了一个限度，以致他再次说，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耶利米书》31:31,33）

6

在一个儿子身上的希望：帮助被边缘化的人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

（《希伯来书》1:1-2）

上帝通过他特别的信使——先知——对他子民的呼唤大多被充耳不闻。有些人，如耶利米和撒迦利亚，或者遭到迫害，或者死了。[1] 上帝的事业一塌糊涂。极端的情况需要极端的解决办法。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高度原创的答案。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箴言》中如何描绘在上帝伟大的创造行动中工作的智慧。在这部戏剧的下一场，智慧来到了地上——字面意义上的。耶稣不简简单单是上帝用来试炼并把他的拣选的子民拉回其意义的又一位先知。耶稣本就属于上帝的这个位格。这不是他在地上的同时代人能直

截了当地认识到的事情。当他们以耶稣整个一生的行谊来评价他的时候，才渐渐地明白了这个真理。因此，使徒约翰开始把耶稣理解为**道**（Word，大写），他与上帝同在并实际上就是上帝；是照亮每个人的真正的光；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道成肉身**（Word made flesh），充满着恩典与真理（《约翰福音》1:1-2,9,11）。道成肉身这个词描述了神变成人的行为。

用发动机做一个比喻，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上帝除去包装，显出一个新的原型。【122】第一个模型，亚当，证明是一个失望的失败。需要一个设计革命。圣保罗（St Paul）在第一个来自于泥土中的人亚当，和第二个来自天上的人基督之间做了对比（《哥林多前书》15:47；对比《罗马书》5:12-19）。耶稣在成肉身之前就存在，这是无人共有的。但是在他于地上的生命中，他进入了我们全部的人性。矛盾的是，脆弱和危险包围着他生命的开始。[2] 他、马丽亚和约瑟经历了折磨、眼泪和汗水，此乃普通人类的命运。

把手弄脏

约瑟是一个工匠。拿撒勒的居民说约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马太福音》13:55），虽然希腊文 tekton

可以用于用石料的建筑工，也可以用于用木料的工人。儿子通常学习父亲的手艺，所以不奇怪，在《马可福音》对应的段落，称耶稣“木匠，马利亚的儿子……？”（《马可福音》6:3）。成为肉身表明，上帝准备让他把手弄脏，亲力亲为。

作为一个木匠，这肯定在字面意义上也是真实的。十九世纪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画了一幅基督在木匠店里的画，马丽亚正在安慰他，约瑟拿走他手上的一块碎片，他的堂兄约翰端来一盆水清洗伤口。这幅画可能由于太伤感打击了某些人，激起了米莱斯同时代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尖刻攻击，[3] 但是，这幅画阐明了一点，即耶稣的工作生活将同我们一样，留下“荆棘和蒺藜”的痕迹。他可能不仅承受了其带来的身体上的痛楚，而且也体会了其间充满挑战性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不得不对付次等材料的供货商，或者不及时付钱的顾客。【123】当耶稣“开始工作”（《路加福音》3:23）[§]时大约三十岁——路加的意思是开始他的教导和治愈传道。但是，我们可以猜测，直到那时，耶稣是在一种预备的意义上努力工作，

[§] 英文“began his work”“和合本”中译为“开头传道”。此处译文为与前文呼应，暂译为“开始工作”。（译者注）

通过处于日常生活的真正需求中，学习人类的方式。

“把手弄脏”是从事商业的人太了解的事情了。它意味着全方位参与到一项工作中去的意愿，包括那些不愉快的、无比劳累的、困难的、以及在道义上复杂的工作。有些人因为不愿意玷污自己的名声，而对商业不屑一顾。一代人之前，在英国的学术界，情况尤其如此。

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1995 年到 2007 年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尼（John Browne）在他的自传《超越商业》（*Beyond Business*）中，对此做了生动的回顾：

> 那是在我从剑桥毕业前的几个星期，我清晰地懂得了商业是不被高看的。1969 年 6 月：我谈到正在考虑从事商业工作，这引起了我伟大的、杰出的教授之一的布莱恩·皮帕德的反应。当我和一群朋友沿着国王大道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迎面走来。他转头对他的同事说：“这是布朗尼。他将成为一名工业领袖。这不是很好笑吗？”
>
> 他的嘲笑既是对我，也是对商业。那一年，物理学得了一等成绩的学生没有几个，我是其中之一。好学生，如果他们被科学的挑战所吸引并追求知识，是被期望留下来念研究生学位，并成为学者。
>
> 对那些对学术生涯不感兴趣，或学习成绩不够好的人，另一个被看好的选择是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政

> 府部门。【124】银行业也不错，如果你的家庭就是银行业的。法律和医药完全被接受。与这些选择相比，金融——那时称为“城里的工作”——被视为低等的职业。但它还是比商业高级。剑桥环境中有一种不明说但顽固的偏见，即商业是对志存高远者潜能的浪费。它被认为是庸俗的。[4]

布朗尼没有被这种嘲讽吓倒，他离开了剑桥，加入了BP。他很快被派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这倒是他没怎么想到的。

> 阿拉斯加的石油繁荣吸引了一群又一群的单身汉、投机者、想发财的年轻人……在木屑地板的酒吧里，彻夜的饮酒作乐往往以上街打架结束。我确实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冬天，街道布满积雪，当春天温度骤升，积雪开始融化，它们就是泥泞的海洋。[5]

然而，布朗尼卷起袖子，投入进去，在钻井平台上学习自己的本领。就像年轻的耶稣在殿里（《路加福音》2:46），他问很多问题，他学习的热情和开拓新领域的意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稣的使命陈述：拿撒勒宣言

我的一个有点儿奇怪的习惯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

我收集企业的使命陈述。我很想发现企业在宣告什么，在这个热情消退前，收集了大约五十条。【125】尽管很多使命陈述都让人感到乏味、毫无新意，有时候还是能碰到深刻的真理——当它们不是仅仅作为维持公共关系的手段。例如，我喜欢格拉克索史密斯克莱恩（Glaxo Smith Kline）的使命陈述：“我们拥有一个富有挑战、充满启示的使命，通过让人们能够做得更多、感觉更好、活得更长来改善人类的生活。”[6]一个医药公司应该是干什么的，很难在这种描述之上再做什么改进了。让人们能够做得更多、感觉更好并活得更长：我们对此都会说阿门。坚持把这作为你的使命，医药工业的每个工人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职业。基督教信仰应该让人们保持对这种大的图景的清醒认识。

在《路加福音》开篇不久之处（4:16-20），是一些神学家所称的拿撒勒宣言（Nazareth Manifesto）——耶稣的使命陈述。[7]我认识很多受其启发的商业人士。耶稣刚刚经历了他开始传道的关键事件：他被约翰施洗，荒野试炼和圣灵赋能。他回到加利利，利用这个机会制定随后的日程，规划出行动步骤，并且标示出优先次序。

场景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拿撒勒的会堂。耶稣很有可能是被邀请讲话的，因为他已经出了名，是有权威的

经典解释者（《路加福音》4:15），但不是任何一位拉比的学生。

> 耶稣选择读《以赛亚书》61:1-2：
> 主的灵在我身上，
> 因为他用膏膏我，
>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 瞎眼的得看见，
>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126】

耶稣不需要发明一个使命陈述；他在《旧约》中发现一个已经造好了。这一段完全适合他的目标，以致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4:21）。好时光的应许不再处于未来；它当下就被满足——"今天"——并且就在他本人。他就是以赛亚书中说到的主的仆人。他就是被圣灵膏过的人，被盼望的弥赛亚。因此，他回应以赛亚，对四群人许诺了好事情。

[**] 依"和合本"，此段出自《路加福音》4:18-19。《以赛亚书》61:1-2 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译者注）

给穷人的好消息

穷人是没有什么财产的人，对他们来说单单生存就是一场挣扎：一个日工，一个没有土地的佃农，或者一个乞丐。但是，耶稣有更宽广的理解，包括“精神上”[8]的穷人，那些感到不幸的人、自尊心低下的人、感到难以相信别人爱他们的人。在物质上贫穷和精神上贫穷之间可能有很多交叉之处。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是，上帝爱那些*确实*穷苦的人，也爱那些*感觉*穷苦的人。这是一种既以语言——宣告救赎的讯息，也以行动——通过分散财富，帮助穷人减轻穷困——表示的爱。耶稣经常要求较富裕的人慷慨地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路加福音》12:33）；“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路加福音》18:22）。耶稣的注意力与导言一章说的基督徒商业的第二个目标相一致：减轻贫困。

被掳的得释放

另一种翻译是“被囚的出监牢”。这里，耶稣很可能在使用比喻的语言。【127】就我们所知，没有谁因为听了耶稣的布道就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巴拉巴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外）。耶稣确实把人们从罪、恐惧、自怨自艾和社会边缘化的锁链中释放出来。此外，还可能指从债务中释

放出来。有的神学家[9]认为，《路加福音》4：19 暗示着禧年，每五十年一次的“上帝的恩典年”。《利未记》第 25 章描述了禧年是什么样子：人们免除了各种各样的债务，奴隶得到解放，土地守安息（被准许闲置），个人回归自家的产业。[10]

瞎眼的得看见

在原始的希伯来文《以赛亚书》第 61 章中实际上没有这个短语。耶稣好像是从《以赛亚书》42：7 仆人一段谈到了“外邦人的光”的地方加进了这个短语。《福音书》里有若干个例子，耶稣使得瞎眼的人能看见（例如，《马可福音》8:22-26；《马可福音》10:46-52；《约翰福音》9:1-12）。任何感觉的恢复显然是生命的转变。进一步说，耶稣用视力来比喻精神感知力：懂得关于他自己、神和人类境况的真理（例如，《路加福音》6:39， 10:23-24）。肉眼能看到的人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是瞎眼的。所以，他称他的宗教对手，文士和法利赛人，“瞎眼领路的”，因为他们“滤出来蠓虫，吞下去骆驼”[††]；他们纠缠律法的细微之处（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芹菜）却忽略了“律法上更重的事”——公义、怜悯和信实（《马太福音》

[††] “和合本”译为“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此处为使语句通顺，对原文稍加改变。（译者注）

23:23-24）。

受压迫的得自由

“受压迫”的是那些被向下施压因此承受重负的人。【128】这有许多形式：经济压迫（雇主付给工人很少的工资或什么都不付），精神压迫（邪恶的精神控制着脆弱的人）或者宗教压迫（教师们对公众施加对律法苛刻的理解）。耶稣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层次都带来了自由。他许诺他的门徒：“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他转变了其生命的人包括抹大拉的马利亚，摆脱了折磨她的七个鬼（《路加福音》8:2）；撒该受到感化，还钱给他曾讹诈的人，这将给他们财务上的帮助（《路加福音》19:8）；以及所有听到他讯息的人，他说律法是为了人的福利，而不是限制、囚禁他们（《马可福音》2:23-28）。[11]

把耶稣布道的这四个方面放到一起，就构成了对**主的恩典**（*the Lord's favour*）的证明。如果穷人、被掳的人、瞎眼的和受压迫的得到了这样的祝福，他们就亲身体验到了“上帝之善”。耶稣在说：这是一个丰收年——醒来吧！

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经文。基督教顾问公司三协

（Tricordant）[12] 在《路加福音》4:18-19 中看到了他们的使命，要为运作失效和士气低落的机构带来健康。律师詹姆斯·菲则柏（James Featherby ）多年为城市法律公司斯劳特和梅（Slaughter and May）工作，这段经文在这些年里一直激励着他。在 Ridley 的一次会议上，他承认，也许不太可能发现穷人、在监者和受压迫的人在城市里工作，但是他知道有许多人亟需帮助，比如：

- 与资源匮乏抗争的人们
- 遭遇中年危机的人们
- 欺凌、闲话、操纵的对象
- 那些失去了感情、不能道歉的人【129】
- 爱抱怨的人、喝多了酒的人、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的人、不能关掉手机的人、被各种目标或自我中心驱使的人。[13]

但是，最接近效仿拿撒勒宣言的商业人士，他们的雇员和客户代表了耶稣看到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他们是社会企业家，是把改变社会、减轻贫困或维护环境的可持续性作为开办公司的明确的目标的人们。

一个例子是，一群基督徒开办了桑莱特电力公司（SonLight Power），这是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洪都

拉斯推动太阳能的美国公司。凯文·萨松（Kevin Sasson）离开了在硅谷的成功的职位，成为执行主任。他说，桑莱特电力系统通常安装在离网（off-grid）的小学校，“提供社区事务的会场，成人教育课程，医疗诊所，以及交流中心”。[14] 桑莱特给当地居民培训可再生能源的基础知识，如何维护新的太阳能系统，这样保证了持续性。这个公司的名字是它所受启示的一个证明——神的儿子，他是世界的光。

耶稣的蓝图：神的国度

单独一个短语统辖了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记录的耶稣的教训。[15] 这个短语是**神的国度**（*the kingdom of God*）。如果说《路加福音》4:18-19 是耶稣的使命陈述，那么公司蓝图就是耶稣到来的最近的地方，神的国度在此降临。

耐人寻味的是，耶稣在所有关于天国的谈话中，从来没有界定过它。耶稣说它**像**什么，而不说它**是**什么。【130】当就天国布道时，他最喜欢的办法是打比方；《马太福音》第 13 章包括了不少于七个以“天国像……”开头的类比。此外，耶稣用行迹、也用语言来阐述天国；他用他所做的事情、他表现的态度和他对人们生命形成的影响来展现天

国。[16]

天国的类比大量采用日常工作中的描述。确实，我们通常以职业来判断哪些人是核心人物的。这恰恰是耶稣选择的演员表，令人印象深刻：

- 一个出去撒种的农夫（《马可福音》4:3-9）
- 一个把面酵混在面粉里做面包的妇人（《马太福音》13:33）
- 一个变卖了财产买宝石的商人（《马太福音》13:45-46）
- 一个算计花费的盖楼的人（《路加福音》14:28-30）
- 一个找失去的羊的牧羊人（《路加福音》15:1-7）
- 一个面临被解雇、盘算着自己的未来的管家（《路加福音》16:1-8）
- 一个面对着寡妇请求伸冤的冷酷的官（《路加福音》18:1-8）
- 一个被法利赛人藐视对待的税吏（《路加福音》18:9-14）
- 一个与仆人算账的王（《马太福音》18:23-35）
- 一个对付嚣张园户的葡萄园主人（《马可福音》12:1-9）。

这些故事中描绘的人，有人做的事确是人们所期待的，另一些人做的事令人大为惊诧、不满，或者令人思考。通常，这会是一个故事的转折点。【131】

耶稣用这么多工作场景中的事例做什么呢？例如，他讲葡萄园中的工人的寓言是什么意图呢（《马太福音》20:1-6）？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人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有人一整天，有人才一个小时）里，雇佣了一些临时工，却付给所有的人一样的工资：一钱银子。我听说过，针对工业中的行为，人们从这个寓言里学到了截然相反的教导：一种是主要管理者的观点，雇主在这个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因此有权利想付给雇员多少工资就付多少。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商店职员的观点，即所有的雇员应该拿同样的工资，不管他们做什么工作，也不管各人的努力程度。最后，是律师的观点，即只要雇主遵守与雇员的协定，没人有权去指责抱怨。拉丁教会（Latin Church）的教父杰罗姆（Jerome）和奥古斯汀（Augustine）持这种观点。他们两个人都反对工资方案是不公正的说法，因为葡萄园主人付了约定的数目；工人自由地与他议价，而他也说话算话。这使两位神学家主张，把自由议价作为考察工资是否合理的途径。[17]

从真实的意义上说，耶稣极不可能把他描述的结果作

为一种合理的商业行为。相反，他精心地描述了这个**异常的**行为，是为了强调上帝的恩典，他对晚悔改之人的宽恕、接受的恩典。换句话说，恩典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说到救赎的时候，我们都依赖上帝的喜爱。因为我们人类被置于不同的心智水平，上帝对那些捷足先登的人的恩惠很容易被视为对那些终其一生服事他的人的不公平。但是，这只突出了一点，即上帝的怜悯超越了所有人类关于公平的观念。【132】从很多其他寓言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耶稣最关切的主题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或者说，是接受上帝赐予的救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 我不愿意提出，我们抛弃了从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故事中提取对于我们工作行为有所指导的所有尝试。在我与戴维·克劳（David Clough）合著的汇集册（Grove Booklet）《高管薪酬的伦理》（*The Ethics of Executive Pay*）中，我们讨论了耶稣谈到的各种有关人类的职业（管理者、管家，佃户或仆人）的寓言与公司管理的棘手事务中的相关性。我们很警觉地避免对耶稣意图的牵强附会，同时，确实发现了一些很有建议性的细节，主要是：

- 判断仆人要根据其长期的表现来进行——不是表面的、短期的评价（《路加福音》12:45；《马太福

音》25:19）

• 下面的看法有决定意义：在一些情况下提拔，另一些情况下解雇。稳定、长期的表现受到奖励，但不能姑息不断的失败（《路加福音》12:43-44,47-48；《马太福音》25:16-17,28）

• 评价既包括财务表现（《马太福音》25 章的寓言），也包括与人相处的表现（《路加福音》12 章的寓言）。

我们提出，长期的、与表现相关的、果断的和关系性的，这些都是高管薪酬设计方案中必有的标准。[18]

此外，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即耶稣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个工作与交换的世界，买和卖是人类日常的活动。【133】最近一篇关于神学与工作的文章提出，耶稣的教导“表现出一种对贸易与积累财富的公开的敌意”。[19] 尽管耶稣肯定警告过对金钱的崇拜，我还是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他把贸易**本身**视为成问题的。耶稣生动形象的教导风格肯定了这个工作的世界，同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把他们吸引到一个更广大的境界中。

当我们梳理耶稣关于神的国度的各种教导，有一点变得很清晰，即神的国度是上帝**统御**（*reigns*）或**治理**（*rules*）

的地方。并且，其疆域就在神的治理得到承认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毕生的一切都接受他的治理。在耶稣的寓言里，商业不仅仅是反复用来作为神国度的一个比喻。它是生命中的一个关键领域，上帝在此做工以扩大他的国度。

税吏的朋友

耶稣对同伴的选择是非传统的，他发现自己因此遇到麻烦。在耶稣传道的早期，文士和法利赛人注意到耶稣怪异的社交习惯，就对他的门徒抱怨，问“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马可福音》2:16）。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加福音》15:1-2）。显然，耶稣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指责，因为他观察到他这个时代的人：“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路加福音》7:34）【134】评论家乔治·凯尔德（George Caird）评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态度说：“他的批评者相信，他们全部的义务就是避免任何可能玷污自己清白的事，而耶稣对他们的精神安全法则不屑一顾，这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20]

税吏为罗马人和希律王工作，罗马人让别人替他们做

肮脏的工作，希律王需要钱进行他浩大的建筑工程。他们极不受人喜欢，被禁止进入犹太会堂。犹太人从自己的犹太弟兄那里收税，因此，他们被看做同谋者和叛徒。三个等级的税吏构成了一个大金字塔系统：监工在顶端，税吏长负责某个具体城镇或地区（如耶利哥的撒该，《路加福音》19:2），税关的管理员（如加利利湖边的利未，《马可福音》19:2）。[21] 税吏从收上来的钱中付给自己工资；只要税吏按约定的数目上交税钱，罗马人不在乎他们随心所欲收多少钱。

于是，这是一群以极不受欢迎为代价而致富的人。在与这些人交往的时候，耶稣表明，他不是惟独关心穷人。他的心对所有被社会边缘化的人——那些受到偏见的排斥和折磨的人敞开的。这种偏见往往是非理性、不公平的：正如税收通过为公共服务收钱而服务于公共利益，这是一个合法的职业。无论人们怎么不喜欢，总要有人去做这个“肮脏的工作”；想一想中世纪欧洲犹太放贷者的处境。[22] 但是，不公正的偏见往往与合理的批评混杂在一起。

耶稣看到了躲在敲诈行为和社会孤立后面的人。因此，他别出心裁地召唤利未做门徒，正如他不顾众人的议论，招呼在桑树上的撒该并让他请自己吃午餐。他花时间与税吏吃喝的事实表明，耶稣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或许，

他发现了他们办事直截了当，随时愿意开拓家园。不过，耶稣对税吏病态的生活方式不抱幻想。因此，他针对自己的行为回应批评者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马可福音》2:17）。在《路加福音》15:1-32中，他对批评者的回答是讲了三个寓言，表明上帝对“失去者”的爱：失去的羊、失落的一块钱和失去的儿子。

耶稣传道的这个维度与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关呢？没有什么人喜欢交税，在有些国家，存在一种对政府善用税金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在南印度的基督徒群体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中，税吏这个职业不再招致像耶稣时代那样的耻辱。在英国和美国，从招致不受欢迎和公众鄙视的意义上说，是银行家承担了税吏的责任。情况不是从来如此。银行家曾经受人尊敬为正直的楷模。这个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过去二十五年里不断累积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 2007 年到 2009 年金融危机这个趋势的结果。[23] 银行家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追求高风险的政策和神奇的操作，而当这些情况真相大白，并不可靠，就导致了人们对整个体系失去信心。政府行为支持某几个领军银行增加公众的借款水平达到一种不可承受的程度，而接下来又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这个事实也造成了银行不受欢迎的后果。最重要的是，在银行工作的人所得到的

巨额报酬，使一般公众感到困惑、惊讶和愤怒。

2011 年五月出版的《经济学家》中的一篇文章对这种情绪做了很好的总结：【136】

> 面对公众怨声载道，银行继续给高端人员大肆发钱。实际上，华尔街现在给其银行家付的钱比金融危机前还要多。在欧洲，银行部门的工资总额去年跃升了 8%，超过了 2007 年的记录。英国的投资银行家做到极致，有些银行的工资竟提高了 20%之多。对此感到愤怒的不仅是公众。政治家们也感到很绝望，银行会一只手拿走公众的红利，另一只手滥发工资。[24]

可见，银行家看来像是新的被社会排斥的人。在这个奇怪的转折点上，基督徒必须意识到不要简单地随大流，跟着造谣起哄。需要驳斥很多胡乱的指责。当西方政府向银行投入资金以保证它们生存下去，拯救银行家就不是首要的事情。这个措施保证了普通大众的存款安全。不是所有的银行在导向危机中做事都不负责；甚至那些从事合理的金融项目的银行都受到了银行间拆借这个死结的影响，它威胁着整个体系，使之溃败不堪。引发了这场危机的金融家不是公共债务增加的唯一责任者；很多政府已经存在巨大的赤字预算。在衡量责任和过咎的时候，需要

慎重判断，避免把某一个群体当替罪羊的诱惑。如果耶稣特意表明他接受撒该，那么今天基督徒可以努力地效仿他，友好地对待受到困扰的银行家。

然而，耶稣的友好在撒该的心里激发了巨大的改变。耶稣没有讲他有什么道德上的缺陷，他的变化就发生了；主人光临一餐饭，就足够了。【137】撒该受到感动，称："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加福音》19:8）。人们可能希望这慷慨和赔偿的结合能使那些银行界的人受到启发。无疑，很多人能慷慨地拿出一些财物投入到有价值的事业上。[25] 而赔偿，相比而言，对大多数银行家来说既是不必要的、也是困难的。不过，既然他们的错误确实对别人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就对公众有所亏欠。他们肯定至少能做的是，对自己从工作中积聚金钱回报的欲望有所节制。具体说，我建议，银行家们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拿到的基础工资又高、奖金又多，这种期待怎么样呢？二者取其一，也许还可以；二者兼而取之，怎么能合理呢？[26]

娼妓的朋友

把耶稣称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罪人"意味着哪类人？回答是，一贯并故意违反法

律的人。在这群人里，卖淫者——那些出卖自己过性方面有罪的生活的人——是最突出的。《申命记》23:17-18 对女性和男性的庙妓都加以禁止，这与异教徒的生殖崇拜有关。《利未记》19:29 要求父母：“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箴言》警告人们防范外女（5:3-5）[‡‡]，把妓女描绘为“深坑”（23:27）。

在《马太福音》21:28-32，耶稣明确把税吏和娼妓归为一类。【138】他讲了一个寓言：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告诉父亲他今天要在葡萄园干活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另一个儿子说他不会做这件事但却做了。耶稣的话震惊了宗教领袖听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见《马太福音》21:23），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关于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娼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是很可能包括独立的性工作者和被他人雇佣的人，如历史上大多数社会那样。无疑，伪善包围着这个现象，表面上受人尊敬的男人中伤那些做娼妓的女人，却享用着她们的服务。耶稣洞察伪善，[27] 他对娼妓的同的态度，

[‡‡] 依“和合本”，《箴言》5:3-5 用的词是“淫妇”（adulteress）；“外女”（wayward wife）这个词出现在《箴言》23:27。（译者注）

部分出自于他意识到了造成她们困境的双重标准。

有关耶稣与娼妓交往的详细信息，我们很大程度上依靠在《路加福音》7:36-50 中，他遇到为其抹油的罪女的故事。不幸的是，围绕这名妇女的身份，有很多的困惑。在教皇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the Great）591 年的讲话后，出现了一个倾向，把她与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位耶稣最密切的伙伴之一联系起来。虽然这样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线索，并且产生了非常著名的基督教艺术作品，把马利亚描绘为红色的长发松散地覆盖着丰满的身体，[28] 但其《圣经》根据是薄弱的。在《路加福音》第 7 章这个罪女的故事后面，紧跟着福音书中第一次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她是《路加福音》8:2 中“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的女人。如果这两个女人是相同的一个人，路加肯定早就说清楚了。

路加描述的这个事件发生在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家里。凯尔德在他的书中对这个场景做了出色的描绘：【139】

> 西门非常尊敬耶稣，称他为拉比（Rabbi），半信半疑他可能是一位先知；他对他极其感兴趣，邀请他来吃饭，但是用正式的礼貌接待他，没有任何小动作——没有洗脚、没有亲吻、没有香膏——这些象征着热情的欢迎。在东方的宴会上，客人把鞋子留

> 在门口，斜靠在矮沙发椅上，脚伸向后面。开着门允许各色人等进来这种情况并不稀罕，从寻找食物的乞丐到寻求知识享受的拉比的崇拜者。[29]

这暗示着“城里的女人”（娼妓主要是一种都市里的现象），“一个罪人”（足以这样说）能够进来。她已经得知耶稣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我们不知道她先前是否见过耶稣。她可能见过，或者，也许，她已经见到或听到的关于他的事迹足以解释了她的行为。她拿着盛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身后，但是她甚至还没打开玉瓶，就开始哭泣，然后，“忘记了这是一名正派的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永远不会做的事”，[30] 她解开她的头发，用她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然后，她亲了耶稣的脚并涂抹上香膏。无疑，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大为惊骇，既为这女人的举动，也为耶稣允许她这样做：“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路加福音》7:39）。

耶稣理解，这个女人洗涤、擦干他的脚是一种大爱的证明，表明她已经获得了宽恕。从她对耶稣的了解，这个女人认识到，甚至是她，一个臭名昭著的罪人，也能够被宽恕，并且，耶稣接着再次肯定她：“你的罪赦免了”（《路加福音》7:48）。西门只看到一个罪人，而耶稣看到一个被原谅、被拯救的人。【140】通过一个简短的寓言，耶

稣迫使法利赛人不得不承认，一个欠债者表现出的感激程度往往与被取消的债务数量是相关的（7:40-46）。

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后来怎样了。让她改变职业很不容易，因为少有自尊的男人愿意娶一个从前的妓女，而且对一个单身女人来说，很难找到其他工作。不过，很难想象，在经历了如此深厚的赦免和爱之后，她会返回老路上，继续做妓女。在一种全新的光照下自我审视，往往是一个人从根本上改变职业的前奏。

娼妓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计算，任何给定时刻，都有 4 千万娼妓在工作。在泰国（价值 35 亿美元）和日本（价值 27 亿美元），这种职业尤其泛滥；这个数字使得以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著称的荷兰相形见绌（只有 1 亿美元）。在二十二个国家，娼妓是合法的、有规可循的。大约 250 万人是非法性贸易的受害者，其中不到三分之二来自东欧。[31]

这种现象的规模是巨大的，但是好消息是，当今世界发展迅速的一项社会事业是为性工作者提供其他的工作机会。基督教信仰以布道为原型，以耶稣为榜样，给许多旨在解救娼妓妇女的机构提供了启示。

绿洲是一个基于英国的全球性组织，旨在通过促进包容、反对不公来服务和转变社会。它在十个国家的贫穷及

边缘化群体中开展工作；对娼妓的传道集中在印度。【141】在孟买和班加罗尔，绿洲工作人员结识街道工作者（street workers），与她们交朋友，通过为想离开娼妓行业的人建立的一个收容中心（drop-in centre）和一个中途之家（halfway home）与之建立关系。对妓院里不满十八岁的女孩，他们转而求助警方。警方往往不予回应，但是当我访问班加罗尔时，绿洲工作人员正为一次解救了四十四名女孩的成功的联合行动而欢欣鼓舞。绿洲下一步的行动是为这些女孩和妇女提供过渡性的照顾和咨询。国际主任安迪·马斯森（Andy Matheson）讲述了一个名叫萨莱（Zaline）的加尔各答女孩是如何在十二岁时被骗入性贸易的。她在妓院干了六年，变成 HIV 阳性，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离开那里。

> 她刚出来时，我们把她安排在一个家庭中，我们以为这个家庭能够创造一种她所需要的欢迎的气氛，但是他们无法应对她 HIV 阳性这个状况，于是，她又一次被拒绝了。然后，她到了我们为因 HIV 阳性而遭排斥的妇女和儿童新建的社区里。在那里，她通过自己感受到的爱、接受的咨询和培训，开始把自己破碎的生活重新整理起来。接下来的七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她最终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

帮助其他被非法娼妓买卖的人。所以过去七年来，她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就是在做这件事。[32]

另一个从前的妓女，萨瑞卡（Sarika），用了很多年才从她十几岁就开始遭受的剥削中恢复过来。但是，在孟买外边的一个绿洲照顾之家伯纳塔·巴宛（Purnata Bhavan）中，她得到了明显的治愈。她已经学会了阿丽工艺（Aari, 印度的串珠制作），希望未来能够从事这种工作。

在帮助妓女进行恢复工作的同时，绿洲开设企业为易受伤害的年轻女性提供其他就业机会。【142】我参观了雅各井（Jacobs Well），这个机构就是以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地方命名的——那个妇人被社会排斥、结了很多次婚；她在井边自遇见了耶稣，生命得到了改变。这是印度绿洲在班加罗尔开办的公平贸易企业，生产包括服装、袋子以及珠宝等多种产品。该机构为年轻女性提供为期一年的课程，这些姑娘大多是来自棚户区说泰米尔语的印度人，这些人显示出做针线活的天赋；然后，教给她们缝纫、刺绣和裁剪的技能，同时介绍《圣经》和基督教。雅各井雇佣毕业者，在她们成为熟练的裁缝之前，继续提供一年的培训。她们也精通团队工作，使用计算机进行产品设计、沟通，以及出口包装。每个星期三上午，《圣经》学习提供对基督教信仰更进一步的了解，形式上耐心体

贴，没有压力。我在一个星期三进行访问，竟马上被邀请来带领！公司为那些贫穷背景的姑娘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转变机会，否则，她们可能就会被吞噬到性产业中去。

我继续参观了一个大约有七十名妇女和儿童的团体，这个团体是马哈里尔•阿兰信托机构（Mahalir Aran Trust）在毗邻泰米尔纳德邦的达摩布里运作的，一位真正富有感召力的斯里兰卡妇女，莫西•埃蒙迪（Mercy Imondi）在她丈夫的支持下，领导着这个机构。莫西二十一岁的时候参观过这里，大大震惊于甚至是在纯粹乡村的地方都发生着的“性剥削”（她见到的一名妓女才 9 岁），因此，她创办了一个为妇女和儿童的避难机构。马哈里尔•阿兰的意思是“一个保护妇女的地方”。现在，这里大部分妇女为一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名为“花开沙漠”（Flowering Desert），制造漂亮的丝绸围巾、靠垫、黄麻袋子以及贺卡；我看到了她们在缝纫机前工作。【143】在设计、产品开发和工艺流程等方面，莫西得到一位英国艺术家珍妮特•罗格斯（Janet Rogers）的极大帮助，后者运作着一个顾问公司，名为 VIA 设计——VIA 代表意像、灵感与行动（Vision, Inspiration and Action）。在达摩布里的最新的一个创举，是一个现场医疗诊所。我很少看到过散发着如此的勇气、勤奋、欢乐和对未来的希望的地方。

我在内罗毕的时候，也遇到了帮助性产业妇女的基督教机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Bega Kwa Bega，斯瓦斯里语的意思是“肩并肩”。这个机构得到圣约翰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持（St John’s Roman Catholic Church）的支持，在克罗哥丘（Korogocho，贴切的名字，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混乱”）特别拥挤的棚户区工作，这里，12 万人挤在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没有自来水或适当的卫生设施。它的主要使命是解救在内罗毕中心区从事娼妓工作的妇女。如果任凭情况继续下去，很多人在三十岁左右就死于AIDS、流产失败和酗酒。这个机构提供了可选择的工作机会，制作剑麻篮子、拼接袋子、串珠和玩具。当地的神父每周一来看望这些妇女，和她们一起祈祷。在伊格那提俄斯·马耶洛（Ignatius Mayero）的领导下，肩并肩实质上是以一个合作性的自助社团运营的。[33] 象许多其他有价值的非洲企业一样，它得益于位于纽卡斯尔（Newcastle）的社会投资公司——利益分享（Shared Interest）提供的贷款。这笔贷款使肩并肩能够买到十八台新的缝纫机，招募了更多的妇女，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为伊格那提俄斯买了一个数码相机，帮助他进行市场营销。

尽管这些各式各样的社会企业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小滴水，它们却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希望的迹象。他们与花

时间与社会中最不受尊敬的一部分人在一起的神的儿子的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很多在性产业中工作的人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144】她们之所以做了娼妓，是因为她们的家庭把她们卖到了那种环境中，她们看不到其他谋生的途径，或者受到犯罪团伙的牢固控制。她们需要我们的同情，而不是谴责。娼妓是性的腐败，因为它把一种应该是自由的爱的礼物变成了商品交易。因此，反对娼妓的最有成效的办法是提供其他形式的商业机会，这是既恰当又令人鼓舞的。如此作为的基督徒是一种真正的为善的力量。在比喻的意义上，他们可能正在把手弄脏，但是，改变那些在社会的道德边缘挣扎的人的职业前景，这是耶稣心目中最重视的工作。

被盼望的弥赛亚

随着耶稣在加利利周边继续布道，给人们带来教训和治愈，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他的十二个门徒越来越兴奋地猜测他的身份。在接近凯撒利亚腓立比村庄的时候，耶稣追问他们，他们以为他是谁。即将获得彼得这个名字的西门毫不犹豫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16）。

耶稣接受了对他弥赛亚身份的宣告：“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17）。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上帝指派的军事解放者，他会推翻这个国家的压迫，恢复大卫王朝，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王国。当彼得尊称耶稣是弥赛亚，他可能是希望耶稣最后会成为那样的领袖。耶稣死后，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边的对话生动地认可了这一点：“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加福音》24:21）。耶稣的有些行为太令人震撼了，使人不由得想起《旧约》中的解放者摩西，于是他们把众人的热情推向高潮——在耶稣让 5000 个人吃饱（《约翰福音》6:14-15）后，他们想让他做王。

然而，耶稣对自己身份的理解与大众的期待截然不同。尽管他的门徒中至少包括一个革命派的奋锐党人，耶稣还是避免暴力。一个教他的追随者“把另一边脸转过来”和“再多走一里地”（《马太福音》5:39-41）的人是不太可能领导一场反对罗马人的暴动的。这也许是犹大最终出卖耶稣的原因；他对耶稣的幻象破灭了。

耶稣嘱咐门徒保守秘密不久，他的弥赛亚身份就暴露了（《马太福音》16:20）并且，他知道，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暴虐的结局，他严厉地斥责彼得试图劝他另寻他路。很清楚，耶稣把弥赛亚的角色看做是魔鬼的试探，此间他领

头的门徒刚刚经历了被称为有福的喜悦，马上又经历被称为撒旦的恐怖（16:23）。

《路加福音》中，从耶稣“定意去耶路撒冷”（《路加福音》9:51）开始，字里行间就弥漫着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命运的强烈感觉。耶稣最强大的敌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那里。堕落、邪恶的地方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其一；疏远亚那和该亚法大祭司家族危险更大，后者与罗马征服者串通一气。耶稣从来不是个回避矛盾的人，他在殿里与大众辩论可能引起严重的麻烦。当耶稣的门徒认识到，他决意要往都城去接受他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变成了恐惧。这种情绪由多马表达出来，他视死如归地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约翰福音》11:16）。在神之子身上的希望处于平衡状态（lay in the balance）。【146】

7

希望的死去与复活：正直、牺牲与证实

多马的预感是对的。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以他在十字架上死亡告终。

“耶稣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回答，凡人的，神的。凡人的解释是，公元前 30 年，耶路撒冷的某些个人和团体希望摆脱耶稣。马太清晰地指出了第一个团体：“当时，祭司长和民众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马太福音》26：3-4）。两个主要动机解释了他们对耶稣的憎恨。

第一个是律法。耶稣激怒了当时的宗教机构，因为他们视他为违法者。他自由地解读安息日律法，他坚持与臭名昭著的罪人交往，他为自己所做的直接或间接的断言，都使他在那些醉心于寻求错误的人看来，呈现出违法者的形象——尽管他实际上在最深程度上遵守着律

法。宗教领袖无法欣赏上帝在耶稣身上所做的新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上帝爱并且欢迎每一个忏悔的罪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

第二个原因是嫉妒——一种敌意的、恶毒的羡慕心理。彼拉多看到："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马可福音》15：10）。【147】他们被耶稣激怒，不仅因为他们不认同他对律法的理解，还因为他非常受欢迎。民众倾听他的教诲，并且按照他的每一句话行事；他们带着问题和疾病来向他求助；当他到达耶路撒冷时，他们像接待皇家一样接待他。耶稣取代了宗教领袖，赢得了民众的尊敬。我们不应该低估那些内心充满仇恨的人的嫉妒心在将耶稣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仅有占领了罗马的人才有权利处以钉十字架的死刑。是本丢彼拉多下达了命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屈服于祭司长的压力和躁动的人群的叫喊："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马太福音》27：24）。

彼拉多的动机是权宜之计。作为总督，他想尽可能安静地生活。一场暴乱会削弱罗马法律。消息会抵达罗马，损害他的名誉和事业前途。所以，尽管耶稣看起来

是个无害的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19：6）），彼拉多的自我利益还是使他下令牺牲耶稣。

此外，希律安提帕王是重要的配角。他统治的加利利是罗马帝国的附庸国。《使徒行传》4：27 将耶稣的死归咎于“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希律处死了施洗约翰。耶稣意识到他阴险狡猾，称他为狐狸（《路加福音》13：32）。当彼拉多知道了耶稣是加利利人时，就把耶稣解到正在耶路撒冷访问的希律那里。希律曾是个花花公子。他看见耶稣非常高兴，因为他想见他，希望看他“行一件神迹”（《路加福音》23：8）。当耶稣拒绝遵命时，希律和士兵便鄙视他，嘲笑他，并把他解回彼拉多那里去。【148】

耶稣与许多他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是权力政治的受害者。他是串通在一起反对他的人和系统——彼拉多和罗马皇帝；该亚法和犹太祭祀权威；希律和分封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共同利益决定了这个能够调动强大的群众追随者的人必须被除掉。耶稣是个好人，他不应该死。但是，他生在高度紧张的局势里。他那个年代的各种势力共谋反对他。

但是，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与宗教和政治权威发生冲

突而把死亡当成不可避免的事。他将自己的死看作是毕生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他谈到，通过完成上帝交给他的工作，他在地上荣耀了上帝（《约翰福音》17：3）。[1]工作谈话机构(Worktalk)的创始人杰夫·夏托克(Geoff Shattock）写道：“我们往往不把死亡当作是工作……但是对拿撒勒的耶稣来说，这六个小时的时间确确实实是一个代表了他命中注定的工作之巅峰的工作‘班次’。”[2]我们后面将检验为什么是这样。现在，让我们仅仅注意这个事实，即，耶稣是在进行他的工作时死去的。基督徒相信，他的死是独特的事件，带有特殊的拯救意味；他死去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既是极端的，也幸亏是限于过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耶稣的死与发生在商业世界里的重大事件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

在工作中死去

一个惊人的例子是 9/11——由于一场邪恶的阴谋，商业人士遭受了惨烈的死亡。

2001 年 9 月 11 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绑架的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在世贸中心工作的 2606 人遇难。[3]【149】美国航空 11 次航班在早上 8：46 撞向世

贸大厦北座大楼。撞击的中心是 93-100 层，属于威达信集团（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一家全球专业服务和保险经纪商。他们失去了正在那里工作的所有 295 名员工和 60 个承包商。然而，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是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康托菲茨杰拉德公司（Cantor Fitzgerald），其公司总部在 101-105 层。那天早晨去上班的 658 名员工（大约是他们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二）全部遇难。在大厦的最顶层，当时在世界饭店的窗户边的 164 名员工、来宾、承包商全部遇难。

南座的大屠杀相对没有这么广泛，因为在 8:43 到 9:03 之间，当第二架飞机——联合航空 175 次航班撞上时，很多公司已经开始疏散人员了。但是，仍然遭遇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损失最严重的是怡安集团（Aon Corporation），该公司经营险管理服务、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办公区域位于大厦的 91，98-105 层，处于撞击区域以上的几层。怡安的员工中，924 名成功疏散，但仍有 175 人葬身其中。

一些评论员认为，这次袭击揭示了穆斯林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美国军事霸权的深刻敌对，而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同样遭遇了袭击）分别是强大的视觉符号。比如，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写道：

> 这些目标部分是象征性的，代表全球资本和美国军事力量；部分也是物质性的，意图通过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和主要的金融中心的潜在的戏剧性衰退，摧毁航空产业、集中在纽约市中心的商业，以及有可能是全球产业本身。[4]【150】

但是，主要动机更可能与中东的事件相关。基地组织及其罪魁祸首奥萨玛·本·拉登宣称，美国支持以色列，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驻军以及对伊拉克的制裁都是袭击的理由。[5]很明显，劫持者想要杀掉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他们不关心是哪些美国人，或者说实际上很多其他民族的人，在袭击中丧生。[6]不管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对是错，都不是由在双子塔为商业组织工作的人们负责设计或实施的。仅仅因为是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工作，他们就成了一场国际阴谋的无辜受害者。他们投入在公司职业上的所有希望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好年华失去了生命——如同耶稣一般。

更多情况下，人们死在工作岗位上是因为工伤事故。根据工业劳动力组织的计算，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 3.37 亿起事故发生，60 万人因此丧生。[7]2009-10 期间，在英国就有 152 人死于工伤事故。[8]某些工业灾害在人们的记

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因为它们规模很大，并产生了持续影响。1984 年，接近 4,000 人死于印度城市博帕尔（Bhopal），那里，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工厂的一个地下存储罐的阀门破裂，将异氰酸甲酯气体释放到大气中。约有 4 万人因此致残或罹患严重的疾病。美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发生在 1947 年的德克萨斯城，当时，货轮 SS Grandcamp 在装载 2,300 吨硝酸铵时，船上发生火灾，引起了大爆炸；随后的连锁反应致使 581 人丧生，超过 5,000 人受伤，整个码头都被摧毁【151】。

2005 年，德克萨斯城再次因为令人难过的原因而上了新闻。当时，英国石油公司精炼厂发生爆炸，15 人丧生，170 人受伤。分离塔汽油过载，随后一系列操作失误，导致了蒸汽云的产生，接着不知不觉地被一辆没熄火的轻型货车所点燃。约翰·布朗，当时英国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在听到这一事故的消息时，写道“我的血凉了”：“关于那一天的记忆是灼热的。这是一个悲剧，如此令人震惊的悲剧。”[9]在灾难发生前的五年里，英国石油公司一直拥有良好的安全记录。但随后的贝克报告（Baker Report）批评该公司只注意职业安全，却忽视了流程安全中的许多关键的地方。

绝大多数工业事故是由严重的错误引起的。有时候，

这些事故是随后死亡或受伤的工人造成的。更多的时候，这些情况是管理人员造成的，他们或者对设备与系统的选择负有过咎，或者对维护与检修过程监管马虎，或者没有能够在公司中创建一种警觉的安全文化。结果是，工人们没命了。

这些事故过去了，留下了纠缠不清的责备、否认和悔恨。丧失亲人的人们往往气愤填膺；不幸的高管们处处感到内疚。希望，总是这样渺茫。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把最后一句鼓励给了一个与他同钉十字架的人。这个强盗责备他的同伙跟着别人嘲笑耶稣，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耶稣相应地用惊人的话带来了希望：“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3）。

诚信的代价

公司也会死亡。虽然事后我们也可以在企业文化衰落上找到原因，但与个人在工业事故中死亡一样，公司的死亡也可能会突然、迅速地降临。【152】阿瑟·安德森（Arthur Andersen），这个与安然（Enron）丑闻有重大牵连的全球性会计公司是一个很合适的例子。[10] 但是，企业的消亡倒不一定会发生。明显易受伤害的通常

是小公司。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小公司特别容易陷入尴尬境地，成为他人操纵的牺牲品。

银行可能会停止借钱给你，但这并不是因为你的公司不值得信任，而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影响了整个银行业的趋势，使得贷款行为受到更多限制。你遇到了现金流的问题，因为你的客户没有按时付款给你，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客户难以付款给**他们**。在人们努力勒紧自己腰带的金融氛围中，你自己的产品或是服务都成了一种奢侈品，人们再也买不起了。一些竞争者可能会对你耍肮脏的花招，诋毁你的名誉，或者大肆挖你公司的墙角，因为他们干得起。所以，你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只是在经历生活中的严酷事实。然而，后果是严重的。死亡的威胁笼罩着你的公司。

实践本书中所提出的品质，特别是诸如创新、热情、谨慎以及诚实这些品质，往往会带来企业的成功。对这些品质的运用给人以很多的希望，但并不是成功的**担保。**在有些商业领域，做正确的事情可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当利润紧张时，不愿在道德上走捷径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拒绝行贿会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的代价。诚实，可能是被牺牲的东西。（Faithfulness may prove sacrificial）

这正是丽兹·克劳（Liz Crowe）的经历。她三十八岁，是一位临床试验单位的负责人，在高质量研究方面拥有很高的声誉。制药行业一直在做一些性质含糊的研究，这种研究更像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恰当的临床试验。【153】丽兹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的业务，因此，当该单位的母公司开始降低标准并向她施加压力采取捷径时，她非常担忧。

母公司希望丽兹采取多种妥协方式。一项建议是，不明确该药物治疗的疾病。另一个方式是，通过降低试验中所使用的样品的规格来降低成本。丽兹与一位重要客户商谈合同，这位客户的法律部门办事拖拉。在这个过程中，丽兹与母公司的矛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丽兹的做法是，在合同最终确定之前绝不开始对病人进行试验。然而，董事会急于尽可能快地开展工作，告诉她采取一次例外。丽兹反对，向与她一直关系愉快的总经理提出申诉。“你要按照要求执行！”他在电话中冰冷地回答。

丽兹是一名基督徒。当时，她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两个小孩，她的丈夫不久前遗弃了她。失去工作的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思考自己的境况并且为此祈祷，她进行了一次驾船度假。回来时，她下定了决心。她不

准备降低标准，损害她辛辛苦苦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声誉。她要求与总经理见面谈话。这位总经理对她滔滔不绝、言辞激烈，说她的那些顾忌是母公司无法再负担的奢侈品。丽兹的回应是，递交了辞职书。公司试图说服她留下来，但她不为所动。

对丽兹来说，辞职的代价是沉重的。因为她把大部分储蓄和十年的工作都投入到了她的单位。需要一段时间之后，她才能找到一份与她作为母亲的职责相称的新工作。【154】但是她深知，她必须保持诚实的品格。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她感受到与上帝在一起的深切的平安。

象丽兹做出的这种决定，具有代价昂贵的基督式特征。因一个道义原则而辞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总是要试图说服同事们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时刻也许会到来，在这一刻，忠实的门徒身份意味着坚守信仰、不惜代价、独自前行。耶稣本人做出了榜样。

自我牺牲和高管薪酬

以耶稣为例，非常明显的是，尽管他是敌意和阴谋的受害者，他仍心甘情愿地拥抱自己的命运。他本可以不找麻烦，保持一种低姿态，少公开表达意见，并且不

踏上去耶路撒冷的危险路程。但相反的是，他如实恪守着内心的信念。他接受了一个残酷结局的代价，如实坚守自己的使命宣言和给大众的共同蓝图：给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送去好消息，宣告神国度的挑战。即使这样做会牺牲自己，他也不会被吓倒。

在商业环境里讨论自我牺牲这个概念是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在这个生活领域中，游戏的名称就是追逐私利。自从主流经济学兴起以来，人们假设，在市场中，个人和企业一心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国富论》中，一段最著名的话这样说道：

> 我们的晚餐从来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155】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他们的人道，而要设法应对他们的自爱。永远不要对他们谈我们的需要，而要谈他们的利益。[11]

设想有两个人，不论是个体市民还是汽车经销商，在商谈一辆汽车的所有权。我们假设，卖方会试图给出尽可能高的价钱，而买方则会尽可能少付钱。双方各自坚持自己利益，在其结合点上，达成了协议。这个自利的假设是根本性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人类可能采取其他行为的提法不以为然：这种提法使他们的计算变复杂了

——据说——还扭曲了整个系统。有一首说唱歌曲温和地讽刺了这种态度：

消费者在理性行事
寻求效用最大之至
他们得到无以附加的满足
而我们预知他们的每一步[12]

说到高管薪酬这个棘手的问题，人们通常以为，当高层管理人员拿到工资袋，他们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并且，“市场”决定了这最大利益能有多大。供求规律发挥着作用。由于管理才能是一种稀缺的能力，必须以高薪吸引最有才能的人。维护现状者把这个过程视为非道德性的。假设一个公司不能支付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它就得不到它需要的管理人员。

这个论点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具有可比能力、占据类似职位的人们所得到的工资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期望和需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世界，可以从其他国家和商业部门吸引人才。【156】然而，高管市场距离经济学家梦想的理想竞争市场还很遥远。负责设立薪酬的非执行董事，往往都是从同一个高收入的企业高管圈子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会提出关于判断的独立性问题。

市场也因国家的差异而变化很大，即使在经济地位可以相提并论的国家之间，也有很多差异。市场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力量，它也受到企业所在的文化的细微但却实质性的影响。人们的态度影响一切。隐藏在所谓“市场决定”真理背后的是自欺欺人。最终，大多数高管的薪酬是由董事会的薪酬分会决定的。他们可以真正地选择支付给高级管理人员多少工资，就像高管们选择自己接受的薪酬时所做的一样。

在一些国家，高管薪酬的高水平被视为对社会的破坏。卢森堡首相容克（Jean-Claude Junker）说他们是“社会祸害”：[13]巨额的报酬和巨大差距在人们之间制造了分裂，影响了国家和企业的精神面貌，加剧了社会分化。低收入者感觉被低估，意志消沉，而高收入者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

这种负面的社会后果在《精神层面》一书中有所记录。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奇特（Kate Pickett）利用了源自一些知名组织，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约 200 套不同的数据。他们指出，在生活质量、幸福感或剥夺感等几乎每个指标上，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其社会成果之间都存在一种很强的相关性。【157】因此，像英国和美国

这种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在诸如心理健康、肥胖、犯罪和长寿等指标上得分都很糟糕，与像瑞典和日本这样的平均主义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像澳大利亚和德国这样在经济指标上居于中间地位的国家，在社会性指标上也居于中间地位。[14]

所谓必须以高额薪金吸引最优秀人士的说法，也带来了关于个人动机的问题。市场运行非道德性的观点有三个成问题的假设：第一，人们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第二，自我利益与道德无关；第三，个人利益本质上是对财务收益的计算。显然，金钱的诱惑是许多人前进的强大动力。但是，人类太纷繁多样、太有意思、太在意别人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观点不足以被用来作为对人类的一个普遍性的描述。[15]高级管理人员努力工作、好好为公司服务，可能是出于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动机，包括自尊、工作满意度、智力方面刺激、与生俱来的创造性、领导身份驱动、团队合作的愉快、宜人的工作环境、遇到挑战、追求卓越，等等。

对于许多高薪管理人员，他们已经很富裕了，收入增加或减少一些，比如说五十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工作效率都不太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认同壳牌前首席执行官杰伦·范·德·伟（Jeroen van der Veer）

的说法：“你必须意识到：如果多付我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我不会做得更好。如果少付我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我不会做得更差。”[16]

一揽子薪酬体系恰恰是复合型的（that-packages）。这个事实使得对动机的评估愈加复杂。【158】除了基本工资，薪酬还可能包括短期奖金、长期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赔偿安排，以及公司车辆、乡村俱乐部会员等福利。这些“额外”的福利轻轻松松地就使基本工资提高到两倍或三倍。实得工资的水平也受到所缴税款的影响。这在不同国家之间和一个国家内部都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取决于税率、一揽子薪酬的性质以及某个高管的会计师提出的建议。这种复杂情况导致了另一种反对的意见，即，往往不清楚某一个一揽子薪酬的总价值，也不清楚如何估算其价值。因此，就有人强烈要求高管报酬有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全面的公开性。一揽子体系越复杂，外界想确定支付给管理人员的总价值就越困难。

因此，高管薪酬这个领域表现出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的宽泛性比通常所说的更大。个人可以选择不成为最大利用者。在特定的商业部门，他们可以以低于“现行率”（going-rate）的标准行事。在第六章中，我们看

到了银行家们当时是如何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别微妙的境地，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行动在触发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进行削减而导致许多人身处窘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巴克莱银行美国总裁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在 2011 年 1 月举行的财政部特别委员会上，他在为重新引入银行高额奖金支付计划辩护时，说道：“曾有一段时间，银行表示懊悔和歉意，我认为那段时间必须要结束了。”[17]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共部门裁员、降低退休金的大环境下，群体性的自我约束仍然是恰当的。【159】圣保罗研究所对伦敦金融界专业人士所做的态度研究显示，尽管有 64%的参与者认为薪资和奖金是他们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们的报酬太高了， 贫富差距为 75%，实在太大了。那些个人利益，同伴压力和同事之间的诚信，事实上是与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所深信的情况不一致的。在那种部门工作的基督徒能勇敢地树立一个榜样、为帮助人们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像苏格兰皇家银行总裁斯蒂芬·海斯特（Stephen Hester）那样——而放弃奖金吗？

自我牺牲和公平贸易

我们购买东西时，也会自我否定。围绕着特定的顾客，兴起了公平贸易运动，这些顾客选择花比实际需要更多的钱、买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的商品。根据最大效用理论，这再次显示出了非理性。一位经济学家对这种行为做出的解释是，“消费者的效用偏好功能不仅包括来自商品消费的基本效用，还包括一种附加类型的效用。”[18]这句话堆砌名词，令人费解。顾客购买公平贸易产品就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生产者。

公平贸易虽然只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但其增长速度很快。在过去十年中，全球销售额以每年平均40%的速率增长，2010 年达到 25 亿英镑。英国的零售额是 120 万英镑，其中包括咖啡约为 1.57 亿英镑，香蕉为 2.09 亿英镑。[19]2008 年以来，塞恩斯伯利斯（Sainsbury’s）和维特罗斯（Waitrose）的香蕉只从公平贸易进货，星巴克（Starbucks）在其英国餐厅只供应公平贸易的咖啡。公平贸易基金会统计，在六十个发展中国家中，有七百多万人（生产者，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从公平贸易中受益。二十三个国家中有公平贸易市场，这些国家主要是欧洲和北美较为富裕的国家，但现在也包括了一些

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160】

像特雷德克拉夫特（Traidcraft）这样的公平贸易组织，寻求以四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来改善生产者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具体如下：

改善市场进入水平

这包括为商品找到市场并进行销售，还包括提出如何改进产品的建议。质量要高，并且要生产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再不能容忍公平贸易中咖啡味道不地道！事实上，在过去，公平贸易提供的优质咖啡不断增加。通过提前采购，公平贸易组织还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贷。

加强生产者组织

帮助生产者学习新技能、开发新技术。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当生产过程使用儿童时，保护他们不受到剥削。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其中的一个要求。

支付更好的价格

这个价格涵盖了全部的生产成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能够满足在他们的环境中的生活需要。公平贸易认证可以在全球商品价格下跌的时候，维持稳定的最低价格。另外，如果生产者投资商业发展、社会与发展项目，还

会额外支付他们通常 10%的社会溢价。

提供贸易关系中的连续性

特雷德克拉夫特与生产者建立起长期关系，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续订单。【161】合作关系意味着与生产者一起改正错误、克服困难。然而，长期不一定意味着“永远”。一个公平贸易公司可能变得非常强大，就可以不需要后续的援助了。

公平贸易检验和认证由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airtrade Labeling Organization,FLO）来执行。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确保生产商和贸易商双方都遵守国际确认的标准。

表面上看，公平交易是一个纯粹的成功故事。许多大型超市现在都在销售带有那个受到公众高度认可的公平贸易商标的产品，预计销售将会持续增长。然而，这个成功的代价是，该运动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正在暴露出来。这些都得仔细考虑。

1.公平交易是否真的使人们生活变得更好？

有人对此已经产生了怀疑，因为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了一些加价。虽然产品的最低价格可以得到保证，但从生产者处购买的商品质量还是没有得到保证。公平贸

易仍然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从事实来看，许多公平贸易生产者把相当大份额的产品在传统市场出售。研究证据可能是零散的，但有迹象表明，如果用口袋里的钱来衡量，公平贸易生产者比起同样的竞争对手，可能只是稍微好一些而已。[20]确实无疑的是，明智地使用社会溢价给生产者所在的团体或社区带来了好处。在智利，阿皮库普（Apicoop）把社会溢价主要用作商业开发，比如购买叉车；劳塔罗（Lautaro）投资了教育，现在，生产者孩子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上大学了。【162】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生产者把资金用于水井、学校和保健诊所，所有这些都给社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2.参与公平交易的费用是否贵得不合理？

生产者组织可能按照公平贸易的标准发展生产，但发现初始认证费用昂贵，难以接受：用于 FLO-CERT 首次检验和认证的费用为 1570 英镑，后续再认证的费用为 145 英镑。21 对于一个羽翼尚未丰满的机构来说，这是一笔巨额，也是到目前为止公平贸易对那些最穷国家影响有限的原因。在内罗毕，我曾经参观了萨法莉珠串厂（Safaribead），这是一家工艺品制造厂，雇佣了大约十五名马赛族妇女。它是由丽萨·巴拉特（Lisa Barratt）

创办的，2002 年，她和她的丈夫被穆加贝的士兵从津巴布韦的农场驱逐后，向北方移民。丽萨有一套好办法利用串珠凉鞋，通过巧妙地回收，将废弃拖鞋变废为宝，改造成玩具动物和小汽车。但是，尽管丽萨是国际时尚伦理论坛的一个成员，她仍没有公平的贸易标签，因为她的现金流不够认证的费用。令人振奋的是，公平交易基金会目前已经设立了一个生产者认证基金，生产者组织可以申请资金，支付高达 75%的费用。有些团体还会从他们的商业伙伴那里得到帮助，支付费用。

3.大超级市场和连锁店的出现是否会威胁公平交易的诚信？

这个问题说的是，公平贸易出现时是作为一种“另类”的商业模式，但是现在，特易购（Tesco）或阿斯达（Asda）这些最不另类的公司在供应公平贸易的产品。【163】因为它们对公平贸易运动缺乏任何强烈的思想上的使命感，只把公平交易视为有利可图的商机之一，那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大企业不会使公平贸易标准缩水？这个考虑确实切中要害。正是在这里，认证机构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们可以保证所有带有标记的产品都是合法的。

公平贸易基金会董事长哈瑞特·拉姆（Harriet Lamb）

在一些大公司的高层中认定了一些真正热心公平贸易的人。[22]目前英国的第五大超市——合作组织(Cooperative Group）属于一个特殊的类型：它的承诺非常明确，并且比竞争对手拥有更为广泛的公平贸易产品。通过超级超市进行销售的“主流”无疑会扩大对公平贸易产品的认识，并且促进销售。

4.公平贸易是否会鼓励过度生产？

经济学家推测，由于生产者在市场波动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他们会倾向于生产超过自己所能销售的产品。这对整体市场来说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整体价格的下滑使那些不从事公平交易的农民陷入极度贫困。经济理论虽然听起来似乎合理，但实证研究还没有能够证实这一点。经济研究所对公平贸易持批判态度，但其最近的报告《无泡沫公平贸易》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扭曲的、负面的影响。报告的结论是，在整个市场中，只要公平贸易维持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参与者，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大可能产生实质影响。[23]另外，一些远未超产的公平贸易的农民，正在多样化发展。阿皮库普(Apicoop)最近买了一处三十七英亩的田地种植蓝莓，来补充其主要的蜂蜜产品。

公平贸易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164】中国的发展证明，有很多其他办法来减轻贫困；在那里，公平交易还未成为现实。在非洲，移动电话的广泛使用大力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但是，我曾经以基金会受托人的身份，参与过特雷德克拉夫特的工作，在这期间，我访问了三个大陆的公平贸易生产者，确信它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这是一种希望的标志，一种发展中国家和跨大陆国家间的人民相互支持的手段。这也是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基督徒做出了突出的开创性贡献。

普丽缇·穆索尼（Purity Muthoni）是肯尼亚的一位茶树种植者，她的见证是许多公平贸易生产者的典型。“茶在很多方面给我带来帮助：教育、为家庭提供食物、好的衣服、购买牛，等等。由于有了公平贸易，我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现在，普丽缇可以用新鲜的水煮茶喝了，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威廉（William）用卖茶叶赚来的钱，在他们的房子旁边建了一口井。

购买公平贸易产品中的自我牺牲可能显得十分轻微，几乎配不上这个词。但成本真的会产生。如果努力地定期并且大量地购买公平贸易，就会产生很多支出。当世事艰难、收入减少时，我们就会不禁忘记那些远方的、比我们的需求更紧迫的人们。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坚定决心去证明，我们不是不假思索地怎么便宜怎么买。

毒素处理者

《哈佛商业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者将许多组织中的一种角色称为“毒素处理者”。[24]他们是吸收和缓和痛苦情绪的人，自愿地与别人共担工作中普遍的悲伤、挫折、苦涩和愤怒。他们经常以各种方式化解矛盾。【165】有时，毒素处理者是代替首席执行官出面的人，“翻译、解释他看似不合理的指令，使人们能够付诸行动”。[25]他们用心听取，提出解决方案，在幕后工作，带动他人的信心，并且重组困难的信息。虽然毒素处理者拯救组织免于自毁，但是他们往往付出专业上、心理上、有时是身体上的极高的代价。

我的确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公司扮演这种角色。他们往往从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都没有一句怨言的人那里寻求启示。这不会使做一个毒素处理者变得容易，但却使之持久。我已经引用了十字架上耶稣的一句话，他给一个认罪的犯人带来了希望的讯息。在检视工作环境时，我们好好地回顾一下他的令人难忘的话语。

首先，尽管耶稣遭受着极度的痛苦，他仍然表现出

对别人的觉察和关心。他看到母亲和最好的朋友站在十字架旁，就托付她们相互照顾：“女人啊，这是你的儿子”，“这是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26-27）。

第二，耶稣的每一句话语、每一次气息都充满着宽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在工作中，我们时常遇到一些给我们带来悲伤的人：他们强烈地激怒了我们，不断地攻击我们、或者破坏我们的功绩。这样的“敌人”可能还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帮助着的人。加拿大社会企业家阿兰·卜萨德（Allan Bussard）在肯尼亚建立了公平贸易下的夏威夷果工厂，工人们却以偷坚果来回报他的付出；他搬迁了厂址，又因为工人蓄意破坏炸毁锅炉而倒闭了。[26]商业环境中，轻而易举地形成压力、愤怒 、苦涩。【166】耶稣的反应是祷告（“父”），采取宽恕、不报复这种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卜萨德没有放弃在肯尼亚的事业，在开始的两次失败后，他找到了更具合作性的劳动力。

第三，耶稣没有以表面上的宗教性掩盖他的人性。正如任何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所感受的一样，耶稣也口渴至极，并说了出来（《约翰福音》19：28）。不仅如此，虽然他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的意愿，但他

经历了被遗弃的痛苦，与《诗篇》第 22 章相呼应，耶稣从他自己经历的黑暗中呼喊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可福音》15：34）。当基督徒不理解上帝在做什么的时候，最好是保持诚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允许别人怀疑和不解，共同分享对信仰的探索，而不是假装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答案，则我们给别人的见证会更有效。

第四，耶稣是完胜者。上帝遗弃那一段似乎已经过去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以两句话结束了，这两句话表达了很好地完成了工作的感觉：“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23：46）；“成了”（《约翰福音》19：30）。耶稣把他自己和他所做的工作全部托付给了一直维持着他的父神。

复活：证明了、证实了

耶稣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而逃。他们对以色列解放的希望与梦想也成为泡影。他们陪伴了三年的、充满魅力、充满神秘的主人走了，留下了巨大的空虚。从《福音书》的叙述中清晰可知，耶稣的复活使他们惊讶不已。

当两个不太知名的门徒走到以马忤斯村时，这一点

尤为明显（《路加福音》24：13-35）。【167】革留巴和他的同伴，可能是他的妻子，悲观地讨论着他们领袖的悲惨命运。他们低着头，精神仿佛被一块大岩石压着。甚至当已经升天的耶稣与他们同行、和他们谈话，他们都认不出他。确实，一种深刻的经验正在发生。后来，这对夫妇说了这样一句话，“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加福音》，24：32）。这提示，他们对这个讲解者的理解在逐渐增加，认识在缓慢地明朗起来，甚至也许心里有了一种温暖，这温暖正在绽放为一种爱。

但是，只有当他们邀请耶稣进来之后，通过耶稣掰饼的动作，才真相大白。革留巴和他的同伴这才意识到耶稣是谁。他们激动不已。[27]他们忘记了走了七英里的疲倦，从椅子上跳起来，飞奔回耶路撒冷，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门徒。事实证明，这不是耶稣复活的第一次显现，也不是最后一次。他的门徒们欢欣鼓舞：“主果然复活！”（《路加福音》，24：34）。

耶稣的复活是上帝证明他独特身份的方式。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理由不把耶稣仅仅当做历史的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一个古怪的、到处游走、结局悲惨的犹太拉比。复活的事实确凿地肯定了罗马百夫长在十字架前

的声明：“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15：39）。《罗马书》1：4 中，保罗说，耶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福音的关键部分。我们已经看到，贯穿着耶稣的布道，他的身份问题怎样带来了争议。通过把他从死亡里复活，上帝给出了答案。【168】这个行为显示了上帝惊人的大能，他以此宣称，耶稣确确实实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是名副其实的**神之子**。

进一步说，耶稣也被他的复活所证实。这是上帝认可的标记，不仅是对耶稣这个人的认可，也是对他所执行的使命的认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十字架不是一场悲剧（尽管它确实包含悲剧性的内容），而是上帝意图的落实。这把我们带回本章开始时的问题：耶稣为什么死？伴随着世俗的解释，有一个神圣的解释。当耶稣的追随者回顾发生过的事情，回想他说过的事，重读《旧约》中的某些段落，他们会理解，耶稣的死是神拯救世界的方式。他们在一种救赎神学中描述为：上帝与人性合一（God and humanity made-at-one）。

取消借据

关于十字架怎样保证了我们的救赎，《新约》中没

有明确的解释。耶稣本人、彼得、《希伯来书》、约翰，都对耶稣死亡的意义做出过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罗的释义。但是使用了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耶稣使用了释放人质的语言，说人子来“拿他的命作许多人的赎金”（《马太福音》10：4；参考《启示录》5：9）。彼得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2：24），《希伯来书》中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10：12），约翰说耶稣是我们的罪的“挽回祭”（《约翰一书》2：2）。[28]保罗在《罗马书》3：25 中也用到了挽回祭（凭着基督的血）一词，并将这个词与称义和救赎联系起来，有趣地综合了神殿、法庭和市场的隐喻。【169】在其他地方，他使用了和好（《歌罗西书》1：20；《哥林多后书》5：19）、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和对邪恶力量的胜利的概念（《歌罗西书》2：15）。

把这些形像硬性分割开来、选择某一种赎罪理论而排斥其他是错误的。有一些神学家就是这样做的。[29]这些形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它们之间存在相当多的重叠。大家一致认同十字架决定性地处理了人类原罪的问题；也一致认同耶稣代替我们或代表我们而死。他将罪的所有重负放在了自己身上，从而使与上帝重新建立

关系成为可能。

《新约》只是简单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画面来呈现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有些画面比其他情景更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力。再者，有效沟通是与历史和地理环境相关联的。每一代基督徒都需要探询，《圣经》中的哪些隐喻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最鲜明生动的说服力。当今世界债务问题如此巨大，导致了最近的金融危机。以**债务**出现的罪的形像特别强大。

这个隐喻存在于耶稣说的阿拉姆语中。大多数的主祷文采纳《路加福音》的版本，其中说“原谅我们的罪”，但是《马太福音》的版本使用了一个可能更接近于原始的单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6：12）。德语单词 *Schulds* 也类似地表示了债与罪两个意思。我们反复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的罪造成了透支：我们本该荣耀上帝，却没有做到，我们便欠了他的债。【170】

保罗在《歌罗西书》2：13-14 中挑出这个比喻：“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或作“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希腊语 *cheirographon*，表示手写的记录或欠债证

明——一个“借据”，表示 “我欠你”（IOU），这个词在新修订标准版《圣经》（NRSV）中译为“记录”，更多地方被译为“债券”（修订标准版《圣经》RSV，新国际版《圣经》NIV）。保罗说上帝“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歌罗西书》2：14）。通常，在被钉人的头上的那部分十字架上，刻着此人的罪行。[30]保罗描绘了我们的一系列的罪，这些罪被刻在了耶稣的十字架上，他偿还了人类共同的欠债。也许是因为放在他身上的这个负担太沉重了，以至于耶稣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在了十字架上。但结果是解脱。上帝取消了欠条：“涂抹”指的是“清除”。我们债的记录被全数删除。今天，当基督徒寻求十字架的解释时，这种理解方式对于我们这个充满债务的社会来说特别重要。

一个活的希望

保罗说上帝“使你们活”，与基督一起活着。死亡与复活不是仅仅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它们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彼得对因此产生的希望满怀深情地写道：

>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1：3-4）

耶稣的复活为希望提供了一个确定的根据，我们会像他那样体验超越死亡的生命。但新的生命实际将从**现在**开始，现在是死亡的这一边。保罗把洗礼作为这种过渡的标志。【171】当我们浸入水中时，我们死在罪中，然后重新升至水面， 获得一个免于惩罚和罪的力量的生命：“……所以我们藉著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著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4）。

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个崭新的、活着的现实，那么复活对商业世界有什么意义？**那里**是否有望出现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有，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公司和职业生涯都会结束，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够重生？在这里，我们依靠上帝的激励。以马忤斯路上，门徒们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些话语出奇地恰当。对商业上的复活来说，认识和了解发生在过去的事是有必要的。我或我们，是如何、又是为何到了今天的地步？上帝一直在做什么？上帝现在正在说什么？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是最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些重大事件，上帝对我们进行了拯救。但是，它们也反映了上

帝世界中发生着的更广泛的情况，这样说丝毫不会减少其独特性。耶稣看到了这一点，在谈到他在十字架上的荣耀时，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C.S.路易斯对这个的过程的观察为：“这种模式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是因为它最开始存在于上帝之中。”[31]我们在被路易斯称为“小关键”的地方，看到很多关于死亡与重生这个神圣主题的例子。它们发生于自然世界，也发生于组织化的世界。

转型：不同类型的公司

当耶稣从死亡中复活，他的身体转化了。【172】它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它有足够的延续性，使门徒可以看到并摸到他肋旁的钉痕（《约翰福音》20：24-29），同时又有足够的非延续性，使他不再受到同样的限制，现在可以通过关着的门（《约翰福音》20：19）。保罗向我们保证了一个类似的结合：重生的身体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44）。转型意味着一个非常不同的状态——因此是一个光荣的状态——但又不是全然不同。

让我们把这种想法用在商业领域中。经历过公司破

产的基督徒，在接受别人的建议并恳切地祷告后，也许会感到上帝在召唤他们开创一个新的开始。但愿一个新公司不会是仅仅增加了原有的东西、复苏原来的业务而只是有了一个新名字。相反，一个转型的公司是把业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或质量层面。在改进产品、市场区位、产品多样化或质量管理等方面，可能会有显著的创新。但是，考虑另一种在**结构**上有所不同的公司也可能是合适的。

支配全球资本主义的公司结构是公共有限公司（PLC）。在英国，《1862 公司法》统一了早期的法律规定，使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受到保护。公司发现，一旦到达某个阶段，如果承担的风险大幅度降低，他们才能保证进一步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投入。股东在公司的原始股份的有限责任意味着，他们可以无拘无束的购买股票，而不必担心如果公司破产则需支付的大笔款项。这种构建公司的方式在筹集资金方面尤其有效，尤其对那些在全球范围经营的公司。

然而，有限责任因为若干个理由受到强烈指责。它生成了一个系统，用迈克尔·施吕特（Michael Schluter）的话说，一个在资本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巨大的关系距离。【173】资本提供者通常在公司决策中很少或没有

发言权。许多公众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购买股票，如养老基金；“他们经常甚至不知道（或是不在意）他们持有了哪个公司的股份。”[32] 他们几乎不参加公司的年度大会。即使是团体股东也很少影响公司的政策，如果情况不好，他们宁愿选择退出也不会在管理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他们倾向于简单地用最新的季度财务结果为标尺来评判公司。另外，有限责任也意味着，如果公司破产，债权人，如供应商，得不到付款，也危及他们自己的未来前景。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理想的组织形式是每个成员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了解其他成员并欣赏他们的贡献。圣保罗谈论关于教会是基督身体时就是按着这个思路（《哥林多前书》12：3-30；参见《罗马书》12：4-8）。尽管在哥林多教会的环境中，保罗是为避免那些禀赋不同的人造成教会分裂而强调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该模型还是对涉及人类合作的任何组织都有明显的相关性。公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做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惯常的做法是袖手旁观，与公司其他的股东缺乏真正的联系。

公开股份有限公司有真正的替代者。英国的私营公司包括一些在零售、建筑和公用事业领域的主要知名公

司。一个拥有领军地位的是约翰·刘易斯合作公司，该公司运营着 29 个百货公司，274 家维特罗斯（Waitrose）超市以及 6 个居家（At Home）商店。它的历史极其吸引人。

在 1864 年，出生于萨默塞特的约翰·刘易斯在牛津街开了一家服装店，到 1895 年他已经扩展了这一生意，开设了一个出售各种各样商品的百货商店。【174】他完全通过缩小利润做到这样；他生活简朴，存了足够的钱再投资下一步，而不需要投资者进入或组成联合股份公司。整个商店属于他一个人，并且他也独断地经营着。他的儿子约翰·史派登·路易斯（John Spedan Lewis）跟着他进入商界，但是变得越来越挑剔父亲的做法。特别是，他吃惊地意识到，他、他的兄弟和父亲的收入相当于 300 个雇员的工资总数。“为什么雇主要获得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利润？”他问道。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不过他允许史派登运营第二家店，彼特·琼斯（Peter Jones）。在这里，他引进了民主的做法，较短的工时和较长的假期，但仍然回报了他与员工分享的可观的利润。1928 年老路易斯去世后，史派登掌握了公司整体的经营控制权，也是那时，公司“复活”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以不可撤销的信托协议组成的合作关系，将所有

权移交给公司的雇员。员工始终是约翰·刘易斯的完整合作伙伴。史派登设计了一套详细的规定，确保决策过程代表所有人，同时赋予董事会权利，全权代表所有人进行业务管理。

你可以听史派登的演讲，那位七十岁的老人，在公司网站上提出他激进的、有出色政治家风格的思想。[33]“目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正常运作的一种反常状态”；“在消除贫民窟之前，拥有百万富翁是错误的”；“肯定存在一些不平等，但应该尽可能的少”；“应以所有人的伙伴关系取代剥削”。

今天，约翰·刘易斯设定了工资差距的限制；最高收入只允许是最低收入的 75 倍。[34]【175】这仍然是一笔可观的工资，不过，与特易购(Tesco）的 750：1 的比例还是有鲜明的对比。特易购前首席执行官特里·莱西爵士（Sir Terry Leahy）的薪酬总额超过 900 万英镑。然而，近年来在经济衰退中，约翰·刘易斯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特易购。此外，利润增加时，普通员工以及董事会都会得到奖金。[35]毫无疑问，人们在约翰·刘易斯的商店购物时，几乎总能保证得到友好的、颇有帮助的服务。

合作模式充满变化。英国合作集团（The UK Cooperative Group）让客户成为会员，使用会员卡购物

时,每半年获得一次利润。世界上最大的合作公司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联合公司（the Mondragon Corporation），有 8 万 5 千个工人股东。2009 年，该公司让 20%的员工（抽签决定）拿 80%的工资休假一年，从而平安度过了机床和汽车组件行业的衰退时期。所有新员工提供 13，400 欧元的股本。该体系由选举产生的大会（Congress）运行，它被称为“主权的最高表现”。

蒙德拉贡是由一位名叫约瑟·马利亚·阿里兹门迪亚里塔（José Maria Arizmendiarrieta）的天主教神父建立的，他是为了让教区居民从西班牙内战带来的破坏中走出来。现任董事长约瑟·马利亚·阿尔德科亚（José Maria Aldecoa）毫不掩饰地表示,蒙德拉贡是完美的。“合作的模式绝对存在缺陷，”他令人轻松地承认，“但是，在价值观与经营模式的危机中，它表现出的缺陷是最小的。”[36]

一旦公司接受了一个特定的公司结构，它就不容易再改变——但也远非不可能。如果员工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他们也许能够买下全部股份。【176】八喜合作公司（Baxi Partnership）本身是一个雇员所有公司，它运作着 2 千万英镑的基金，旨在促进英国的雇员购买全部股份；同时，它还经营着一个咨询公司，旨在帮助雇

员所有公司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文化。[37]《超越公司》（*Beyond the Corporation*）的作者大卫·埃达尔（David Erdal），描述了几家公司提升了员工的热情和承诺，结果使得企业走向成功。公司可以重生。就这样，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构成了希望的标志。

小额信贷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小额信贷，它的目标人群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我们已经看到，《旧约》中禁止高利贷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对待穷人，保护穷人不受剥削。因此，一种新型的银行业务值得密切注意，这种业务是银行放贷给世界上的穷人，并且声称将穷人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最著名的专门从事小额贷款的银行是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它是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他的家乡——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智慧结晶。1974 年，尤努斯在乔布拉（Jobra）村附近的村庄启动了一个研究乡村贫困的项目，决定“让我自己重新变成一名学生。乔布拉村就是我的大学，乔布拉村的村民就是我的老师。”[38]他发现了高利贷是如何有效地奴役着村民的方式。为了实际参与进去，他把自

己的钱借到村里。1983，这个最初被称为格莱珉的银行项目（在孟加拉语中，“格莱珉”的意思是“乡村”）成为一个独立的银行。它的资本来自捐赠、孟加拉中央银行的贷款、债券销售和储户的存款。

格莱珉银行很大程度上是由遍布在孟加拉国 8 万个村庄的 830 万位女性拥有的，这正是它所寻求的最重点的服务对象。【177】1984 年，在一个有 100 个这样的女性的工作坊中，银行采纳了“**十六项决定**”， 要求雇员和接受贷款的五人小组经常背诵这些决定。这些决定包括：承诺不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种植蔬菜并销售盈余、使用坑式厕所、饮用井水、教育孩子，等等。其最根本的思想表达于第十四条承诺：“我们应当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如果有人遇到困难，我们都要帮助他或她。”[39]

在格莱珉银行的团结贷款体系中，每个借款人都平等地负有还款的责任，但她所在的团体实施监督，保证每个人都要负责任地做事。银行称，还款率高达 98%。其做法是，从一开始贷款，就要求每周小额还款。这逐步灌输了遵守规定的意识，保证了还款长期、整体的成功。2006 年，“因其致力于从底层推动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被联合授予诺贝尔和平奖。[40]

虽然尤努斯往往被描述为小额信贷的创始人，但这并不确切。1970 年代以来，若干个基督教组织都参与了小额信贷业务，其中包括由美国艾尔·惠塔克（Al Whittaker）和澳大利亚大卫·布索（David Bussau）于 1971 年成立的国际机遇机构（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41]该机构为 2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万客户提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开创性地推动使用电子和移动技术，降低交易成本，并为最边缘化和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银行服务。

此外，国际机遇机构还通过其分支机构微型保险（MicroEnsure），为贫困人口提供保护，使其免遭诸多风险的不利影响。【178】一个五口之家的保险费每月平均约为 1.50 美元，这样，MicroEnsure 使加纳、肯尼亚、印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的很多人第一次买得起人寿保险。[42]

小额信贷慈善机构“五项才能（Five Talents）”于 1998 年在英国圣公会领袖兰伯斯会议上（the Lambeth Conference of Anglican Church leaders）成立，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提供长期援助，根据需求而非信条而定”。[43]该机构采用与格莱珉银行相似的模式，为创业者团体提供小额贷款，并提供商业培训和指导。其“商

业使命”（Business as Mission）项目把短期使命旅行与课程教学结合起来，这些课程以《圣经》为依据，内容涵盖企业家精神、商业规划、营销和记录保存的基础知识。教学课程将案例研究和互动练习纳入其中，而不依赖令人望而生畏的高文化水平。[44]该机构在 11 个发展中国家中积极开展业务，还款率达 95%。它获得了多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奖项，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认可。

2010 年 7 月，我在访问班加罗尔时，遇到了充满活力的柯林·蒂姆斯（Collin Timms）。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30 岁时就非常富有了，却渴望着一个不同的生活目标。一位牧师请他帮助那些在生意中挣扎奋斗的人。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体会到极大的满足感，激发了更强烈的愿望去帮助别人。现在，他是桥梁基金会（Bridge Foundation）的执行受托人。该基金会是隶属于国际机遇机构（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的印度微型信贷组织。它致力于在需要与机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南印度五个州帮助启动了大约 14 万个小型企业。蒂姆斯说：“我们的客户通常是村子里的小店主，或有一两头奶牛、经营一个小型奶站的妇女。通常，150 美元的短期贷款足以帮助他们启动生意。”桥梁基金会付出特别的努力，促使那些家中的顶梁柱被判入狱的家

庭开办微型企业。[45]【179】蒂姆斯是一个受理想驱动的人，他的理想是引导生产活动资金，带动社会变革。

令人难过的是，在本书撰写时，微型金融受到质疑。争议的焦点是，桥梁基金会开展业务的地区之一，安得拉邦，发生了一连串的客户自杀事件（据称，在 2010 最后几个月内有 30 起）。该地区被指责微型金融机构采取高压手段获取利益。[46]发生的情况似乎是，一些在思想上缺乏对客户利益的郑重承诺、肆无忌惮的微金融机构从中作梗。一场旨在取缔“贷款巨鳄”的运动反过来又被“贷款巨鳄”所渗透。人性的堕落就是这样，商业机构无一幸免。

为应对上述情况，安得拉邦政府削减了微型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在孟加拉，政府也对微型金融机构加强了控制，谋求增加自己在格莱珉银行的股权（声称农村妇女没有能力进行经营管理）。穆罕默德·尤努斯于 2011 年 5 月辞去了执行董事的职务。[47]

然而，对微型信贷的批评远不止这些。在高额利息的意义上说，收取利息是针对整个行业的，包括格莱珉银行，它收取的年利息通常大约是约 20%。（“五项才能”的月平均利息为 2.5%。）[48]按照《出埃及记》第 22 章和《利未记》第 25 章，最初的基督教反应可能是：向

穷人收取任何利息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这种立场并不切合实际。无息贷款可能针对一对一的个人贷款比较实用，但是，一旦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项贷款事宜，成本就会增加。【180】负责收取款项并提供咨询服务的贷款工作人员需要得到报酬：他们“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福音》10：7）。格莱珉银行现在雇用着 2 万多人。即使是一个高效运转的、利他主义驱动的、非营利性的微型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是有必要的，以支付运营成本并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利息水平的确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微型金融机构应保持警惕，就像其之前和周围的放贷人一样，避免让穷人落入不断还款的恶性循环中。也许，需要改变重点，把鼓励储蓄和鼓励贷款同等重视。[49]鼓励储蓄一直是微型金融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具借贷的吸引力和可盈利性。然而，随着储蓄量的不断增加，人们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长期的希望，摆脱循环依赖，实现自给自足。

基督徒们为微型金融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发展迅速，现在已有无数人参与其中。基督教微型金融机构需要引领行业，重新致力于帮助穷人在经济方面活跃起来。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复活。微型金融不是减轻贫

困的全部答案，但是，如果把减轻贫困比喻为一幅拼图，微型金融则是其中一张重要的图片。

一种不可压制的灵性

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话中说到耶稣：“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2：24）。过早死亡并不能遏制耶稣；他的灵是不可被压制的。源自复活的希望，带来了同样不可压制的灵性。【181】这关系到从经营困境中复兴的能力，也关系到产生新思想的能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这句话既有周一在工作中的含义，也有周日在教会中的含义。

这句话激发了我在班加罗尔遇见的牧师兼商人阿什施·瑞彻（Ashish Raichur）的灵感。2001 年 1 月，他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新造人信息技术公司（New Cre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拥有 20 名员工，专门从事加拿大、美国、南美和中东地区外部市场的保健业务。2001 年 2 月，他成立了全民教会（All Peoples Church），在班加罗尔市内有三个众会（congregations），市外有八处聚会点（church plants）。他毫不怀疑，上帝呼召他同在这两个领域布道。引人注

意的是，阿什施在一个办公室里既服事教会，又经营公司。我看着他毫不费力、不慌不忙地从指导教会秘书转到与一位工程师讨论软件问题，不由惊讶得张口结舌。这里，没有圣—俗分离！他的公司名副其实，因为他想展示出商业中的新造的人。事实证明，在圣灵的大能中，他正在付诸实践。

8

活在希望之中的人：进取的僧侣与体贴的雇主

五旬节那天被如实描述为基督教会的诞生之日。耶稣复活后，就在升天之前，他告诉众门徒，“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这种赋能是惊人的。圣灵的到来赋予耶稣的追随者们一种惊人的说别国语言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用在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的犹太朝圣者的乡谈来传达“神的大作为”。

圣灵也让他们摆脱了在耶稣死前充满了全身的恐惧。因此，曾经明明认识耶稣却矢口否认的彼得，大胆地对聚集的人群说话，宣称“你们藉着无法之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使徒行传》2：23-24）。当犹太宗教权威们（可以理解，他们对这样的言论感到愤怒）逮捕他和约翰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发表了精彩、流畅的演讲，令那些人惊叹

不已（《使徒行传》4：8-13）。

五旬节的影响是显著的。3000 人回应了彼得的话。他们接受了洗礼，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行传》2：42）。接下来，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平均主义生活试验：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以巴拿巴为例，他把田地卖了，把钱拿来给使徒，供分给新团契中有需要的人用。（《使徒行传》4：32-37）。

最初，这个新的群体里全都是犹太人。然而，有三个因素促使他们向外扩展。首先，迫害产生了分散性、离心性的后果（《使徒行传》8：1)）。第二，耶稣告诉门徒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第三，他们了解了耶稣之死和复活的全部意义——即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5：19)，自然而然地想要与所有人分享这个消息。保罗既看到了水平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也看到了垂直层面上人与神之间的和解。基督打破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壁垒（《以弗所书》2：11-16），上帝的旨意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以弗所书》3：6）。上帝对人类的希望恢复到宇宙之初的起源。因为信徒们认为，耶稣就是应许

中的弥赛亚（希腊语 *Christos*），所以，他们被称为“基督徒”（Christians）（《使徒行传》11：26）。同时，“教会”一词表明他们自认为是被“呼召出来”（希腊语 *ecclesia*）的一群人，彼此交接，效法基督的模样（《罗马书》8：28-29；《哥林多前书》1：2-9）。

早期的基督徒对传播救赎的好消息热情高涨。这是他们最用心的事情。同时，他们需要在经济上维持自身生活。保罗的生意是制作帐篷。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和亚居拉、百基拉这对归信的夫妇一起工作，他们也从事帐篷制作（《使徒行传》18：1-3）。不过，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每周在犹太会堂里劝说遇到的犹太人和希腊人（18：4）。【184】保罗认为，得到教会的支持是理所应当的，但他更愿意自给自足，以免有损他的正直诚实（《哥林多前书》9：1-18）。在帖撒罗尼迦，同样，保罗和同事们每天都在忙碌着，因此，当传神的福音时，“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帖撒罗尼迦前书》2：9；参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8）。他斥责那些“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3：11）。

虽然大多数信徒似乎出身卑微，经济上也不富裕，[1] 但也有少部分信徒拥有大房子，可以容纳很多人，如经

营紫色布料的女商人吕底亚（《使徒行传》16：14-15，40）。她来自推雅推喇城，该地专门擅长从茜草中提取染料。当吕底亚在腓立比做生意时，听到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作出了回应。保罗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把一个“巫鬼”从一个使女身上赶了出去。这个使女的主人们非常愤怒，因为女孩之前“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利”（《使徒行传》16：16），而现在，主人们眼看着其得利的指望没有了（16：19）。

保罗的行为也对以弗所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底米丢是一个制造亚底米神龛的银匠，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抱怨说保罗在说服人们不要购买银制神像，理由是“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从而引发了一场骚乱（《使徒行传》19：23-28）。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信仰颠覆经济秩序的迹象。基督教信仰会威胁那些剥削劳动者、利用人类的弱点和愚蠢而对其进行掠夺的产业，但不一定是通过直接攻击这些产业，而是当人们对福音的财务后果有了明智的认识时，忠实地宣告福音。

本章将介绍一些基督教在过去两千年中影响经济贸易的典型例子。[2]【185】

活跃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马大和马利亚

首先，必须承认，基督教信仰本身可能受到来自主导文化中的无益的态度的颠覆或渗透。早期教会中就是这样。希腊和罗马思想认为，体力劳动是奴隶和工匠们做的事，这样可以使社会精英们把心智运用于艺术、哲学和政治。西塞罗（Cicero）把一个雇佣工人和一个小商贩的辛苦劳作视为同样卑贱。[3]重要的早期教会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尤西比厄斯（Eusebius of Caesarea）对这种区别进行了宗教性的解释，他说，基督给教会指出了两种生活方式：

> 一种是超越自然、超越普通的人类生活之上：不接受婚姻、生育和私有财产，也不拥有财富，而是完全、永久地与人类的普通惯常生活相分离，唯一地致力于服事上帝……这才是基督徒完美的生活方式。另一种生活方式是：更卑微、更属人性的，允许婚姻的存在，允许生育后代……允许人们用心从事农业、贸易活动和其他世俗的爱好以及宗教……这种人的虔诚程度是第二等级的。[4]

奥古斯丁在“活跃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之间做了类似的区分。虽然这两种生活方式都很好，奥古斯丁对农民、工匠和商人也有赞许之词，但“沉思的生活”

还是更胜一筹。“一种生活基于爱，另一种生活基于忍耐。”有时，我们有必要追求活跃的生活，而且，为了行慈善，也不得不这样做；然而，“如果没有人把这个负担加给我们，那么我们应该投身于从容、感知与沉思中”。[5]【186】

在做这个划分的时候，奥古斯丁引用了福音书中马大和马利亚的故事中（《路加福音》10：38-42）。[6]马大伺候耶稣及其弟子们手忙脚乱，而马利亚却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当马大抱怨说“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时，耶稣回答说：“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显然，基督徒不能否认，听从耶稣的话是最为重要的。

然而，这是否就使沉思的生活更高级呢？耶稣的大部分教导赞扬那些实际的服事行为，特别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以及绵阳和山羊的寓言。通过聆听耶稣的话，马利亚很可能受到启发而在家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马大却一心忙于其他事，恐怕对耶稣的教诲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比尔（Bill ）和艾琳·曼利（Irene Manley）是一对美国夫妇，经营一家名为“蒙古马利亚和马大（Mary and Martha Mongolia）”的公平贸易公司。比尔以前是

一名石油工程师，艾琳是一名药剂师。他们感受到使命的呼召，在《圣经》学院学习了两年，感到上帝在引导他们利用其之前积累的商业经验，在偏远的乡村开办一个社会企业。“马利亚和马大”这个名字反映了他们的动机——既爱上帝，也爱邻人。该公司位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用骆驼毛和牦牛毛制成的纱线制作袋子、拖鞋、披肩、长巾和领带。他们的目标是保证自己的工人收入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 1.5 倍。[7]

圣本笃与修道院

教会盛赞沉思的生活方式，这使其把修道生活推崇为基督徒职业的最高形式。僧侣和修女们感到呼召，让自己与日常世俗的人类活动和人际交往分隔开来。【187】还有比专心致志于祷告、全神贯注于对上帝的观想、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崇敬、爱和赞美中更好的方式来度此一生的吗？这种看法似乎使基督徒们在经济前沿的贡献乏善可陈。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修道主义**确实**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本笃会规则的影响**。本笃会是现今犹存的最早的宗教修道院，始于 529 年由诺西亚的圣本笃（St Benedict of Nursia）在卡西诺山建立的组织。本笃制

定了一套由 75 个短小的篇章构成《规则》。该《规则》后来为其他修道会广泛采用，每个修道会都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同的修道院应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文化安排事务。该规则的突出特点是人性和均衡。

> 本笃的组织是以祷告为根本而建立的，同时也以工作及团体生活为基础。修道院并非避难所，人们不能因为无法面对工作压力或与周边人无法好好相处而逃遁到这里。[8]

本笃创造出一种“均衡”的作息安排，祷告、工作、私人阅读和彼此相处等事务都各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僧侣们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他们种植、收获作物供日常食用。所有的工作由每个人轮流担任，如果某人有某项特殊的才能，他可以特别地发挥这个才能，但必须注意避免骄傲之罪。[9]修道院的所有器具，不仅仅是神圣的圣坛器皿，都应得到特殊的看护。圣本笃特别注意酒窖管理员（Cellarer），担任这个职位的僧侣对各种材料和物品全权负责。【188】他列出必要的人品（成熟、明智、清醒、不贪婪、不骄傲、不易怒），与《提摩太前书》第 3 章所示的种种品格很相似。酒窖管理员既管理好物品，也照顾好众人，如这条建议中所说：“”如

果拒绝某一请求，应仔细衡量是否恰当，并给予相关人员应有的尊重。[10]

本笃对修道院院长这个角色的陈述表达了对基督教领袖的深刻洞见。它借鉴了许多《圣经》中出现过的领导模式：仆人，牧羊人，教师，治疗师/医生，管家。院长显然是富有权威，应当被服从；但是，他也知道如何分派工作、认真倾听、体察个体的需求、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同等尊重、树立像基督那样的行为榜样。这种模式被广泛领域的机构、包括商业机构所采纳。在英国，杜埃（Douai）、沃斯（Worth）和安普尔福斯（Ampleforth）的本笃会修道院都遵守圣本笃的《规则》，为繁忙的商业领袖提供退修之地，参加的人很多。

第二，商业创新能力。1100 年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修道院在西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拥有大片土地。他们用这些土地来组织生产活动。特别突出的是熙笃会（Cistercians），一个改革者团体，决意更加严格地遵从圣本笃的规则。熙笃会于 1098 年在西多（Citeaux）成立，到 1152 年在欧洲各国拥有了 333 个修道院。熙笃会强调僧侣们从事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但是，认识到僧侣的局限，也从当地农民中雇佣一些平信徒来协助僧侣们的活动，并进行有价值的商品交易。

熙笃会堪称中世纪技术发展的先驱。他们取得的成绩令人难以置信，包括：

- 发展绵羊畜牧，领先毛纺和织布业，特别是在威尔士和北约克郡【189】
- 建立良好的销售体系，销售他们养殖的牛马牲畜；
- 大量采集石材，建设大教堂和修道院（不仅为他们自己）；熙笃会被称为技能高超的建筑监工，把招募到最好的石匠视为荣幸；[11]
- 技艺高超的冶炼场，包括在法国香槟产区的铁冶炼；在“解散修道院”（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期间，里沃（Rievaulx）修道院附近拉斯奇尔（Laskill）的鼓风炉遭到毁坏，以致废弃
- 修建水力工程，使用大型水轮粉碎小麦、筛选面粉和漂洗布料；西班牙阿拉贡（Aragon）的一个修道院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中央供暖水循环系统。[12]

熙笃会把公共所有权与企业家天赋结合了起来。

经院神学家：公正的价格

修道主义对经济生活的第三个积极的贡献来自于知

识分子思想的分量。西欧中世纪的许多经院神学家和在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学者都与修道会有关。其中，多米尼加托钵会士、巴黎教授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最为著名。

正如琼·奥多诺万（Joan O’Donovan）所说，“中世纪经济思想的唯一成就是将经济活动置于人类共同体的被创造、堕落、被救赎、被圣洁的动态神学架构之中。”[13]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利用地球上丰富的资源，相互给予、相互享受、相互满足，分享着精神和物质成果。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处于本质堕落的情况下的。【190】学者们对私有财产的解释是，它遏制了人的罪性中难以驾驭的、以自私、暴力的方式使用物质资料的冲动。但私有财产仍然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利益。与此类似，金钱应当严格地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任何“以积累金钱财富为目的”的职业“都处于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之外。”[14]

中世纪的神学家相信一种“公正的价格”。总的来说，他们乐于相信市场价格是公正的，但他们相信一种有道德的宇宙，要求买卖双方为共同利益而行事。他们谴责各种为获取多余利润而操纵市场条件的行为，谴责各种造成对他人的危害、趁人之危进行剥削的手段。剥

削包括利用对方缺乏经验、无知、冲动或思想单纯，从中获利。他们把一个被迫付高价钱的穷人与被迫抛弃船上的货物、从而挽救自己的性命和整条船的遇难的水手做了比较。

学者们列出了在计算公正价格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圣方济各会的彼得·奥利维（Peter Olivi）（1248-98）提到劳动力、费用、风险、勤勉和守夜。[15]然而，他承认，精确计算是不可能的，应当允许在可能和合理的范围内留有余地。另一位圣方济各会成员约翰·邓斯·史考斯（John Duns Scotus）（1265-1308）强调了市场交易的伦理互惠。买方和卖方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公正的价格”，他们通常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公正”的结果通常包含双方的“天赋”因素。[16]这就把公正的自然法与方济各会所理解的福音爱的诫命结合到了一起。

公平交易和公正价格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191】二者都主张用对他人的善意来调节我们在市场中本能的贪婪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公平交易的支持者尚未利用这种令人赞叹的中世纪思想。纵然学者们的分析有不足之处（并且贸易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仍值得增加对这些思想的了解。它们之所以黯然失色，是因为在接下

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们对贸易行为的种种限制大部分已被抛弃。

财富的悖论

1500 年至 1750 年间，基督教与商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教改革导致西方教会发生了重大分裂。修道院要么走向衰落，要么更加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祷告生活，而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不再对经济问题抱有浓厚兴趣。路德（Luther）关于职业的说法使新教徒们对工作建立了信心，而加尔文对于高利贷的反思也预示着一种更加积极的商业途径。这两个因素推动了新教国家在此期间的经济快速增长。

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努力奋斗，变得富有，并非不成问题。18 世纪伟大的循道宗传道士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清晰、透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韦伯（Weber）引用的一段话中，卫斯理观察到：

> 我担心，财富在哪里积累，宗教的精髓就在哪里以同等比例丧失。因此，从事物的本质上说，我看不到真正宗教的复兴得以维持的可能。宗教必然带来勤勉与节俭，但这些却不只带来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世俗的骄傲、愤怒和贪爱也会随之增加。【192】那么，循道宗，即

> 心灵的宗教，尽管它现在像绿色的月桂树一般蓬勃发展，未来是否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呢？每个地方的循道宗信众都勤勉努力，生活节俭；因此，他们逐渐变得富有……[17]

卫斯理坚定地认为，解决这一悖论的方法不在于基督徒变得越来越不勤奋和不节俭。相反，在那次关于金钱的使用所做的最著名的布道中，他勉励人们**尽可能获取**，并**尽可能节省**。[18]

在说到“尽可能获取”时，卫斯理做了一些谨慎的限定。如果获取的方法伤害了我们自己的或邻人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生命或健康，那么这些方法就被视为非法。他列举了有以下情况的职业：涉及砷或其他有害矿物、欺骗顾客、抵押贷款、出卖烈酒、引诱竞争对手的工人。只要遵守上述警告，卫斯理就勉励人们全身心地去工作：

> 通过诚实的努力，尽可能地获取……抓紧时间……不要拖延！……把你全部的勇气投入工作。不辞劳苦……你应不断学习，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经验、阅读和思考中学习，今天所做的事情要比昨天更上一层楼。[19]

在详细阐述了勤勉之后，卫斯理宣讲了节俭。“尽

可能节省”意味着“不要仅仅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观感的欲望或生活的骄傲而花钱。”[20]他没有时间去品尝美味、装饰打扮、或迁就无聊的事情：“你为什么在孩子身上扔掉这么多钱，比在你自己身上扔掉的还多，买精美的食物、华丽昂贵的服饰等各种多余的东西呢？”[21]【193】

针对基督徒变得富有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卫斯理提出第三条建议：尽可能给予。睿智、忠心的管家意味着：

> 首先，为自己提供需要的东西：吃的食物、穿的衣服，自然适度所需以保持身体健康和强壮的任何东西。其次，为妻子、孩子、仆人，或与家人有关的其他人提供上述种种。如果这样做了以后还有剩余的话，那么“就善待信仰之家的人”。如果还有剩余的话，“既然你有这个机会，那就善待所有的人。”[22]

这是把神的东西交给神。卫斯理恳求听众“不要患得患失”。[23]至今，他的布道仍像当初一样富有挑战性。

不信奉国教的雇主：泰特斯·索尔特（Titus Salt）

在 19 世纪，英国一些实业家把卫斯理的布道或多或少运用于实践当中。他们白手起家，却创建了蓬勃发展的企业；他们生活舒适，却远非奢侈；他们生前或通过

死后信托赠与的方式，慷慨捐赠了通过辛勤劳动赚取的大量财富。他们在多个不同领域获得了成功：巧克力（乔治·吉百利 George Cadbury），水果口香糖（约瑟夫·朗特里 Joseph Rowntree），饼干（乔治·帕尔默 George Palmer），芥末（耶利米·杰姆斯·科尔曼 Jeremiah James Coleman），药品（杰西·布特 Jesse Boot），肥皂（威廉姆·哈斯克司·利弗 William Hesketh Lever）；袜子（塞缪尔·莫利 Samuel Morley）。伊恩·布拉德利（Ian Bradley）对这些**开明企业家**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有两个信仰体系构成他们商业开拓和慈善启蒙（philanthropic enlightenment）的基础，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宗教。"[24]第一个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其提倡自由贸易、自助、政府最小化干预和国际主义。第二个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从国教派高要求、严格的信条。这些雇主体现了韦伯强调的新教美德。用布拉德利（Bradley）的话说，他们有条不紊，习惯良好，勤奋不懈地工作，积极提升自我，堪称自律与节制生活方式的榜样。[25]他们大多数滴酒不沾。他们早睡早起，更喜欢进行令人振奋的身体锻炼，而非颓废的娱乐。

上述这些正是泰特斯·索尔特爵士（1803-76）的生活写照，他在索尔泰尔艾尔河（River Aire, Saltaire）

边创建了村庄，颇负盛名。索尔特在十几岁时跟着一个羊毛商当学徒，学会了如何在拍卖会上买好羊毛，根据纤维的长度、柔软度和细度挑选羊毛，并进行预先处理，以纺织成纱。他积极参加公理会教堂的活动。他以“羊毛买家”的身份，加入了其父亲丹尼尔的公司，并于 1834 年正式接管公司。他不断寻找新材料。当他发现利物浦仓库中有一堆为数 300 包的难看的物料时，他的灵感来了。原来，这些是秘鲁羊驼的毛，纤维又垂又长，令索尔特印象深刻。他把样品带回布拉德福德（Bradford），进行实验。索尔特发现，这种毛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纱线。1837 年，他推出了阿尔帕卡奥尔良呢（Alpaca Orleans），一种由羊驼毛和棉花制成的纤维，成为备受维多利亚女士欢迎的服装布料。布拉德利评论道：“维多利亚女王将其养在温莎公园里的两只羊驼的毛交给索尔特，让他制作成衣。这表明，索尔特推出的布料取得了成功。”[26]索尔特还引入了马海毛，马海毛也是一种长纤维羊毛，取自土耳其安哥拉山羊的毛。【195】索尔特成功开发了这两种不寻常的羊毛，成为西约克郡精纺行业的领头人。

19 世纪中叶，布拉德福德的人口数量从 1831 年的 4.3 万迅速增长至 1851 年的 10.3 万。这里肮脏、不卫生，

对孩子来说是可怕的：人口平均寿命仅为 18 岁。超过 200 个工厂烟囱排出含硫烟雾。索尔特将特殊烟雾燃烧器安装到烟囱上，以减少他的五个工厂的污染。他在布拉德福德建了一个 61 英亩的公园，让人们享受一些相对新鲜的空气。接着，在 1850 年，索尔特采取了更加彻底的措施，将公司从城市搬迁到布拉德福德西北部三英里远的一个新的绿地上。

在那里，索尔特建了一个新工厂，“这是全球第一家综合性的羊毛纺织厂，从分拣含油脂的生羊毛到派发染色后的成品布料，所有工序在一间厂房里完成。[27]新工厂高六层，配有大玻璃窗和通风道，使建筑更加明亮、空气流通。之后，索尔特在 22 条街道上建造了一个拥有 850 套住宅的村子，为他全部的 4500 名员工提供了住处。这些房子的大小根据居住者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但都比布拉德福德狭窄和肮脏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接着，又陆续建立了一个公理会教堂，公共浴室，学校，医院，图书馆和其他机构（institute），但没有酒吧；索尔泰尔入口处的一条通告上写着：“来者一律禁酒。”索尔特见过过度饮酒的罪恶，所以，他绝对滴酒不沾。索尔特就像一位大家长，禁止在乡村公园中吸烟、赌博、说脏话，但他非常关心工人的福利，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得

以改善，收入也随着公司的成功经营而提高。他去世时，有 12 万人向其致敬。【196】

如此开明的雇主只占少数。在工作条件恶劣，压迫员工，没有任何改善迹象的地方，雇员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基督徒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 19 世纪晚期建立的早期工会组织，以制衡雇主的权力，并为其成员争取适当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当雇主们降低工资时，凯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了苏格兰南部的矿工们进行罢工。作为一个福音传道者，他掌握了公开演讲的艺术；继而，他成为第一位独立工党议员。经常有人说，“工党更应该归功于循道宗，而非马克思主义”，[28] 虽然其他基督教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在爱尔兰工人之中颇具影响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群众劳工政治组织肯定从整体上推动了英国法律体制的改革：通过个人和公司税收重新分配财富、失业救济、健康保险、旨在限制个别企业的权力的垄断与竞争法案。[29]

圣餐饼和酒：普通成就非凡

除了这些历史上的积极的例子，本书还介绍了许多当代基督徒的例子，他们正在信仰和工作之间建立起成果丰硕的联系。他们矢志奉献一生，把每一天的努力向

上帝摆上，相信上帝能用其成就重大的事业。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维多利亚·弗朗西斯·哈弗拉格（Victorian Frances Havergal）写的一首非常好的赞美诗表达了这个意思，令人难忘。它以这句开始：“神圣的主啊，拿去我的生命，由你使用”，接下来请求上帝，用我们的手、脚、声音、意志、心灵、爱和整个人创造美好的东西。它有这样一节：

> 拿走我的金银，
> 我丝毫不留。
> 拿走我的智慧，
> 尽供你使用。

上帝用我们提供的普通之物行非凡之事，这个观念在教会敬拜的核心——圣餐中反映出来。美国神学家大卫·詹森（David Jensen）写道：

> 圣餐台上的核心物品并非小麦和葡萄——上帝给我们的原料，而是面包和葡萄酒——人类劳动的产物。无数个小时——实际上是很多年的工作进入每个星期天出现在圣餐台上的面包里——在种植季节开始时耕耘土壤，播种从去年保留下来的种子，浇灌新长出的植株，给幼苗除草，祈祷充足的阳光和雨水，当麦子成熟、金

> 黄时收割，再脱粒除去谷壳，将麦粒磨成面粉，将面粉和成面团，在酵母中搅拌，烘烤成面包，送到市场上。更不用说在上述每一步中所包含的计划、研究和运输的时间。同样，葡萄酒也是无数个小时的耕种、修剪、压榨、发酵、装瓶和营销的成果。此外，葡萄园不会立刻实现高产，而是在首次结出葡萄之前，需要付出多年的辛苦劳动。面包和酒，这些圣物是上帝所赐的人类双手的产物；上帝赐予人类双手，是因为人类要用双手劳动。没有人类的劳动，就没有圣餐。[30]

这一观点基于逾越节筵席上犹太人的餐桌祝福，并见于若干个教会使用的圣餐祷告序言中：

> 赞美你，一切造物之主：藉着你的恩赐，我们把这饼你面前摆上，这是地所给予、人手所做的。它将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
> **赞美上帝，直至永远。**
>
> 赞美你，一切造物之主：藉着你的恩赐，我们把这酒在你面前摆上，这是藤蔓所结、人手劳作的果。它将成为我们的救赎之杯。
>
> **赞美上帝，直至永远。**

祷告者赞美上帝，感谢上帝的恩赐，期待着面包和葡萄酒所将**成为**的东西。上帝给了我们土壤和种子；他派来了阳光和雨水。人类依赖于上帝，但并非无助、无

用的造物。正如詹森所说，研究者、园丁、农民、生产者、面包师、装瓶工人和货车司机，等等，都为圣餐礼做出了贡献，使之能够举行。

耶稣是何等伟大，为这特殊的一餐选了这两种材料！面包是主食，全世界的人经常吃这种食物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多。它能**养**人心（《诗篇》104：15）。耶稣是“生命之粮”，凡是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约翰福音》6：35）。葡萄酒是一种节日饮品，欢乐、提神，但如果喝得过多，则会有危险。它能**悦**人心（《诗篇》104：15）。耶稣是真葡萄树，他的父是园丁（《约翰福音》15：1）。

圣餐饼和酒的美丽之处在于，上帝利用这些普通的产品，做了不同寻常的事。【199】当我们分享这些东西，投入到爱和服事当中，记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庆祝他的再来，吃着饼、喝着酒，上帝满足了我们的愿望。“现在，把你的灵降在我们身上吧！借着这些恩赐，用我们睁开的眼和燃烧的心，靠基督而活。”[31]我们靠着基督获得精神的滋养，通过上帝赐予的恩典的途径得以生存并装备起来。

圣餐饼和酒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星期天到星期一一直保持敬拜之意，那么我们工作生活不会

发生变化吗？什么会阻止我们拿出我们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提供的所有服务，并祈求上帝的祝福呢？上帝会像他在教堂里那样，在市场中往普通的东西里面加入非凡的因素。詹森举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会计师的例子：他“仔细地列出费用清单，并保留预算，于是一家航运公司就可以将小麦从太平洋一端运到另一端”。[32]会计师知道，自己受到上帝的驱动和支持，充分利用自己的数学天赋，为他人服务，并感谢上帝。

英国圣公会的圣餐服事以这些令人难忘的词句结束：通过基督，“我们献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作为一个活祭。把我们派在你圣灵的大能之中吧！我们为赞美和荣耀你而生活、工作！”[33]这个祷告的逻辑是商业转型。从中世纪修道院到十九世纪不从国教的企业家，我们从历史中基督徒商业实践的好榜样身上，看到这个祷告应验了。

9

未来的希望：国度的迹象

你可能怀疑，花大力气改善全球经济是否真的值得。《圣经》中不是明确地警告说，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和渴慕盯在俗世上、而是要关注天国吗？《希伯来书》第 11 章对基督徒的盼望做出了尖刻的评论。它说，《旧约》中的信仰英雄认为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以其前瞻的智慧，渴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13-16）。一首老歌这样唱道：“地球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个过客。”如果我们是外乡人和流亡者，如果我们真正的家园，或如保罗所说，我们的**国民**身份是在天上（《腓立比书》3：20），那么，应该像我在呼吁的这样，对商业给予悉心关注吗？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真正的危险，我们受到成见和压力的诱惑，导致拜错神灵，服务于世俗的主人，而并非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的神与父。

一些基督徒强调现实世界的飞逝与短暂。他们认为世界必定毁灭，来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他们不那么相信，身体会如灵魂不朽那样复活。他们认为天堂是纯粹的精神世界，我们在世上的任务就是拯救尽可能多的人达到永恒：这就是常说的“灵魂的饥渴”。福音派提供了一条逃离地球的路线，保证能在天国找到一个地方。[1] 基督徒不应当欺骗自己，说可以在地球上建立天国。【201】历代的人的想法鲜有不同：上帝将彻底摧毁当前世界。事实上，他很快就要这样做了；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生活在终结的时代。

住在美国的克罗地亚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将这种模式称为“**世界毁灭**（Annnihilation of the World）”，并总结了它对于工作的含义：

> 如果世界将被毁灭，一个新的世界将在**毁灭后**被创造，那么，世俗工作对于工人、他们的社区以及后代的福祉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到那一天，“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彼得后书》3：10）。既然人类在整个历史中积累的工作都会在最后的末日灾难中化为乌有，那么人类的工作没有直接的终极意义。[2]

这种思维方式提出了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希望的性质和基督徒见证的品质。

毁灭还是转型？

毁灭模式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些许**根据。有时，《新约》中的话表明一种截然的断绝性。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他渴望“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5：1，7）。《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把头一个“出于地，乃属土”的人与第二个“出于天”的人做了对比，说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王国”（15：47，50）。沃尔夫在前面引用的《彼得后书》第 3 章也许是对“地球毁灭”的最强烈的断言。【202】

然而，即使在这三段话中，也不完全是说断绝性的。《哥林多后书》第 5 章接下来描述，给我们地上的帐棚穿上衣服，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5：4）。《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有气血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15：44）——尽管汤姆·怀特（Tom Wright）建议，翻译成“灵性驱动”的身体可能更好。的确，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

但这正是——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15：54）。

即使《彼得后书》第 3 章也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明确。第 10 节通常翻译为“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既可以指**毁灭**之火，也可以指**淬炼**之火。“烧尽”这个词本身就意思模糊；它可以意为“揭示”或“裸露”——也就是说，世界的真实性质将被显明。但是，无论如何，《彼得后书》第 3 章第 10 节并非作者的末世图景的高潮。他的最终希望在第 13 节中表达出来：“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对于持不同观点的基督徒来说，这段《圣经》中这个关于新天新地的段落是根本性的，沃尔夫称之为**世界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它更加强调连续性,而不是断绝性。沃尔夫论述到：

世界不是在末世毁灭中、而是在末世转型中结束，以此为前提，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3】人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做的工作具有了内在价值，获得了终极意义，因为他们与末世的新创造有了联系——他们不仅间接地通过持有的信念和所做的服事，或者通过变得更加纯洁而与其有了关联，而且直接地参与了新创造：人类聪明才智的崇高产物，“人类文化中所有美丽、真

实、善好的东西”，都将被去除杂质、变得完美、焕然一新，从而成为上帝新创造的一部分。这些将构成新的“建筑材料”，用来建造“充满荣耀的世界”。[3]

“新天新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65：17； 66：22）。其语言极具诗意，无疑是象征性的，但对其作世俗性的理解也不会错。耶路撒冷被视为一个转型后世界的核心。《以赛亚书》65：21-22展示了这个令人愉悦的图景：

>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 栽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 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 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

总之，不再有挫败、异化和剥削！不再有财产的掠夺；不再有敌意的霸占。人们会享受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不会失去；人们能够生活在安全当中。黄金时代的这一愿景可能在此生无法实现，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工作的转型具有根本性意义。

《圣经》的最后，《启示录》第 21 章中，再次出现

对万物都处于完美、和谐中的未来世界的盼望。虽然目睹者也谈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说的还是新天新地。【204】上帝将住在他的子民之中，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启示录》21：3-4；参看 7：17）。不再需要一座殿，一个特别的圣地，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21:22）。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将永远消失。

《新约》中还有其他段落强调了连续性：改变、而非替代现有的秩序。《马太福音》第 19 章第 28 节中，为回答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耶稣谈到“复兴(renewal of all things)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复兴”(renewal)这个词是 *palingenesis*—— 字面意义上是“再创造”。彼得可能已经记住这些话，因为在《使徒行传》第 3 章中，他说，耶稣“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使徒行传》3：21）。**万物复兴的时候**（*the time of universal restoration*)与**万物复兴**（*renewal of all things*）肯定是一个意思。

万物

在保罗对基督这个人及其工作的一段出色的描述中，也出现了“万物”一词（《歌罗西书》1：15-20）。这里，保罗将耶稣描绘成既是宇宙之主，也是教会之首。他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1：15），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1：18）。令人惊奇的是，“物”（things）一词出现了 6 次，“万物”（everything）出现了 1 次：

- 万有（all things）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1：16）。
- 一概（these things）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1：17）。
- 他在万有（all things）之先，万有（all things）也靠他而立。（1：17）。【205】
- 他可以在凡事（everything）上居首位（1：18）。
- 藉着他（神）叫万有（all things）都与自己和好了（1：20）。

人类在上帝眼里是无比珍贵的，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时，我们从根本上想到的是人类与上帝重归于好，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段经文说，上帝

的救赎也包括**万物**。这些是什么呢？

保罗说，他们是“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歌罗西书》1：16）。《以弗所书》6：12 中，这些似乎是他描述为“管辖着幽暗世界”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执政者和掌权者。然而，这里他所指的范围更广。它们是**地上的**、也是天上的，**是能看见的**、也是不能看见的。这个词似乎包括了所有的掌权者。凯撒和罗马帝国在保罗的脑海中可能占据重要的位置。今天，除了拥有或渴望拥有“超级权力”地位的国家，我们可能会提到媒体、互联网、广告业甚至全球市场经济。这些事物都以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掌握着强大的权力。虽然它们可以被利用，很好地服务于人类，但似乎也常常被邪恶所控制：天上险恶的力量颠覆了地上的现实。《歌罗西书》第 1 章再次向我们保证，虽然这些事物是强大的，但其并不具有终极权能。它们在基督里被创造，并且通过基督，藉着“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得以与神和解（1：20）。当强大的全球性力量以耶稣基督为依准时，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意义和成就。【206】

当强权者不得不为滥用权力道歉时，就是向这个方向迈开了第一步。正如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和新闻国际（News International）在全英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整页广告，称对于之前的严重错误“表示歉意”。[4]

“万物”也指企业生产出的物质性的、制造出来的所有东西。这里面有高质量的产品，也有被损坏的、不合格的产品。生产过程会出错。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地震毁坏了葡萄酒储罐和房屋，导致了人员伤亡，造成了“败坏的辖制”和“叹息、劳苦”（《罗马书》8：21-22）。但是，基督徒的盼望仍然是，受造之物将脱离于此，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再一次确切表明：得到救赎的不仅是我们自己，还包括我们居住的世界。我们可能会惊喜地在这转型了的创造中发现一些我们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瑕疵尽除，完美如意。[5]

令人激动的是，《启示录》第 21 章说到，人们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天上之城（21：24-26）。评论家迈克尔·威尔科克（Michael Wilcock）把这理解为：“所有真正美好的东西都将重新出现在那里，在主人为其预备的完美条件下得以净化和增强；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不会失去。”[6]人们在此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汇入“上帝永恒的目的”——对这一点，如我先前所说，汤姆·赖特（Tom Wright）做过很好的阐述。[7]在这个荣耀的新创造中，商业活动的成果像人类其他活动的成果一样，扮

演着重要角色。

《启示录》第 21 章和《以赛亚书》后面的章节有相同的意像与词语。《启示录》21：24-26 的内容很接近《以赛亚书》60：11：“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务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207】先知把圣城——转变后的耶路撒冷城描述为一个商业中心，接收着船只、货物和役畜。

理查德·茂（Richard Mouw）对《以赛亚书》第 60 章进行的研究堪称引人入胜，他问道：为什么他施的船只（60：9）和黎巴嫩的松柏树（60：13）在这个图景中如此突出？他指出，在《以赛亚书》第 2 章中，这些东西是文化傲慢的象征。万军之耶和华“必有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这两样东西都列在代表“人的傲慢”的名目中（《以赛亚书》2：12-17）。他施做工精良的船只“是引起船主和船员骄傲的财产，是异教徒商业权势的工具。”[8]但在后面的图景中，他们不再炫耀外在力量；船只带着金银进入圣城（60：9）。同样，“黎巴嫩的荣耀”是为了修饰圣所之地（60：13）。清除了偶像作用的东西成为适合为上帝和他的子民服务的工具。列国的君王(《启示录》21：24 中也提到他们)垂头丧气。作为统治者，他们既特别容易搞权力腐败，又

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缺陷。上帝的审判使他们转而成为仆人的角色（《以赛亚书》60：10）。再一次，这个景象是转变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

茂把这一章生动地运用于当今的世界：

> 上帝将会对军事、科技、商业、文化等各方面势力的令人崇拜、骄傲的成就进行审判。他将毁灭所有崇尚压迫、剥削和财富积累的不顺服的事物。正是在这些事物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他施的船只和黎巴嫩的香柏树……但是，尽管人类文化中不顺服的“面胚”仍然会聚集在圣城，上帝仍然拥有“馅料”。【208】整个地球——包括美国的军事和法国的艺术，中国的医术和尼日利亚的农业——都属于上帝。他将收回所有的这些东西，让他们为圣城服务。[9]

基督徒的有效见证

那么，在挽回所失去的东西时，我们最应重视的是什么呢？这与上帝转化其造物的未来希望无关吗？不然。相反，我们必须突出后者才能恢复正确的《圣经》平衡。

显然，上帝对个体罪人的爱是至关重要的福音信息。正如当耶稣在地上生活时，对撒该（Zacchaeus）和撒玛

利亚的妇人所做的一样，他也与我们一一见面。我们对他的回应可能会使我们离开自己的家人（《马太福音》10：34-39)。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将自己的事在他面前说明（《罗马书》14：10-12；参看《哥林多后书》5：10）。每个人的名字都会写在羔羊生命册中（《启示录》13：8，21：27）。对其他人，包括朋友以及工作中的同事的见证，往往涉及深切的个人事务——也许是通过最密切的关系显露出的痛苦、愤怒、伤害和内疚等问题。

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10]我们都生活和工作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中。《圣经》中先知的主题说的是受上帝审判并被他救赎的社会群体和民族。耶稣是被杀的羔羊，也是照亮复兴之城的明灯。生命树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22：2）。我们身边的事物受到更广泛的文化和组织问题的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见证与此相关。【209】如果我们忠实于《圣经》的总体趋势，那么这个启示的内容就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希望之语也是审判之词。如果审判之词使人产生了信仰、悔悟和改变，那么，即便是审判的字眼也是积极的。

我所认识的工作经验丰富的人都相信，当你能够证明你的信仰对公司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有所帮助时，基

督徒的见证将更为可信。吉姆·赖特（Jim Wright），史克必成（Smithkline Beecham）（现为葛兰素史克公司）研究与发展事业的前任人力资源主任在瑞德里会议上论述了这一点。他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们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与根本意义有关。他强调：

- 组织的目的——仅仅是增加股东价值、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更广泛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吗？
- 组织的价值观——是什么？公司认真地践行这些价值观吗？如何让员工在这一领域更有建设性地相互支持和挑战？
- 理解人性——什么激励着人们工作？我们是假定他们最坏的地方，还是唤起他们最好的地方？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表明信任、委托责任、体现相互问责的流程吗？
- 关系——是否对上述问题的品质给予了关心？对处于发展之中的人进行了什么投入？如何实践宽恕与和解？
- 忙碌——可以做些什么来反对引起压力和焦虑、损害关系质量的“匆忙文化”？【210】
- 工作-生活的平衡——什么是适当的平衡？亦或

这只是个被误导的概念，需要被不同生活领域的融合所取代？

信仰为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基督徒应该能够“深入”企业讨论，作出独特的贡献，并合理地解释他们的想法。

吉姆观察到，在商业环境中谈论爱的价值可能是荒谬的——但他讲了一次不同的经验：

> 我正在调解两位高级副总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自己在争夺私人地盘，但机构中的人们却意识到冲突会持续下去，并且从上级那里打探消息。我对一个人说：“你们受委托作为同事一起工作，领导这个机构。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同事，你会如何采取不同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让他在自己的思维轨道上停下来，彻底改变了讨论的方向。长话短说，在一次员工联合聚会的场合，他们一起站在台上，吐露彼此的仇隙，说一切到此为止，然后相互拥抱，那一刻，我哽咽了。这，显示了爱之名义的力量。[11]

请注意，吉姆出乎意料、充满勇气的调解竟为一个乱糟糟的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突破。

吉姆将这种方法描述为——**为神的国度挽回企业**。企业确切归属于上帝的统治，但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而

运作。【211】作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需要用上帝提供的权能行动，参与关于组织基本原则的讨论。因为忽视这些原则会导致个体的不满与组织的失能，所以，确实有机会使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以神国度的名义，我们能挽回组织失去的根基，从而影响组织的生命。吉姆对此满怀希望。[12]

神国度的迹象

以这种方式来认识神国度是合理的吗？我相信是的。我们是否接受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盼望的性质。以莫特曼的说法，“基督教是末世论，是……变革和转变现实状况的希望。[13]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未来美好世界的盼望如此热烈，这个盼望如此激励、鼓励着我们，以致我们准许它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实现它，但是，每次念诵主祷文时我们祈求什么，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盼望与耶稣对神国度的教导有着内在的联系。

归根结底，“愿你的国降临”意味着什么？答案正好在下一段：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完美——在天上，上帝的法则是无可质疑的。用詹姆斯·琼斯（JamesJones）的著名的话来说，我们祈求“天国行

在地上”，[14]当然，“地上行着天国”也同样合适。耶稣生活在地上期间，神的旨意通过耶稣本人也得到完美的执行。神国度在耶稣身上显露出曙光，但并不完整，只有随着他的第二次降临才能完全到来。尽管如此，耶稣用语言和行为进行传道，树立了完全献身于天父旨意的榜样，已经为我们描绘了国度的模样。我们在组织里，像在其他生活领域一样，寻找国度的迹象，并为此努力工作。【212】

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祈求神的国度到来，那么我们就要敞开胸怀，相信这个祈求会被恩准，相信我们真的会成为行出神的旨意的工具。通过忠顺门徒的简单行为，我们发挥作用，使现在的世界更符合《圣经》经文所说的荣耀的未来时代。不仅仅是个体，社会状况都可以变得更好。

在我们知道的世界里，我们可能只会偶尔瞥见这样的情形，但是，**的确有些**时刻值得细细体会。生活中、工作中有徒劳、挫败这些令人沮丧的片段，也有令人激动的变革时刻。国度的迹象可能包括：

- 操纵会计的行为被曝光，于是混乱和掩盖得以去除，金融事务的真实状况清晰地显露出来。虽然情况看起来很惨淡，但人们既然知道自己当下

的位置了，就可以采取行动、取得进展了

·买卖双方共进了一餐饭，结果合同谈判取得了突破，不仅在价格上达成一致，还发现了意外的合作协同效应，并就生活的意义与目的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丈夫花过多时间在国外出差，这是性诱惑的来源，造成了婚姻触礁。他接受了一个基督徒朋友建议，在公司里找到一个本地的工作，并取得了妻子的原谅。【213】

在前几章中，我给出了例子，在这些组织里，国度“时刻”是常规情形：黄铁城在中国树立了好的工作实践榜样；花开沙漠这个泰米尔纳德邦妇女的避难所，妇女们缝制美丽的产品；库里克山谷的劳塔罗葡萄酒基地展示了受到自然灾害打击最严重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仅举几例。再说一个例子，一个真正的希望的迹象。

布洛特耶果园（Broetje Orchards）是华盛顿州东南部一个占地 5000 英亩的苹果园。该公司每年包装超过 500 万箱的苹果，并以“华盛顿第一水果”的美誉卖给美国领先零售商。这个灵感来自《申命记》第 26 章的收获节，人们把初熟的最好的产品献给神。这是个季节性的

行业，由于工人只在特定的季节有工作，很多家庭因此破裂。果园的所有者劳夫和齐利·布洛特耶（Ralph and Cheryl Broetje）特意在公司旁建立了一个社区，创造了很多的全职工作机会。他们已经建成了 100 所二居、三居和四居室的房屋，一个基督教学校，一个日间中心和一个为问题青年设立的牧场。公司把超过 60%的税后利润捐赠到本地、国内及国际性的项目。它的座右铭是“致力于‘结常存果子’（《约翰福音》15:16）的优质水果公司”布洛特耶果园既卖优质的苹果，也关心人的发展。[15]

工作和敬拜

我坚信基督教对未来的盼望应该促使、而不是阻碍我们在当前的世界中为转变而努力奋斗。这是因为“通过圣灵，上帝一直在历史中做工，他用人的行为创造出一种临时性的状态，以此预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创造”。[16]任何一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都值得高兴。但是，与上帝完成他伟大的工时那种激动相比，这种高兴就不值一提了。

这种完工是由**敬拜**的主题主导的。《新约》中有一些难忘的画面：父与子接受他们应得的敬拜；而地上的

人却总是否认这种敬拜。保罗说，每个膝盖都为耶稣的名字弯曲，每一个舌头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启示录》第 5 章中，天上无数的敬拜者大声地唱出大赞美“羔羊是配得的！”我们对新天新地所得的印象是：我们大部分的创造力都会用于敬拜上帝：那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将要侍奉他”（《启示录》22：3）。

“敬拜”和“工作”在词源上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希伯来词 *avodah* 就是意味着这两个意思。与此相似，礼仪这个词，意思是“人的工作”。很好地进行崇拜，包含了不可否认的工作的要素。在一个更新的创造中，我们将向上帝的敬拜就是工作，这个工作被解释并转化为另一个维度。无论人们在地上所做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这工作都会吸引上帝忠心的子民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才能。

10

信仰、希望与爱：另一种经济愿景

1857 年，在剑桥大学评议会大楼进行演讲的苏格兰传教医生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说道：“文明的两位先锋——基督教和商业——是不可分割的。”[1]他既为将福音带给中非人民尤其是赞比亚人民产生的前景而激动，又为他们肥沃土地上出产的丰富多样的农产品而感到兴奋。虽然他的动机听上去似乎有些可疑和混乱，但他真心认为贸易——不包括令人厌恶的奴隶贸易——能够造福非洲人民以及欧洲人民。

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设法建立基督教和商业之间的必然联系。基督教信仰——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它——可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为善的力量。我们看到的国家与公司、文化与个人的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但这些精心选择的例子告诉我们的是真相吗？有两个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的就是真相。

第一，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宗教和经济态度进行的世界范围内的调查发现，宗教信仰通常与“好的”经济态度有关。[2]“好的”的定义是有益于提高个人平均收入和增长。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比一般人更倾向于彼此信任、信任政府和法律系统，较不愿意破坏法律，且更愿意相信市场结果是公平的。[3]总的来说，与其他信仰相比，基督教与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态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216】

第二，我的论点并不是粗率、简单的“基督教比其他信仰更好。”有一些形式的基督教完全**不是**为善的力量。它们扭曲的或一边倒的理论（通常只注重某些部分的《圣经》教导而忽略其他）意味着，它们对主导经济体系要么不加鉴别地完全接受，要么说不出一句好话。

在某些文化中，基督教主要被视为一件私事，对公众行为标准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些国家中，高教会出席率通常与地方制度腐败、物质至上的心态、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竞争残酷、胜者为王的资本主义形式共存。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耶稣用酵母既比喻正面的影响（例如《马太福音》13：33）也比喻负面的影响（例如《马太福音》16：6）。渗透向善与恶两个方向发生。

此外，当然还有其他文化和宗教的例子能够证明信仰在全球经济中的为善的力量。基督教和犹太教本属同源，而犹太人总是走在经济活动和创新的最前列。儒学强调忠诚、精英政治和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儒学背景可能是近年来韩国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权威研究《信任》（*Trust*）中的韩国那一章暗示“新教和儒家文化推动的经济和企业价值观是相似的”。[4]

凭借这些谨慎的限定性条件，我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为了正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我们需要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对《圣经》进行透彻、深入和综合性的了解。【217】太多的工作神学在研究完《创世记》第 1 到第 3 章后，都以失败告终，或以太粗糙的方式来应用旧约法律。我们信靠希伯来《圣经》，同时，我们必须完全公正地对待耶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顾了他传道的每个重要阶段的原因。我已将《圣经》故事展示为一部七幕戏剧，每一幕都衍生出其商业含义。

令人兴奋的消息是,我们是这部戏剧中的积极参与者：衍生的内容是需要我们去实现的结果。生活在第六幕，回顾第一幕到第五幕，并期待着第七幕，我们可以

满怀责任心地进入这部戏剧中扮演一个小而真实的角色，并进行恰当的即兴表演。[5]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深刻而充满希望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中也包含令人极度失望、具毁灭性的失败、令人心碎的悲剧和有严重警告意味的场景等。但主线是积极的。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并为其预备了荣耀的未来。他呼召、渴望并装备他的子民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开创新的局面。在经济方面，人类通过鼓励企业、减少贫困、促进诚信、确保可持续性和培养信徒来做到这一点。总之，这些活动都指向一个清晰的方向：全球经济的**转型**。

转型，这个在前几章中着重探讨的主题已成为基督教“信仰与商业”圈的一个流行词。“转型”这个词的使用是从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的著作《基督与文化》开始流行起来的。书中介绍并批判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对基督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基督反对文化、基督属于文化、基督凌驾于文化、基督与文化相悖），但对第五种类型（基督是文化的转变者）持积极态度。[6]【218】最近美国出版的一部书称赞基督教市场理念，这本书的**主旨**是“面向共同利益的转型服务”。[7]转型商业网络（Transformational Business Network）和转型商

业(Transforming Business)是英国的两个致力于用企业方案解决贫困问题的著名机构。[8]

然而，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把转型用作一个模糊的、感觉良好的词，而不回答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重要问题。让我来阐述一下我的立场。

另类商业模式

在这本书中，我特意为主流范围之外的商业类型留出相当大的空间：社会企业、公平交易、小额贷款、合作社以及生态友好公司。它们的兴起是当代全球经济中最良性的发展之一。社会企业传递着帮助穷困人群和边缘化人群的企业家精神。公平交易通过确保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获得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挑战着消费者的利己主义思想。小额贷款提供贷款的目的更多在于帮助贫困人群，而非剥削他们。合作社是一种更加民主的结构性公司形式，能够消除非个人股东维度，并减少极端薪酬差别。生态友好公司提供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能源有效型产品和服务。总而言之，它们在推动我列出的五重目标上大有所为。

但它们都不是灵丹妙药。它们的有效性存在着实际问题，在之前的章节中我已经尝试过对其中的一些问题

进行解决。它们都无法逃离堕落投下的黑暗阴影，都有可能落入不诚实、不讲道德或碌碌无为之人的手中。但是，在我周游世界时，我见过每一种商业类型发挥作用的例子，每一个例子都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219】我相信，它们共同组成了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的一部分答案——虽然不是全部的答案。

社会企业、公平交易、小额贷款、合作社和生态友好公司是一系列另类商业模式。它们是基于与传统商业的不同设想进行运营的。虽然财务业绩很重要，但这并不是衡量大部分公司成功与否的终极标准。如果每个公司都基于另类商业模式运营，我们的经济体系将大为不同。

另类商业模式无疑正在增长。据联合国估计，合作社在世界范围内雇佣的员工超过 1 亿人，合作社成员有 8 亿人，涉及 30 亿人的生活。[9]这些另类商业模式是在全球资本体系范围内运营的。虽然资本主义的主导模式仍然是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是跨国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规定或指令单一的公司结构。资本主义关注资本的增长，但并不指令资本如何增长。资本主义的优势之一是它对所有类型的商业模式开放、对基于各种形式和哲学——其差别不会妨

碍彼此做生意——的公司开放。

为大公司效力

此外，一些传统公司也展现出许多优良的品质。在整个企业世界中，有许多正直善良的人和对社会负责任的单位；另类商业模式并不会垄断企业美德、正直和可持续性。【220】在**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了重视且不只是迎合公众意见的地方，跨国公司会设法在所有股东关系上承担起责任。在某些领域，它们会比其他商业模式更加成功；但当它们把事情做对的时候，也是值得称赞的。

举个例子：虽然，由于在美国发生的意外，英国石油公司的名声可能已经受到严重损坏，但是，它以对贿赂的“零容忍”态度，特别是涉及到 EITI（采掘业透明度倡议）时起到的带头作用是值得称赞的。这要求全面公布和验证公司向政府支付的所有款项以及政府的石油、天然气和采矿收入。[10]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可能出过一些问题产品事故，但他们在召回对公众造成危害的产品时总是雷厉风行——最有名的是在 1982 年，当一名杀人犯在芝加哥将氰化物混入几瓶泰勒诺（对乙酰氨基酚）胶囊导致 7 人死亡后，强生在全国范围内下架了 3100 万瓶该胶囊。召回 10 周后，经过改良的防损

毁、三重密封安全包装又重新上架了。强生为这一插曲耗资超过 1 亿美元，但不久之后它又恢复了市场占有率。该公司的指导原则是其创始人罗伯特·伍德·强生（Robert Wood Johnson）于 1943 年制定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使命宣言《强生信条》，其中明确说明“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对医生、护士和病人负责，对所有母亲和父亲以及所有其他使用我们服务的人负责”。[11]

因此，对于在大公司工作的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高效率的工作来赢得尊敬并遵守公司标准或帮助公司提高标准。显然，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能够更加轻松地达成此事，但担任初级职务、并且对自己影响公司事务的能力持有怀疑的人也可从下面的故事中得到鼓舞：【221】

这个故事是伦敦当代基督教学院(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的一次活动中分享自身经历的一位年轻女士讲述的：

> 我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最近我的工作小组参与了一笔大额交易。工作小组中的主管们决定在与少数股东沟通的内容中隐瞒一部分事实。
>
> 我知道这是错误的，但作为工作小组中的一名初级职员，我觉得自己无法影响这个决定。但失眠了一

> 个星期后，我决定在电话会议上发言。我们小组中的所有重量级人物，包括我们的外部律师，都会参与这个电话会议。我战战兢兢地谈了我的观点：这样做缺乏诚信，会对少数股东造成损害，而且如果被发现的话，可能会对银行造成损害。我的发言结束之后，大家在震惊中陷入了沉默，但最终主管们决定修改计划，并与那些少数股东坦诚地沟通。[12]

这位年轻的女士不仅在捍卫公司名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还进一步培养了自己的品格，这样的品格将有助于她处理未来在正直和勇气方面遇到的挑战。

一个企业摈弃欺诈、坚守诚信的决心可能与我心中的转型还差得很远。但无论如何，阻止不道德行为的小小胜利也是不容小觑的。基督徒将成为地上的盐（《马太福音》5：13）。我们认为，盐能够提供额外的滋味和增强口味；但在古代，它被用作防腐剂，防止东西腐坏。基督徒能够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成为全球经济的积极力量，无论大小。【222】

信仰、希望与爱

公元前 588 年，巴比伦军队正在进攻耶路撒冷的大门。先知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将因为这个国家的不忠受

到惩罚而沦陷，因此被当作叛徒囚禁在西底家王的院子中。耶利米的表兄弟哈拿篾得到神的启示：摆脱贫困的唯一办法是卖掉他的财产。尽管没有人比耶利米更加确信巴比伦人会接管这座城，他还是作为族人的救赎主，接受了哈拿篾的请求，买下了那块地。交易的细节描绘得很形象：

>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十七舍客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和画押作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玛西雅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录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利米书》32:9-15）

拿突的田地购买并非寻常的商业交易。耶利米本人从未从中受益。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一些犹太难民带

着耶利米逃往了埃及（《耶利米书》43：5-7）。据我们所知，他再没有回来。【223】

尽管如此，耶利米的行动仍是一个有力的预言。他的行为不是代表他本人，而是回应上帝的指示，并表达了他对年轻同胞的希望。他证明，尽管短期希望破灭了，**他们**还有长远的未来。他的举动惊世骇俗——他在民族危机中购买地产，这个行为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但是，这个故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道理：

第一，投资可以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民族危机过后，经济会走出低迷，最终趋于平衡。那些在市场低谷时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拿下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果长期持有这片土地，那很可能获利甚丰。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被无数的问题所环绕，但也有清晰的迹象表明，对其投资的前景非常广阔。希望需要与**信仰**相结合。这一态度是许多今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社会企业的西方基督徒的显著标志。

第二，如果这一投资主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那么它就有一个不同的特质。耶利米买下亚拿突的田地是为了鼓励那些年轻一代的同胞。他的人民面临着令人心碎的逃亡，但不会持续太久；耶路撒冷地区总有一天会恢复正常的商业状态。这一交易不仅标志着希

望和信仰，还有爱。在《哥林多前书》13：13 中，圣徒保罗将这三种美德相提并论：“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是的，确实如此。信仰和希望是强大的动力，但它们会失去其火花。它们需要用爱来点燃，这是一种积极的同情心，它能够伸出手改变那些遭遇不利情况的人的命运。【224】长期投资能够表达及体现邻里的爱，无论远近，并且为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自私之上的全球经济带来希望。

第三，遵守上帝的旨意而进行的商业交易能够置一般的商业标准于不顾。耶利米遵照“主的话语”买下了田地。今天，上帝仍然指引他的子民完成不太可能完成的交易。显然，这里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主的话语”很容易是虚妄的臆想。但是，如果上帝在**那时候**说了，那么他**现在**也可以说。有什么能阻止圣灵来做这样的工呢？圣灵启示的冒险行为违反传统的商业智慧，但最终证明这是精明的投资。

让我们牢记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这段著名的祷告文吧：

> 主啊，鼓动我们，让我们更加大胆吧，去更宽阔的海域冒险！在那里，风暴将彰显你的主权；在那里，我们看不见陆地，就会发现星辰。我们求你，将我们所希望的

地平线推得更远，引导我们怀着力量、勇气、希望和爱，驶向未来。【225】

参考资料

(BIBLIOGRAPHY)

Books

Bernard Adeney, *Strange Virtues: Ethic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Vp, 1995.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Benziger, 1947.

Augustine, *City of God*, Penguin, 1972.

Beatriz Armedavic,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 MIT Press, 2005.

Daryl Balia, *Make Corruption History*, SPCK, 2009.

Robert Banks, *God the Worker: Journeys into the Mind, Heart and Imagination of* God, Judson Press, 199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111:3, T. & T. Clark, 1976.

Craig Blomberg,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 A Biblical Theology of Possessions*, Apollos, 1999.

Ian Bradley, *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 Business Eth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Lion Hudson, 2007.

Richard Branson, *Business Stripped Bare: Adventures of a Global Entrepreneur*, Virgin Books, 2008.

John Browne, *Beyond Business: An Inspirational Memoir from a Remarkable Leader*, Phoenix, 2011.

Richard Burridge, *Imitating Jesus: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New Testament Ethics*, Eerdmans, 2007.

Vince Cable, *The Storm: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What It Means,* Atlantic, 2009.

G. B. Caird, *The Gospel of St Luke,* Pelican, 1963.

John Calvin, *Calvin's Ecclesiastical Advic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1.

John Calvin,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Last Books of Moses,* Eerdmans, 1950.

]im Collins, *How the Mighty Fall And Why Some Companies Never Give In,* Random House, 2009.

Darrell Cosden, *The Heavenly Good of Earthly Work,* Paternoster, 2006.

Marva J. Dawn, *The Sense of the Call: A Sabbath Way of Life for Those Who Serve God,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Eerdmans, 2006.

Kit Dollard, Anthony Marett-Crosby and Abbot Timothy Wright, *Doing Business with Benedict,* Continuum, 2002.

Shirley K. Drew, Melanie Mills and Bob Gassway, *Dirty Work: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int,*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rek El Diwany (ed.), *Islamic Banking and Finance,* 1st Ethical Charitable Trust, 2010.

Ken Eldred, *God is at Work: Transforming People and Nation through Business,* Manna Ventures, 2005.

David Erdal, *Local Heroes: How Loch Fyne Oysters Embraced Employee Ownership,* Random House, 2008.

David Erdal, *Beyond the Corporation: Humanity Working,* Random House, 2011.

Alain Erlande-Brandenburg, *The Cathedral Builders of the Middle Ages,* Thames & Hudson, 1993.

Eusebius, *Demonstration of the Gospel*, SPCK, 1920.

Amintore Fanfani,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IHS Press, 2003.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Penguin, 2003.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orld*, Penguin, 2008.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Allen 2011. Knox Press, 1991.

Francis Fukuyama, *The Social Virtues Creation of Prosperity*, Penguin, 1995.

Jean Gimpel, *The Medieval Machi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Richard J. Goossen (e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Reflections on Faith at Work Ill*,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2007.

Richard J. Goossen (e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Reflections on Faith at Work IV*,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2008.

Timothy Gorringe, *Capital and the Kingdom: Theological Ethics and Economic Order*, SPCK, 1994.

Timothy Gorringe, *Fair Shares: Ethic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ames & Hudson, 1999.

Mark Greene, *The Great Divide*, LICC, 2010.

Stephen Halliday, *The Great Stink of London: Joseph Bazalgette and the Cleansing of the Victorian Metropolis*, The History Press Ltd, 2001.

Charles Hampden-Turner and Fons Trompenaars, *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 Little, Brown, 1995.

Peter Heslam, *Transforming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enewal of Thrift*, Grove Ethics no.156, 2010.

Richard Higginson, *Questions of Business Life*, Authentic Media, 2002.

Richard Higginson and David Clough, *The Ethics of Executive Pay*, Grove Ethics no.159, 2010.

Richard Horsley, Jesus *and the Spiral of Violence: Popular Jewish Resistance in Rural Palestine*, Augsburg Fortress, 1992.

David H. Jensen, *Responsive Labor: A Theology of Work*,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2006.

James Jones, *Jesus and the Earth*, SPCK, 2004.

Norman L. Jones, 'Usury' in H.J. Hillerbrand (ed.),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erek Kidner, *Proverbs*, IVP, p, 2008.

Harriet Lamb, *Fighting the Banana Wars and Other Fairtrade Battles*, Rider & Co, 2008.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are Som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WW Norton, 1998.

Odd Langholm, *Economics in the Medieval Schools: Wealth, Exchange, Value, Money and Usury according to the Paris Theological Tradition*, EJ Brill, 1992.

Odd Langholm, *The Legacy of Scholasticism i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 S. Lewis, *Miracles*, Fontana, 1960.

Martin Luther, 'On Trade and Usury', *Luther's Works*, Vol. 45, Fortress, 1962.

J. W Marshall, *Israel and 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iblical Law*, Atlanta, 1993.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entecostalism in Latin America*, Wiley-Blackwell, 1993.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rogress Publishers, 1959.

Andy Matheson, *In His Image*, Authentic Media, 2009.

Ian L. McHarg, *Design with Nature*, Doubleday, 1969.

Paul Mills, 'Finance' in Michael Schluter and John Ashcroft, *The Jubilee Manifesto: A Framework, Agenda and Strategy for Christian Social Reform*, IVP, p, 2005.

Sushil Mohan, *Fair Trade Without the Froth*, lEA, 2010.

Jürgen Moltmann, *A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SCM, 1967.

Jürgen Moltmann, *On Human Dignity: Political Theology and Ethics*, Fortress, 1984.

Jürgen Moltmann, *A Broad Place: An Autobiography*, SCM, 2007.

George Moody-Stuart, *Grand Corruption: How Business Bribes Damage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View Publishing, 1997.

Richard Mouw, *When the Kings Come In: the New Jerusalem*, Eerdmans, 1983.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Harper & Row, 1951.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5.

John T. Noonan, Jr, *Bribes*, Macmillan, 1984.

Michael Northcott, *A Moral Climate: The Ethics of Global Warming*,

DLT, 2007.

Michael Novak,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Madison Books, 1982.

Chris Patten, *What Next? Surviv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Ien Lane, 2008.

Robert Peston, *Who Runs Britain? And Who's to Blame for the Economic Mess We're In,* Hodder & Stoughton, 2008.

Eve Poole, *The Church on Capitalism: Theology and the Market,*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Jean Porter, 'Virtue Ethics', in Robin Gi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ian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l.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Random House, 1987.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 Row, 194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Penguin, 1999.

Robert Southey, *Lift of Wesley* II, Hutchinson, 1900.

William H. Spohn, *Go and Do Likewise: Jesus and Ethics,* Continuum, 2000.

Susan E. Squires, Cynthia J. Smith, Loma McDougall and William R. Yeack, *Inside Arthur Andersen: Shifting Values,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FT Press, 2003.

John Stott, *The Cross of Christ,* IVp, 1986.

Gillian Tett, *Fool's Gold: How Unrestrained Greed Corrupted a Dream, Shattered Global Markets and Unleashed a Catastrophe,* Little,

Brown, 2009.

Miroslav Volf, *Work in the Spirit: Toward a Theology of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mes Walvin, *The Quakers: Money and Morals*, John Murray, 1997.

William J. Webb, *Slaves, Women and Homosexuals: Exploring the Hermeneutics of Cultural Analysis*, IVP, 2001.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Classics, 2001.

Samuel Wells, *Improvisation: The Drama of Christian Ethics*, SPCK, 2004.

Michael Wilcock, *I Saw Heaven Opened: The Message of Revelation*, IVP, 1975.

Wilf Wilde, *Crossing the River of Fire: Mark's Gospel and Global Capitalism*, Epworth, 2006.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 AlIen Lane, 2009.

Ben Witherington III, *Jesus and Money*, SPCK, 2010.

Kenman L. Wong & Scott B. Rae, *Business for the Common Good: A Christian Vision for the Marketplace*, IVP Academic, 2011.

Christopher J. H. Wright, *Deuteronomy*, Hendrickson, 1996.

Christopher J. H. Wright, *Old Testament Ethics for the People of God*, IVP, 2004.

Tom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SPCK, 2007.

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Eerdmans, 1972.

Hwa Yung, *Bribery and Corruption: Biblical Reflections and Case Studies for the Marketplace in Asia*, Graceworks, 2010.

Muhammad Yunus, *Banker to the Poor,* Aurum Press, 1998.

Journal articles, papers and reports

James Allcock, 'Prudence in Business', *FiBQ* 8:2, pp. 14-20.

Allan Bussard, 'Enterprise Solutions to Poverty', *FiBQ 14:2,* pp. 3-6.

Natalie Man Se Chan, 'Making Toys in China', *FiBQ 13:2,* pp. 23-25.

Child Workers in Asia, *Understanding Bonded Child Labour.* 2007.

Sang-Goog Cho, 'Korean Economy: A Model Case of Miraculous Growth?', unpublished paper, 1993.

Egan Report, *Rethinking Construction,* 1998.

Peter Frost and Sandra Robinson, 'The Toxic Handler: Organizational Hero - and Casual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9, pp. 97-106.

Brian Griffiths, 'The case for usury: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a modern credit economy', *FiBQ* 10:2, pp. 23-27.

Luigi Guiso, Paolo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NBER Working Paper 9237, October 2002.

Peter Heslam, 'Boss Christians: Entrepreneurs in Asia's Spiritual and Economic Awakening', *FiBQ* 13:3, pp. 31-32.

Peter Heslam, 'Savings on a Passage to India: from Debt to Equity in a Subprime World', *FiBQ* 13:4, pp. 29-30.

Richard Higginson, 'Can Business Be Christian? A report on a Ridley Hall Foundation conference', *FiBQ 7:3.*

John Hughes, 'Work, prayer and leisure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Crucible,* Jan-Mar 2011 Latham Report, *Constructing the Team, 1994.*

David H. Jensen, 'Fed and Hungry at Christ's Table: Daily Work and the Abundance of Eucharist' , *FiBQ* 11: 1, pp. 3-7.

John Lovatt, 'Jesus in the Workplace: Towards a Better Theology of Work'. *MC*, 1992, Vol. XXXIV, No. 2.

John Lovatt, 'All Things', *FiBQ* 13 :2, pp. 3-11.

Mark McAllister, 'An Inconvenient Truth', *FiBQ 13:1*, pp. 32-34.

Paul Mills,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A biblical diagnosis', Cambridge Papers vol. 20, no. 1, March 2011.

Alastair Mitchell-Baker, 'Making Companies Whole: The Tricordant Approach', *FiBQ* 11 :4, pp. 26-29.

Edd S. NoelI, 'Bargaining, Consent and the Just Wage in the Sources of Scholastic Ec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4, 1998.

Joan Lockwood O'Donovan, 'Then and Now: The Schoolmen and Fair Trade', *FiBQ* 9:2, pp. 9-15.

Martin Ravaill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World Bank Research Paper, 2009.

David Runton, 'Moderation in Business', *FiBQ* 8:2, pp. 21-24.

Michael Schluter, 'Is Capitalism morally bankrupt?', *Cambridge Papers* 18:3.

Geoff Shattock, 'When You See It Like This You're Never the Same: A Revolutionary Understanding of Work', *FiBQ* 12:3, pp. 3-8.

St Paul's Institute Report, *Value and Values: Perceptions of Ethics in the City Today*, November 2011.

Magne Supphellen, Sven Haugland & Ove Oklevik,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elf-efficacy, and religious attitudes in small

third-world enterprises', unpublished paper.

James Walvin, 'Why were the Quakers especially good in business?', *FiBQ* 3:4, pp. 8-13.

Peter Warburton, 'Not the Rock of Ages: What should we make of the Northern Rock imbroglio?', *FiBQ* 11:3, pp. 3-6.

White Jr, 'The Historic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967.

]im Wright, “Reclaiming Busines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FiBQ* 10:2, pp. 11-20.

N. T. Wright, “How Can The Bible Be Authoritative?”, *Vox Evangelica* 21, pp. 7-32.

Ian Yearsley, “Economics without usury”, *FiBQ 11:4.*

Edward W Younkins, 'Jean-Baptiste's Law of Markets: A Fundamental, Conceptual Integration', *Le Quebecois Libre*, no. 166, Feb 2006.

注释

1.经济中的信仰：为善的力量

1. 这些数字来自 Niall Ferguson 从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Rest (Allen Lane, 2011), p. 266 引用的 World Values Survey.

2. Ibid.

3. 例子见 Sang-Goog Cho, 'Korean Economy: A Model Case of Miraculous Growth?', unpublished paper, 1993; Ken Eldred, God is at Work: Transforming People and Nation through Business (Manna Ventures, 2005), pp. 11-12, 127.

4. 见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pp.284-285; Peter Heslam, 'Boss Christians: Enterpreneurs in Asia's Spiritual and Economic Awakening', Faith in Business Quarterly (FiBQ) 13:3, pp. 31-32.

5. Charles Hampden-Turner and Fons Trompenaars, 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 (Little, Brown, 1995), p.266.

6. 见 James Walvin, The Quakers: Money and Morals (John Murray, 1997) and his article 'Why were the Quakers especially good in business?', FiBQ 3:4, pp. 8-13.

7.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Classics, 2001), p.69.

8.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p. 263.

9. Simon Schama 在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Random House, 1987)一书中，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

10. Walvin 在上面所引的文章中提出的进一步的观点。

11.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p. 263.

12. Michael Novak, introduction to Amintore Fanfani,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HIS Press, 2003), p. XLVIII.

13. Michael Novak,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Madison Books, 1982), pp. 23, 239.

2.经济中的神学：是阻碍，还是帮助？

1. Lausanne Theology Working Group, 'A Statement on Prosperity Teaching'.

2. Craig Blomberg,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 A Biblical Theology of Possessions (Apollos, 1999), p.244.

3. Magne Supphellen, Sven Haugland &Ove Oklevik,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elf-efficacy, andreligious attitudes in small third-would enterprises', 在乌普萨拉一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我参加了此次会议，瑞典，2011 年 3 月。

4. 这里还可以加上爱丁堡大学教授 Michael Northcott，他的 A Moral Climate: The Ethics of Global Warming（DTL, 2007）一书就生态危机谴责工业资本主义。

5. Timothy Gorringe, Capital and the Kingdom: Theological Ethics and Economic Order (SPCK, 1994), p.159.

6. Timothy Gorringe, Fair Shares: Ethic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ames & Hudson, 1999), p. 102.

7. Wilf Wilde, Crossing the River of Fire: Mark's Gospel nd Global Capitalism (Epworth, 2006), p.13.

8. Ibid, p.12.

9. Ibid, p.156.

10. Ibid, p.251.

11. Ibid, p.12.

12.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p.146.

13. 见 Stephen Halliday, The Great Stink of London: Joseph Bazalgette and the Cleansing of the Victorian Metropolis (The History Press Ltd, 2001).

14. Cleansing the River of Fire, p. 12.

15. 见 Martin Ravaill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Would Bank Research Paper, 2009.

16. Ibid.

17. 见 Gustavo Gutiér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SCN, 1974); Leonardo Boff, Jesus Christ Liberator (SCM, 1978); Jon Sobrino, Jesus the Liberator (Orbis Books, 1993); José Porfirio Miranda, Marx and the Bible (SCM, 1977); Juan Luis Segundo, The Liberation of Theology (Orbis Books, 1976); José Miguez Bonino, Revolutionary Theology Comes of Age (SPCK, 1975).

18. 见 David Martin，Tongues of Fire：The Explosion of Pentecostalism in Latin America (Wiley-Blackwell, 1993).

19. Jürgen Moltmann, A Broad Place: An Autobiography (SCM, 2007), p.232.

20. 见 Mark Greene, The Great Divide (LICC, 2010).

21. 路德宗两个王国的教义发展了这种理解。

22. 见 archives. Wittenburgdoor.com/archives/kennethlay.html——与 Kenneth Lay 的一次有意思的访谈。

23. Jürgen Moltmann, A Theology of Hope, p. 16.

24. 特别是，莫特曼在他关于政治神学与伦理的一本书《论人的尊严》（On Human Dignity, Fortress, 1984）中，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有意义地工作的权利》（The Right to Meaningful Work）

25. Tom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SPCK, 2007), p.205.

26. Ibid, p. 219.

3.始于希望：创造与企业家精神

1. James Jones, Jesus and the Earth (SPCK, 2004), p.29.

2. 卡尔•巴特（Karl Barth）曾对这种创造与圣工之间的界限做过有趣的讨论，见 Church Dogmatics III: 3 (T. & T. Clark, 1976), pp. 6-14.

3. 关于这个话题的一本有帮助的书是 Marva J. Dawn, The Sense of the Call: A Sabbath Way of Life for Those Who Serve God,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Eerdmans, 2006), 特别是第 2 章。

4. John Lovatt, 'Jesus in the Workplace: Towards a Better Theology of Work'. MC (1992), Vol. XXXIV, No.2, p. 14.

5. Robert Banks, God the Worker (Judson Press, 1994). P. v.

6. Ibid, pp.276-7.

7. 对布什公正一点儿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8. Edward W. Younkins, 'Jean-Baptiste Say's Law of Markets: A Fundamental, Conceptual Integration', Le Québécois Libre, no. 166, Feb 2006.网上可见于 www.quebecoislibre.org/06/060211-4.htm

9. Peter Heslam, Transforming Business 主任,也沿着这个线索探讨一种对上帝的理解。见他的 Transforming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enewal of Thrift (Grove Books, 2010), 尤其是第 3 章。

10. Richard Branson, Business Stripped Bare (Virgin Books, 2008), p. 38.

11. 对这个转变早期阶段的描述见于 The Cambridge Phenomenon: The Growth of High Technoloty Industry in a University Town (Segal Quince Wickstead, 1985).

12. 2005-2010 年间出版了 5 卷，前 2 卷名为《基督徒企业家》（The Christian Entrepreneur）。

13. Richard J. Goossen (ed.), Entrepreneutial Leaders: Reflections on Faith at Work IV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2008), p. 7.

14. Ibid, p. 7.

15. 特别见于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 Row, 1942), pp. 82-85

16. Richard J. Goossen (ed.), Entrepreneutial Leaders: Reflections on Faith at Work III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2007), p.206.

17. Ibid, pp. 152 and 150.

18. Ibid, p.168.

19. 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pp. 1203-1207.

20. Ian L. McHarg, Design with Nature (Doubleday, 1969), p.26.

21. 见 IPCC Climate Change Report 2007: 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syr/en/mains1.html.

22. 见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ss Release, 11 June 2011.

23. Mark Mcallister, 'An Inconvenient Truth', FiBO 13:1, p.33.

24. Ibid, p.34.

25. Ibid.

26. 见 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air_co2_emissions.htm.这些是联合国的统计数字。公正地对中国来说，其人口非常之多，人均排

放量（4.92%）比美国（19.9%）少得多。最大的人均污染者是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卡塔尔最高，竟达 55.43%。

27. 见 www.toughstuffonline.com. ToughStuff 在伦敦、马达加斯加和内罗毕设有办公室。

28. www.eauk.org/forumforchange/culture-footprint-andrew-tanswell.cfm.

4.从希望到绝望：剥削与贪婪

1.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5), p. 24. 实际上，尼布尔引用了一段他在 London Times Literary Suplement 上看到的说法。

2. www.moneymarketing.co.uk/pensions/failed-aia-bid-costs-pru-£377m /1016742.article.

3. www.morssglobalfinance.com/the-economics-of-the-global-entertainment-industry.

4. 这些数字来自 the Stockholm Institute of Peace Research. 见 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

5. 同时应该指出，没有精良的武器，人类也能造成可怕的灾难。1994 年胡图人在卢旺达实施的种族灭绝大部分使用的是砍刀。

6. 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具体见于他的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rogress Publishers, 1959).

7.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Penguin, 1999), p.12

8. Ibid, p.734

9. 见 Understanding Bonded Child Labour in Asia, 这是 Child Workers in Asia 工作组提出的一份报告。网上见于 www.crin.org/docs/CWA_%20UnderstandingBondedChildLabour.pdf.

10. 见 ‘Foxconn chief apologies for spate of suicides’, 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5/27/content_9897265.htm; ‘Undercover Report from Foxconn’s Hell Factory’, gizmodo.com/5542527/undercover-report-from-foxconns-hell-factory.

11. Natalie Man Se Chan, ‘Making Toys in China’, FiBQ 13:2, pp.23-25.

12. 英国三位著名作家做了各有侧重的评论，有助于对这场危机不同方面的了解，见 Robert Peston, Who Runs Britain? Vince Cable, The Storm, and Gillian Tett, Fool’s Gold.

13. 见 en.wike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ublic_debt. 这些数字来自美国政府的资料。

14. www.financefacts.co.uk/uk_credit-card-spending.htm.

15. www.thisismoney.co.uk/uk-markets/article.htm1?in_article_id=438693.

16. Chris Patten, What Next? Surviv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len Lane, 2008), p.78

17. 见 www.efinancialnews.com/story/2010-06-13/goldman-sachs-ethics-waiver.城市银行也有一次取消。

18. Jean Porter, ‘Virtue Ethics’, in Robin Gi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ian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6.

19. David Runton, ‘Moderation in Business’, FiBQ 8:2, pp. 21-24.

20. James Allock, ‘Prudence in Business’, FiBQ 8:2, pp. 14-20.

21. Perter Warburton, ‘Not the Rock of Ages: What should we make of the Northern Rock imbroglio?’, FiBQ 11:3, pp. 3-6.

22. Amos 1:9-10 和 Joel 3-6 有类似的推罗贩卖人口为奴隶的线索。

23.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W Norton, 1998), p.xii.

24. 这里我取法 Niall Furguson 的术语：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

25.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少腐败、社会平等的更多细节，见第 5 章和第 8 章。

26. Lautaro Wines' Sauvignon Blanc 和 Merlot Reserve 可以网上从 Traidcraft 订购。

5.对一个民族家的希望：没有债务，没有腐败

1. Christopher J. H. Wright, Old Testment Ethics for the People of God（IVP, 2004, p. 49.

2. 同上, p.51.

3. 如 Derek Kidner 建议，Proverbs (IVP, 2008), p.21.

4. www.sisterinbusiness.net/The%20Proverbs%2031%20Woman.htm.

5. Proverbs31womanexperience.com/com/aboutus.aspx

6. 见 Beatriz Armedavic,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MIT Press, 2005). 格莱敏银行（Grameen Bank ）报告说，其微贷的 95%给了妇女。 基督教的微金融机构国际机会（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和五项才能（ Five Talents ），数字分别为 84%（ www.opportunity.org/what-is -microfinance ）和 67%（www.fivetalents.org/who-we-are/faqs#women）。

7. 提出这个变化的两篇有影响报告是 1944 Latham Report, Constructing the Team, 和 1998 Egan Report, Rethinking Construction.

8. www.jewfaq.org/613.htm.

9. William J. Webb, Slaves, Women and Homosexuals: Exploring the Hermeneutics of Cultural Analysis (IVP, 2001), 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10. Old Testament Ethics for the People of God, p.63.

11. Ibid.

12. Ibid.

13. William H. Spohn, Go and do Likewise (Continuum, 2000), p.54.

14. J. W. Marshall, Israel and 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Atlanta, 1993), p.148.

15. E.T. Fretheim, Exodus (John Knox Press, 1991), p. 247.

16. Cristopher J. H. Wright, Deuteronomy (Hendrickson, 1996), p. 188.

17. Cyprian of Carthage, Test. III, 48; Gregory of Nyssa, Hom. IV in Eccl.

18. Lombard, SentencesIII. 37. 5: II, 211.

19. Odd Langholm, The Legacy of Scholasticism in Economic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60-62.

20.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Qu.78, Art. 1.

21. Ibid.

22. Ibid.

23. Op. cit, Qu. 78, Art. 2.

24. Ibid.

25. Odd Langholm, The legacy of Scholasticism, p. 75.

26. Martin Luther, On Trade and Usury, pp.277, 281, 290, 308.

27. Ibid., p.297

28. Ibid, pp.305-306.

29. Calvin’s Ecclesiastical Advic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1), pp. 139-143.

30. Ibid. p. 141.

31. Ibid. p. 142.

32. 类似的，在他对《利未记》23 章的注释中，他提出，在延期还债、或一个有钱人为买土地而贷款的情况下，利息是正当的。见加尔文，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Last Books of Moses (Eerdmans, 1950), pp. 125-133.

33. Norman L. Jones, 'Usury' in H. J. Hillerbrand (ed.),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4.

34. 见 Ian Yearsley, 'Economics without usury', FiBQ 11:4, p.31.

35. Tarek EL Diwany (ed.), Islamic Banking and Finance (1st Ethical Charitable Trust, 2010)是最近一本关于伊斯兰银行与金融的书，不仅包括了个人和商业银行，也涵盖了批发金融（wholesale finance），家庭购买，投资基金，遗产与保险，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

36. Paul Mills,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a biblical diagnosis", Cambridge Papers vol. 20, no. 1, March 2011, p. 3.

37. Ibid.

38. Ibid, p.2.

39. Paul Mills, "Finance"in Michael Schluter and John Ashcroft, The Jubilee Manifesto (IVP, 2005), p.205.

40. 见 Brian Griffiths, "The case for usury: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a modern credit economy", FiBQ 10:2, pp. 25-26.

41. Paul Mills, "Finance", p.205.

42. Paul Mills,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a biblical diagnosis", p.2.

43. 关系基金会（Relationship Foundation）是禧年中心的姊妹机构，旨在促进社会与组织生活的健康关系之利益。

44.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Penguin, 2008), p.4.

45. John T. Noonan Jr, Bribes (Macmillan, 1984), p.XI.

46. Ibid, p. XXI.

47. George Moody-Stuart, Grand Corruption (WorldView Publishing, 1997), p. 42.

48. Daryl Balia, Make Corruption History (SCK, 2009), pp. 115-117.

49. Hwa Yung, Bribery and Corruption: Biblical Reflections and Case Studies for the Marketplace in Asia (Graceworks, 2010), p.26.

50. Bernard Adeney, Strange Virtues (IVP, 1995), p.152.

51. 该定义出自美国经济学家 Joseph Senturia1931 年为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写的一篇文章。

52. 见 George Moody-Stuart, Grand Corruption, 特别是 pp.58-60.

53. 例如，我们 1999 年在 Ridley Hall 就处理商业中的腐败（Tackling Corruption in Business）举办的商讨会上；在 Richard Higginson, Questions of Business Life (Authentic Media, 2002) ch. 8，我反思了这个情况。

54. 这个研讨会由 SAIACS（South As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Christian Studies）在班加罗尔组织。2010 年 7 月 24 日召开。

55. Bribery and Corruption, p. 25.

56. Make Corruption History, p. 147.

57. 2005 年我访问拉格斯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这个节目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 Obisanjo 政府的反腐败机构的活动。

58. Make Corruption History, pp. 58-61.

6.在一个儿子身上的希望：帮助被边缘化的人

1. 《耶利米书》38:2；《历代志下》24:20-21.

2. 可作为证据的是这些事实：马丽亚在结婚之前怀上了他，去往伯利恒艰难的旅行，逃亡埃及。

3. www.qub.ac.uk/schools/SchoolofEnglish/visual-culture/painting/Christ-pre-raphaelite.html

4. John Browne, Beyound Business (Phoenix, 2011), pp. 22-23.

5. Ibid, p.26.

6. www.gsk.com/mission-strategy.

7. 印度贱民（Indian Dalit）神学家们特别是这样。见www.csichurch.com/article/dalit.htm

8. 在至福的两个版本中，耶稣在《路加福音》（6:20）中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5:3）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9. 如，Ben Witherington III, Jesus and Money (SPCK, 2010), pp. 96-97; John Howard Yoder, ThePolitics of Jesus (Eerdmans, 1972), pp.34-40, 64-77.

10. 有人质疑禧年是否曾经生效过，因为，在《旧约》的其他地方极少提到它，并且，这些内容对富人和权贵的既有利益会造成严重威胁。不过，生活于 65 BC 到 10 AD 之间的颇具影响力的犹太拉比西莱尔谈到禧年是一个活生生的状况，所以，可能曾有过间断性的尝试实施它。

11. 具体说，耶稣教人们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守安息日。本章后面我会更多地谈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和撒该。

12. 见 www.tricordant.com 和 Alastair Mitchell-Baker, ‘Making Companies Whole: The Tricordant Approach’, FiBQ 11:4, pp. 26-29.

13. Richard Higginson, ‘Can Business Be Christian? A report on a Ridley Hall Foundation Conference’, FiBQ 7:3, p.20.

14. Brittany Smith, ‘Christians Help the Poor with Renewable Energy’, The Christian Post, 9 January 2012. See www.christianpost.com/

news/christians-help.

15. “神的国度”这个短语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并列段落中出现了八次，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并列段落出现了三次，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并列段落出现了十次，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并列段落出现了两次，单《马太福音》中出现二十五次（《马太福音》喜欢用“天上的国”（kingdom of heaven）这个短语），单《路加福音》出现了十次。

16. 理查德·巴瑞之（Rechard Burridge）关于新约伦理的书《效仿耶稣》（Imitating Jesus）（Eerdmans, 2007）的一个主题是，为了理解耶稣的伦理，我们必须对他所为和所说给予同样的注意。

17. Edd S. Noell, ‘Bargaining, Consent and the Just Wage in the Source of Scholastic Ec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4, 1998, p. 476.

18. Richard Higginson and David Clough, The Ethics of Executive Pay (Grove Books, 2010), pp. 21-23

19. John Hughes, ‘Work, prayer and leisure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Crucible, Jan-Mar 2011, p. 10.

20. G. B. Caird, The Gospel of St Luke (Pelican, 1963), p. 180

21. 关于《新约》时期的税收体系，见 Richard Horsley, Jesus and the Spiral of Violence (Augsburg Fortress, 1992), pp. 212-213.

22. 欲了解一项关于有用但地位低的工作经历的有趣的研究，见 Shirkey K. Drew, Melanie Mills and Bob Gassway, Dirty Work: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int (Bayor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见我第四章对危机原因的分析。

24. The Economist, 2, May 2011, 可见于 www.economist.com/economist-asks/international_banking_question_4.

25. 例如，对冲基金所有者保罗·马歇尔（Paul Marshall）和艾恩·维斯（Ian Wace）是 ARK（Absolute Return for Kids）的共同创始人，该机构从对冲基金行业募集慈善捐赠，帮助遭受虐待、残疾、疾病及贫困的孩子。见 www.arkonline.org 和.www.enotes.com/topic/Marshall_Wace.

26. 我在第 7 章会更多地谈到节制和高管薪酬的话题。

27. 见《马太福音》23 章中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强烈讽刺，反复称他们为“伪善者”——15, 17, 23, 25, 27 和 29 节。

28. 这种风格最著名的例子是收藏于佛罗伦萨皮蒂宫的提香（Titian）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29. G.B.Caird, The Gospel of St Luke, p.114.

30. Ibid.

31. 见 www.onlineschools.org/blog/stats-on-prostitution,提供了这些统计的来源。

32. Andy Matheson, In His Image (Authentic Media, 2009), p.62.

33. Beacon of Hope 是一个类似的机构，在隆加——内罗毕另一个低收入地区在妇女中间工作。

7.希望的死去与复活：正直、牺牲与证实

1. 二十世纪早期苏格兰神学家 James Denney 和 P. T. Forsyth 反复提到，耶稣的死是基督的工作。

2. Geoff Shattock, ‘When You See It Like this You’re Never the Same: A Revolutionary Understanding fo Work’, FiBQ 12:3, p.4.

3. 这个数字包括遇难的 343 名消防员和 60 名警察，但不包括两架飞机上的 147 名乘客和劫机者。

4. Douglas Kellner, ‘9/11, Spectacles of Terror and Media Manipulation: A Critique of Jihadist and Bush Media Politics’. 此文可见于 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essays/911terorspectaclemedia.pkf.

5. 奥萨玛·本·拉登在多个录音广播中如此指出。

6. 在 9/11 中遇难的人来自 77 个不同的国家，包括很多穆斯林。

7. 另有 170 万人死于职业病。见 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lang--en/index.htm.

8. www.hse.gov.uk/statistics/fatals.htm.

9. John Browne, Beyond Business (Phoenix, 2011), pp. 203, 204.

10. Susan E. Squires et al. Inside Arthur Andersen (FT Press, 2003),描述了一个早于安然 20 年、曾以高标准商业伦理著称的公司是怎样衰落的。

11.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Penguin, 1999), p.14.

12. www.educationalrap.com/song/maximum-utility.html

13. www.riskmetrics.com/press/articles/20080816_smh.html.

14. Richard Wilkinson 和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Allen Lane, 2009). 瑞典和日本尽管一般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好，其自杀率还是非常高。这提示，社会一致性往往与平均主义相伴生，对社会一致性持抵触态度的人经受着严重的压力。

15. “人类是理性的自我利益寻求者”，对这个正统的经济学观点的有益的评论和有趣的批评，见 Donald E. Frey, ‘ The Good Samaritan as Bad Economist’, www.crosscurrents.org/frey2.html.

16. C. Hoyos 和 M. Steen, ‘Shell chief calls for pay reforms’, Financial Times, 8 June 2009, http://goo.gl/X@dl. 2008 年，Van der Veer 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拿到 1,030 万欧元的工资。

17. Lewis Smith, ‘“Unrepentant” Diamond set to bank £9m bonus’, The Independent, 5 February 2011, http://search.independent.co.uk/topic/package-worth-bob-diamond. 最后，巴克莱银行发给戴蒙德 650 万英镑奖金。

18. Sushil Mohan, Fair Trade Without the Froth (IEA, 2010), p.35

19. www.fairtrade.org.uk/what_is _fairtrade/facts_and_figures.aspx.

20. 七个独立的研究测量了公平贸易对生产者的影响，就此一个有益的总结见于 en.wikipedia.org/wiki/Fair_trade_impact_sutdies.

21. FLO-CERT 的收费详情见 www.flo-cert.net/fol-cert/main.php .

22. Harriet Lamb, Fighting the Banana Wars (Rider & Co, 2008), chapters 2 and 5.

23. Sushil Mohan, Fair Trade Without the Froth (IEA, 2010), pp. 62-63.

24. Peter Frost 和 Sandra Robinson, 'The Toxic Handler: Organizational Hero – and Casualty', Hav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 – August 1999, pp. 97-106. 感谢 Eve Poole 指点我看这篇文章。

25. Op. cit., p.98

26. Allan Bussard, 'Enterprise Solutions to Poverty', FiBQ 14:2.

27. 卡拉瓦乔（Caravaggio）在《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幅画中，生动描绘了这个惊诧的瞬间。此画收藏在伦敦国家艺术馆。

28. NRSV 把 hilasmos 译为"atoning sacrifice"（挽回祭），但 propitiation 更接近原文。

29. John Stott 的'The Cross of Christ'一书对此进行了明智的反思。（IVP, 1986）, pp. 167-168 及 228-230.

30. The Cross of Christ, pp. 233-234.

31. C.S.Lewis, Miracles (Fontana 1960), p. 116.

32. Michael Schluter, 'Is Capitalism morally bankrupt?', Cambridge Papers 18:3, p.3.

33. www.johnlewispartnership.co.uk/about/our-founder/bbc-broadcast.html.

34. Margareta Pagano, '' Why John Lewis's Andy is streets ahead, The Independent, 14 March 2010.这篇文章以 John Lewis's 的首席执行官 Andy Street 的名字作双关语。

35. Joe Henley, 'Is John Lewis the bes company in Britain to work for?', The Guardian, 14 March 2010. 这构成了 2010 年奖金总额的 15%。

36. Ambrose Evans-Prichard, 'Spain's astonishing co-op takes on the world', Daily Telegraph, 16 February 2011.

37. David Erdal, Beyound the Corporation: Humanity Working (Random House, 2011), p. 208. Erdal 是八喜伙伴公司的一名董事。他在雇员购买 Loch Fyne Oysters 公司全部股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为这个公司写了一本专著，名为 Local Heroes.

38. Muhammad Yunus, Banker to the Poor (Aurum Press, 1998), p.5.

39. Op. cit., p.116.

40. 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6.

41. 国际机遇机构（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最初的名字是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 (IIDI)。

42. www.microensure.com/products-creditlife.asp.

43. Fivetalents.org.uk/images/general/Sustain%20Awards_Mar2010.pdf.

44. www.fivetalents.org/get-involved/mission-trip-opportunities.

45. www.bridgefoundation.org.in/karnataka.html.

46. www.businesssider.com/microfinance-suicides-2010-10.

47.worldnewsb4u.blogspot.com/2011/05/nobel-prize-winner-quits-bank-he.html.

48. fivetalents.org.uk/blog/?p=244.

49. Peter Heslam 提出的这个观点。见‘Savings on a Passage to India: from Debt to Equity in a Subprime World’, FiBQ 13:4, pp. 29-30.

8.活在希望中的人：进取的僧侣与体贴的雇主

1. 例如《哥林多前书》1:26：“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2. 另见第 1 章和第 5 章，有其他重要的历史例证。

3. Cicero, De Officiis, 1:42, p. 150.

4. Eusebius, Demonstration of the Gospel 1.8.

5. St Augustine, Sermon 169, paragraph 17. 另见于 City of God, XIX, 19.

6. 在许多神学家中，奥利金（Origen）第一个提出“马利亚是沉思生活的象征，马大是活跃生活的象征。” Ioan, Fragment 80. 在 Summa Theologiae Qu. 182 Art. 1 中，阿奎那主要根据这个故事，给

出了沉思的生活“优于”活跃的生活的九个理由。

7. 更多信息见于 www.mmmongolia.com. 瑞德里学院是蒙古马大与马利亚机构的使命合作伙伴。

8. Kit Dollard, Anthony Marett-Crosby and Abbot Timothy Wrighy, Doing Business with Benedict (Continuum, 2002), p. 10.

9. Rule of St. Benedict, 57.

10. Op. Cit., 31, Dollard, Mrett-Crosby 和 Wright, p. 97, 把本笃对酒窖管理员的看法描述为“整部规则中最精心构思与平衡的一章。”

11. Alain Erlande-Brandenburg, The Cathedral Builders of th Middle Ages (Thames & Hudson, 1993), p. 101.

12. Jean Gimpel, The Medieval Machi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p. 67.

13. Joan Lockwood O’Donovan, “Then and Now: The Schoolmen and Fair Trade”, FiBQ 9:2, p. 11.

14. Ibid., p. 13.

15. 对 Olivi 观点的评论，见 Odd Langholm, Economics in the Medieval Schools (EJ Brill, 1992), pp. 360-365. Martin Luther 代表了学院派关于公正价格的观点，在‘On Trade and Usury’, Luther’s Works, Vol. 45（Fortress, 1962）中有类似的列举。

16. Duns Scotus 的观点见于 Langholm, Economics in the Medieval Schools, pp. 410-411.

17. Robert Southey, Life of Wesley II (Hutchinson, 1900), p. 308.

18. Tomas Jackson (ed.), Wesley’s Sermons, no. 50. 此布道以 Appendix 2 in Ben Witherington III, Jesus & Money (SPCK, 2010), pp. 171-183 出版。后续的引文出自该版。

19. Ibid, pp. 177-178.

20. Ibid, p.178.

21. Ibid, p.179.

22. Ibid, p. 181.

23. Ibid, p. 182.

24. Ian Bradley, 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 (Lion Hudson, 2007), p. 12.

25. Ibid, p. 14.

26. Ibid, p. 37.

27. Ibid, p. 41.

28. 这种说法常被归于 Harold Wilson 首相，但他显然是重复了劳动党总书记 Morgan Phillips 最先说过的话。

29. 有些立法是自由党政府受到崛起中的劳动党的压力，在 1906-14 期间提出的。

30. David H. Jensen, Responsive Labor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2006), p. 80.

31. 词句来自 Eucharistic Prayer D in Church of England, Common Worship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2000), p. 195.

32. David H. Jensen, Fed and Hungry ant Christ's Table: Daily Work and the Abundance of Eucharist', FiBQ 11:1, p. 7.

33. Common Worship, p. 182.

9,未来的希望：国度的迹象

1. 这通常有关一种“欢喜”神学，因诸如 Hal Lindsey 的 The Late Great Plane Earth 和 Tim Lahaye 的 Left Behind 系列畅销书而广为人知。

2. Miroslav Volf, Work in the Spir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9.

3. Ibid, p.91.

4. 这件事发生在 2011 年月 16-17 日。

5. 我的同事 John Lovatt 在编辑 Faith in Business Quarterly，时，特别强调了“万事万物”的这个特征。 FiBQ 13:2, pp. 3-11.

6. Michael Wilcock, I saw Heaven Opened: The Message of Revelation (IVP, 1975), p.211.

7. 见 XXX 页。

8. Richard Mouw, When the Kings Come Marching In: Isaiah and the New Jeursalem (Eerdmans, 1983), p. 28.

9. Ibid., p.39.

10. John Donne, Meditation XVII.

11. Jim Wright, ‘Reclaiming Busines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FiBQ 10:2, p. 14. 这篇文章根据他 2006 年在商业中的信仰会议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ristian Faith and Business Practice 上的发言编写。

12. Op. cit., p. 11.

13. 见 XXX 页的引文。

14. James Jones, Jesus and the Earth, p. 60. 另一位接受了这种说法并采取转型论进路的神学家是 Darrell Cosden. 见他的 The Heavenly Good of Earthly Work (Paternoster, 2006).

15. 关于布洛特耶果园更多的信息，见 Kenman L. Wong 和 Scott B. Rae, Business for the Common Good (IVP,2001), pp. 251-253.

16. Miroslav Volf, Work in the Spirit, p. 100.

10.信仰、商业与爱：另一种商业理念

1. Niall Ferguson 引自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Penguin, 2003), p. 154.

2. Luigi Guiso,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itudes, NBER Working Paper 9237. 见于 www.kellogg.northwestern.edu/faculty/sapienza/htm/religion.pdf

3. Ibid. pp.5-7.

4.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Penguin, 1995), p. 142.

5. 我这里演绎的想法受益于 N.T. Wright, " How Can The Bible Be Authoritative?", Vox Evangelica 21, pp. 7-32, 和 Samuel Wells, Improvisation: The Drama of Christian Ethics (SPCK, 2004), ch. 3. 但我划分的独立幕次比他们的数量多。

6. 见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Harper & Row, 1951). Eve Poole 总结了 Niebuhr 的观点，很有帮助，见于 The Church on Capitalism: Theology and the Market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94-100.

7. Kenman L. Wong & Scott B. Rae, Business for the Common Good: A Christian Vision for the Marketplace (IVP Academic, 2011), p.284.

8. www.tbnetwork.org;www.transformingbusiness.net

9. www.ica.coop/statistics.html.

10. 见 Jonh Browne, Beyond Business (Phoenix, 2011), pp. 113-117.

11. www.jnj.com/connect/about-jnj/jnj-credo.

12. 这个故事是 Jim Wright 在他的文章 'Recliming Business for the Kingdom of God',讲的，FiBQ 10:2, pp. 19-20. 我这里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故事。

全球伦理网是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范围的伦理网站，它具有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国际基金董事会，在地区和国家项目中拥有来自200个国家的7万名参与者。全球伦理网尤其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们提供服务，以使他们在应用伦理领域中拥有更加平等的机会获得知识资源，并且使南半球的声音在全球 对话中更加可见可听。全球伦理网为对话、反思和行动提供了一个电子平台。它的核心工具是互联网网站 www.globethics.net。

全球伦理网拥有四个目标：

自由：自由获取在线文献
为了保障对应用伦理知识资源的获取，全球伦理网提供了一个*全球伦理网图书馆*,这是全球领先的伦理学电子图书馆，拥有超过一百万份的完整文本，供免费下载。关于技术和普世教会主义的第二个图书馆已经加进来，关于非洲法律与统治的第三个图书馆正在筹备当中，将于2013年启动。

网络：全球在线社区
注册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由感兴趣伦理学或者是这方面专家的人组成的全球共同体。它在其网站上为参与者提供参与论坛、上传文章以及以网络或国际合作研究为目标而参加或组建电子工作组的机会。

研究：在线工作小组
全球伦理网的注册参与者可以根据他们感兴趣的任何课题参加或建立在线研究小组，尽管设在日内瓦的全球伦理网总部集中在六个研究课题上：商业/经济伦理学、跨宗教伦理学、负责任的领导力、环境伦理学、健康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伦理学。通过工作小组和研究取得的结果可以进入亦能免费下载四个系列的在线文集和出版物（参见出版物目录）。

服务：会议、认证和咨询
全球伦理网提供很多服务，例如，全球伦理论坛（一个关于商业伦理的国际性会议）、顾客定制认证和教育项目，以及在多文化和多语言处境中所需要的咨询。

全球伦理网与圣商学院展开合作，于 2014年开办了全球伦理领导力中心（the Globethics Leadership Center ， GLC）。

www.globethics.net/zh

全球伦理网出版物

所有版本均可在全球伦理网图书馆和 *www.globethics.net/zh/publications* **上以 PDF 格式免费下载。**印刷版可以直接通过同一网页上的亚马逊网或在 *publications@globethics.net* **上订购。**

中国基督徒系列 China Christian Series

Yahya Wijaya;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Cui Wantian, *Christian Faith and Values: An Introduction for Entrepreneurs in China*, 2014, 76pp. ISBN: 978-2-940428-87-8 (Available in English, Chinese and Indonesian)

克里斯托弗 司徒博,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客人 对气候正义的全球基督徒愿景, 2015, 52pp. ISBN: 978-2-88931-034-0 (Engl. version in GE Library)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Cui Wantian, Teodorina Lessidrenska, Wang Dan, Liu Yang, Zhang Yu, *Entrepreneurs with Christian Values: Training Handbook for 12 Modules*, 2016, 270pp. ISBN 978-2-88931-142-2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 Li Jing, *Philanthropy and Foundation Management: A Guide to Philanthropy in Europe and China*, 2017, 171pp. ISBN: 978-2-88931-195-8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 Vanessa Yuli Wang, *Faith at Work. Directory of Christian Entrepreneurs and Workers*, 2017, 126pp. ISBN: 978-2-88931-207-8

马提阿斯奈格鲍尔（Matthias Neugebauer），茨温利的伦理学 *Ulrich Zwingli's Ethics*, 2017, 329pp. ISBN 978-2-88931-214-6

理查德 • 希金森（Dr. Richard Higginson）著，刘殿利（Dr. Dianli Liu）译, 信仰、希望与全球经济：一种为善的力量 *Faith, Hope & the Global Economy: A Power for Good*, 2017, 319pp. ISBN 978-2-88931-228-3

中国伦理系列 China Ethics Series

Liu Baocheng / Dorothy Gao (eds.), *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459pp. 2015, Available

only in Chinese, ISBN 978-2-88931-050-0

Bao Ziran, *影响中国环境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分析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Factor Analysis of its Implementation*, 2015, 431pp. Available only in Chinese, ISBN 978-2-88931-051-7

Yuan Wang and Yating Luo, *China Business Perception Index: Survey on Chinese Companies' Perception of Doing Business in Kenya*, 99pp. 2015, Available in English, ISBN 978-2-88931-062-3.

王淑芹 (Wang Shuqin) (编辑) (Ed.), *Research on Chinese Business Ethics* [Volume 1], 2016, 413pp. ISBN: 978-2-88931-104-0

王淑芹 (Wang Shuqin) (编辑) (Ed.), *Research on Chinese Business Ethics* [Volume 2], 2016, 400pp. ISBN: 978-2-88931-108-8

Baocheng Liu, *Chinese Civil Society*, 2016, 177pp. ISBN 978-2-88931-168-2

Liu Baocheng / Zhang Mengsha, *Philanthropy in China: Report of Concepts, History, Drivers, Institutions*, 2017, 256pp. ISBN: 978-2-88931-178-1

全球伦理网论文系列（已出版的集中于南半球伦理的博士论文）丛书编辑： 克里斯托弗 司徒博，博士，教授，全球伦理网创始人兼主席，瑞士巴塞尔大学伦理学教授。有关原稿和建议事宜，请联系：stueckelberger@globethics.net，编辑管理：publications@globethics.net.

这只是我们最新的出版物的选择，查看我们的完整集合，请访问：
This is only selection of our latest publications, to view our full collection please visit:

www.globethics.net/zh/publications

ISBN 978-2-88931-228-3

信仰、希望与全球经济

一种为善的力量

对于受债务与危机困扰的全球经济，信仰能提供什么希望吗？

理查德·希金森指出，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它会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巨大的为善的力量。它激励企业，减轻贫困，促进正直，鼓励持续，造就门徒。

这本开拓性的书将帮助商业人士深入思考所做行为和背后动机。本书展示了圣经救赎故事的每一个主题对商业行为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这些故事极具挑战性并给人以希望。本书探索了几种富有希望的另类商业模式，同时也给在主流企业工作的人们带来启发和鼓励。

书中丰富的商业例子来自作者多年亲历与研究累积。但愿这本书能启发你明白信仰与工作、与你这位“上帝的代理人”本人的关系，来转化世界变得更美好。

作者

理查德·希金森

在全球宣讲商业伦理和工作中的神学。他是剑桥瑞德里学院的讲师，是《商业中的信仰》季刊的创编人，撰写出版过若干书籍。

Globethics.net